

列夫·托尔斯泰

【中】

# 复活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复活

(中)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 第 二 部



玛丝洛娃的案子过两星期后可能由枢密院审理。这以前，聂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万一在枢密院败诉，那就听从写状子律师的主意，去告御状。律师认为，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必须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理由不够充足。这样，玛丝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初出发。聂赫留朵夫既已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在出发以前需要做好准备，现在要先下乡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聂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车到最近的库兹明斯科耶去，在那里他拥有一大片黑土的地产，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在那里他度过童年和少年，成年后又去过两次。其中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带到那里，同他一起检查农庄经营情况。因此他早就熟悉地产的位置，熟悉农民同帐房的关系，即农民同地主的的关系。农民同地主的的关系，说得客气些，是农民完全依赖帐房，说得直率些，是农民受帐房奴役。这不是一八六一年废止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有时还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某些人的奴役。这一点聂赫留朵夫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农庄经营就是以这种奴役为

基础，而他又亲自过问过这种经营方式。不过，聂赫留朵夫不仅知道这一点，还知道这种经营方式是不公平的，残酷无情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并且热心加以宣扬。当时他就知道这个问题。根据这个学说，他把父亲留给他的土地分赠给农民，且认为今天拥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都是罪孽。不错，他在军队生活，养成了每年挥霍近两万卢布的习惯。复员回来后，原先信奉的学说，已对他的生活不再有约束力并被抛置脑后。他不再思考他对财产应抱什么态度，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且竭力回避这些问题。不过，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遗产，并开始管理财产，也就是管理土地，这些事又使他想到土地私有制的问题。要在一个月以前，聂赫留朵夫会安慰自己说，改变现行制度，他无能为力，庄园也不是他在管理。这样，他生活在远离庄园的地方，收取从那里汇来的钱，多少还能心安理得。但现在他已毅然作出决定，虽然他不久就将去西伯利亚，并且为了处理监狱里的各种麻烦问题，都需要花钱。但他却不能再维持现状，一定要加以改变，宁可自己吃亏。因此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给农民，使他们完全不必依赖地主。聂赫留朵夫反复拿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进行比较，觉得地主不雇工种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农奴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样虽并不解决实际问题，但向解决问题迈出了一步，也就是压迫从较粗暴的形式过渡到不太粗暴的形式。他就打算这样做。

聂赫留朵夫在到达库兹明斯科耶已中午时分。他在生活上力求简朴，事先没有打电报回家，而在火车站雇了一辆双

驾四轮马车。车夫是个身穿黄土布长外套小伙子，腰身细长，腰身以下打褶裥的地方束着一根皮带。他同其它马车夫一样的习惯侧坐在驾驶座上，并喜欢同车上的老爷攀谈。他们这样一攀谈，那匹衰老而又瘸腿的白色辕马和害气肿病的瘦驴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那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车夫不知道车上坐的就是庄园主人，同他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那个管家。聂赫留朵夫有意不告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德国佬。”这个在城里住过、读过小说的马车夫说。他坐在驭座上，侧身对着车上的乘客，忽而拿着长鞭的柄，忽而握着长鞭的梢，显然想说些文雅的话来炫耀他的知识，“他买了一辆配三匹草黄大马的大马车，带着太太一起兜风，嘿，好不威风！”他继续说。“冬天过圣诞节，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好大的圣诞树，我送客人到他家去看见的，还有电光灯呢。全省都找不到第二家！捞的钱真是多得吓死人！他什么事都办得到，大权都在他手里嘛。据说他还买了一份好田产。”

聂赫留朵夫想，无论那德国人怎样管理他的庄园，怎样揩他的油，他都毫不在乎。但那个腰身细长的马车夫讲的话，却使他不快。他欣赏着美好的春光，眺望空中不时遮住太阳的浓云，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农民在翻耕燕麦地，看到浓绿的草木上空飞翔着百灵鸟。树林里除了发芽较晚的麻栎外都已披上翠绿的萌芽，草地上散布着一群群牛马，田野上看得见耕作的农民。他看着看着，不禁心里又闷闷不乐起来。他问自己，究竟什么事使他烦恼？于是他想到那个德国人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主宰一切，为所欲为。

聂赫留朵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后，着手处理事务，这才克服了这种不愉快的情绪。

聂赫留朵夫查阅过帐目，同管家谈了话。那管家直率地说，亏得农民缺少土地，他们的地又夹在当地地主的领地当中，因此地主占了很多便宜。聂赫留朵夫听了他的话，更打定主意，不再经营农庄，而把全部土地都分给农民。通过查帐和同管家谈话，他知道情况同过去一样，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他的雇工直接用改良农具耕种的，其余三分之一土地雇农民耕种，每俄亩付五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这五卢布，每俄亩土地就得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种子，再要是收割，打捆，把谷子送到打谷场。如果雇廉价的自由工人来做这些农活，每俄亩至少也得付十卢布工钱。农民从帐房那儿取得必需的东西，都要按最贵价格折成工役来支付。他们使用牧场、树林，甚至土豆茎叶，都得付工役，因此农民几乎个个都欠帐房的债。这样，由雇来的农民耕种耕地以外的土地，地主所得的利益就比用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这些事聂赫留朵夫尽管早就知道，但现在听来却又觉得很新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这些拥有土地的老爷怎么会无视这种不合理的事。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会损失全部农具，连四分之一的本钱也收不回来，又说农民会糟蹋土地，聂赫留朵夫交出土地会吃大亏。但这些理由反而使聂赫留朵夫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即把土地交给农民，使自己丧失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趁这次回乡机会，把这件事办好。收获和出售已种下的粮食，把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卖掉，这些事他让总管在他走后处理。现

在他要总管召集库兹明斯科耶周围三村农民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宣布自己的计划，并跟农民协商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坚决抵制总管的意见，准备为农民作出牺牲，感到很愉快。他从帐房出来，一面考虑着当前要办的事，一面绕过正房，穿过如今荒芜的花圃（总管住宅前却新辟了一个花圃），走过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来到菩提树夹峙的小径。以前他常在这里散步，吸雪茄，三年前美丽的基里莫娃到他母亲家来作客，还在这里同他调过情。聂赫留朵夫想了一下明天对农民大致要讲些什么话，然后去找总管，同他一面喝茶，一面商量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他在这些事上下定了决心后，才走到这座大宅邸里平时用作客房、这次为他收拾好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威尼斯风景画，两个窗子中间悬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放着一张整洁的弹簧床，一张小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水瓶、一盒火柴和一个灭烛器。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桌上放着他那只打开盖子的皮箱，箱子里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随身带着的几本书：几本是研究刑法的俄文书，还有一本德文书和英文书，都是同一类内容。这次下乡，他想抽空阅读这几本书，但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准备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向农民说明他的计划。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把古色古香的红木镶花圈椅。聂赫留朵夫记起这把椅子原来放在母亲卧室里，如今一看到，不禁产生一种特别的感情。他忽然很舍不得这座快要倒塌的房子，舍不得这个荒芜的花园，这片将被砍伐的树林，以及那些畜栏、马厩、工棚、机器和牛马。那些产业虽不是他置办的，但



他知道都来之不易，而且好容易才保存到今天。以前他觉得放弃那一切轻而易举，如今却又很舍不得，土地，舍不得他的一半收入——今后他很可能需要这些钱。于是立刻脑海里就有一种理论来支持这种感情——认为自己把土地分给农民，毁掉自己的庄园是愚蠢的，荒唐的。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失去土地，就不能维持这个庄园。不过，如今我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房子也好，庄园也好，都用不着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他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但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你要是结婚，就会有孩子，你完整无缺地接受这个庄园，以后你也得完整无缺地把它传给后代。你对土地负有责任。把土地交出去，把庄园毁掉，这一切都很容易，但重新创立这点产业可就难了。你首先得考虑你今后的生活怎么过，然后再来处理你的财产。你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再有，你现在这样做是真的出于良心？还是只做给人家看看，好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的品德？”聂赫留朵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人家对他的行为说长道短，会影响他的决定。他越想，问题越多，越不容易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思想，他在干净的床上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到明天头脑清醒了，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烦意乱的问题。但他好久都睡不着，从打开的窗子里飘进清凉的空气，泻下溶溶的月光，传来一片蛙鸣，还夹杂着夜莺的低吟浅唱——有几只在远处花园里，有一只就在窗下盛开的丁香花丛中。聂赫留朵夫听着夜莺的鸣啭和青蛙的聒噪，不禁想起了典狱长女儿的琴声。一想起典狱长，也就想起了玛丝洛娃，想起她说“您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时，嘴

唇不断地哆嗦，简直象鸡鸣时的青蛙一般。于是恍惚那个德籍总管走下坡去捉青蛙。得把他拦住，但他不仅一个劲儿地走下坡去，而且变成了玛丝洛娃，还责备他说：“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我不能让步。”聂赫留朵夫想着，惊醒过来，自问道：“我究竟做得对不对？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无所谓，但该睡觉了。”他也顺着总管和玛丝洛娃走过的路往下滑，于是一切都消失了。

## 二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九点钟醒来。帐房派来侍候老爷的年轻办事员，一听见他在床上翻身，就给他送来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和一杯清凉的矿泉水，并向他报告说，农民们正在聚拢来。聂赫留朵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头脑清醒了。昨天舍不得交出土地、清理庄园的心情已完全消失。此刻想到那种心情，反而觉得奇怪。他想到当前要办的事就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从房间窗口望出去，看见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农民们遵照总管的命令聚集在那里。昨天黄昏，青蛙拼命聒噪，怪不得今天天气这样阴晦。一早就下着温暖的绵绵细雨，没有风，树叶上、树枝上和青草上都滚动着水珠。从窗子里飘进来草木的芳香，还有久旱的泥土的气息。聂赫留

朵夫一面穿衣服，一面几次三番往窗外张望，看看农民纷纷集合到网球场上来。他们三三两两地走来，见面互相脱帽致意，有的拄着拐杖，众人站成一个圆圈。总管是个身强力壮、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有绿色竖领和大钮扣的短上衣。他走来告诉聂赫留朵夫，人都到齐了，但可以让他们等一下，聂赫留朵夫不妨先喝点咖啡或红茶，这两样东西都已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先去同他们见面。”聂赫留朵夫说，一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讲话，竟感到又胆怯又害臊。

他要满足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奢望——以低廉的地租分给他们土地，也就是说恩赐给他们土地，可他反而感到害臊。聂赫留朵夫走到农民面前，农民一个个脱下帽子，露出淡褐色的、鬈曲的和花白的头发，以及秃顶的脑袋，他忽然觉得十分狼狈，半天说不出话来。空中仍下着绵绵细雨，农民的头发上、胡子上和长袍绒毛上都是水珠。农民们望着老爷，等他开口。可是他却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这种难堪的沉默由镇定和刚愎自用的德国总管打破了。他自认为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讲得一口漂亮的俄国话。这个吃得肥头大耳、体格强壮的人，也象聂赫留朵夫一样，同满脸皱纹、身体枯瘦、肩胛骨从袍子里凸出来的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听我说，现在公爵少爷要施恩给你们，要把土地交给你们自己种，可是说实在的，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华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替你干过活吗？我们一向很感激老夫人，愿她在天上平安。我们

也很感激公爵少爷，他没有扔下我们。”一个喜欢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

“我约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你们愿意，我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聂赫留朵夫说。

农民们都不作声，仿佛没有听懂，或者不相信他的话。

“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身穿腰部打褶长袍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你们只要稍微付些租金就可以耕种。”

“这事太美了。”一个老头儿说。

“但租金要我们出得起才行。”另一个老头儿说。

“给土地还会不要吗！”

“种地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就是靠土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事些，只要收收钱就行，免得许多麻烦！”几个人同时说。

“麻烦都是你们弄出来的。”德国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能守规矩……”

“这我们可办不到，华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问我为什么把马放到田里，谁存心把它放过？我整天从早到晚抡镰刀，干一天活好比干一年，夜里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马溜到你的燕麦田里，你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应该守规矩。”

“守规矩，你说说倒轻巧，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个儿头发乌黑，满脸都是胡子的中年农民说。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造一道围栏。”

“那你给我们木材。”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儿农民插嘴说。

“我原来就想用木头围起来，可你却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嘿，这就叫造围栏！”

“究竟是怎么回事？”聂赫留朵夫问总管。

“村子里的头号小偷。”总管用德语说。“他年年在树林里偷树，均被人逮住。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总管说。

“难道我们还不尊重你吗？”老头儿说。“我们不能不尊重你，因为我们都捏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

“嗨，老兄，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只要你们不欺负人家就是了。”

“哼，‘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去年夏天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打了就打了，还有什么话说呢！跟有钱人没法讲道理，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做事只要守法就是了。”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舌战。交战双方都不太明白他们在争些什么，说些什么。只见一方满腔怒火，但因恐惧而有所克制；另一方则明白自己地位优越，大权在握。聂赫留朵夫听着他们的争吵，心里很难受。他竭力想使大家回过头来谈正经事，商定地租和付款期限。

“那么土地的事怎么办？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出什么价钱？”

“东西是您的，价钱得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定了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金要低得多，农民们还是嫌高，就开始还价。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定的价钱农民会高高兴兴接受，不料谁也没有表

现出丝毫满意的样子。聂赫留朵夫断定他定的价钱对他们有利，因为在谈到由谁来承租的时候——是由全村农民来承租，还是成立一个合作社来承租，——农民分成两派，争论得很激烈。一派是想把体弱多病、付款困难的农民排挤在外，另一派就是那些被排挤的农民。最后亏得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付款期限。于是农民们就吵吵闹嚷地走下山坡，回村子里去了。聂赫留朵夫则同总管一起到帐房去拟订租约。

聂赫留朵夫的计划 and 愿望都实现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且付的租金比附近一带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他还是绰绰有余，何况他卖掉的树林、出售的农具都有进款。看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聂赫留朵夫总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到，农民中间尽管有人对他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但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指望更多的好处。结果是他自己吃了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足。

第二天，在家里订了租契，签了字。聂赫留朵夫在几个推选出来的老农目送下，怀着事情没有办完的惆怅心情，坐上总管那辆被出租马车夫称为阔气的马车，同那些脸上现出困惑神色、不满意地摇头的农民告了别，直奔火车站。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很不满意。至于什么事不满意，他自己也说不出，但一直闷闷不乐，感到羞愧。

### 三

聂赫留朵夫乘车离开库兹明斯科耶，来到两位姑妈让他继承的庄园，也就是他认识卡秋莎的地方。他很希望象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处置这里的地产。此外，他还想尽量打听一下卡秋莎的事，以及她和他的孩子的情况，那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他一早来到巴诺伏。他的马车驶进庄园，使他触目惊心的，首先是全部建筑物特别是正房那种衰败荒凉的景象：原来的绿铁皮屋顶，因好久没有油漆，已锈得发红；有几块铁皮卷了边，多半是被暴风雨掀起的。正房四周的护墙板，有的已被人撬走，主要是那些钉子生锈、容易撬掉的地方。前门廊和后门廊都已朽烂倒塌，只剩下梁架。特别是后门廊，他记得尤其清楚。有几个窗子由于玻璃损坏已钉了木板。原来管家住的厢房，还有厨房和马厩，都已破旧，色泽灰暗。唯独花园没有衰败，更加繁茂，枝叶扶疏，百花争妍；从墙外就可以看见樱花、苹果花和李子花盛开，白花花一片仿佛天上的浮云。编成篱笆的丁香也象十二年前一样盛开，那年聂赫留朵夫曾和十六岁的卡秋莎一起玩捉迷藏游戏。他在这丁香花丛里摔了一跤，被荨麻刺伤了。当年索菲亚姑妈在正房旁边种的一棵小得象木橛子似的落叶松，如

今已长大成材，枝条上长满了柔软的黄绿色松针。河水在两岸之间奔流，流到磨坊的水闸上，哗哗地往下冲去。对岸草地上放牧着农家毛色斑驳的牛马。管家是个没有毕业的神学校学生，他笑吟吟地在院子里迎接聂赫留朵夫，笑吟吟地请他到帐房里去，又笑吟吟地走到隔板后面，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将有什么特殊的事在等着他。隔板后面有人在叽叽喳喳地谈话，随后又沉默了。马车夫领到酒钱后，叮叮咣咣地把车赶出院子，接着周围又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穿绣花衬衫的姑娘从窗外追去，她赤着脚，耳朵上挂着绒球当耳环。一个农民跟在她后面跑过，大靴子的铁钉在地面上发出叮叮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坐在窗口，望着花园，听着各种声音。从双扉小窗子里飘进来春天的清新空气和翻耕地的泥土香，风轻轻地吹动他汗滋滋的额前上的头发和放在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条纸。河上传来妇女们劈里啪啦的捣衣声，此起彼落，响成一片飘荡在阳光灿烂的河面上。磨坊那边传来流水倾泻的声音。一只苍蝇从聂赫留朵夫耳边飞过，发出惊恐的响亮嗡嗡声。

聂赫留朵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当他年纪很轻、心地还很单纯的时候，也在这儿，在磨坊有节奏的喧闹声中，听河上的捣衣声；春风也是这样吹动他湿润的额前的头发和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条纸；而且也有这样一只苍蝇惊恐地从他耳边飞过。他不仅想起了十八岁时的情景，忽然觉得自己象当年一样朝气蓬勃，心地单纯，胸怀大志，但转瞬间他感到无比惆怅，觉得象梦景一样不可能重现。



“老爷，您什么时候吃饭哪？”管家微笑着问。

“随您的便，我不饿。我到村子里去走走。”

“您是不是先到房子里看看，房子里我都收拾得干净了。您去看看吧，要是外表上……”

“不，以后再看，请您先告诉我，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玛特廖娜的女人？”

玛特廖娜就是卡秋莎的姨妈。

“有，当然有，就住在村子里，我真拿她没办法。她卖私酒，我知道这事，揭发过她，训斥过她，可是到官府告她，又不忍心。年纪大了，妇道人家，又有孙儿孙女。”管家说，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想讨好东家，同时满心相信东家看事情都同他一样。

“她住在哪里？我想去看看她。”

“住在村子尽头，从村边数第三家。左边是一座砖房，她的小屋就在砖房后面。最好还是让我送您去。”管家笑着说。

“不用了，谢谢您，我自己找得着的。倒是要请您通知那些农户，叫他们来开个会，我要同他们谈谈土地的事。”聂赫留朵夫说。他打算也象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在这里同农民们处理好土地的事情，而且最好今天晚上就办完。

## 四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遇见一个身穿花花绿绿的围裙，耳朵上挂着绒球的农家姑娘。她正迅速地迈动两只厚实的光脚板，穿过车前草和独行菜丛生的牧场，沿着一条踩实的小径跑来。她的左胳膊则拼命在胸前来回甩动，右胳膊紧搂住一只红毛公鸡，把它贴在肚子上，正要回家。那公鸡晃动血红的鸡冠，仿佛很镇定，时而转动两只眼珠，时而伸出一只黑腿，时而又缩回去，爪子不时抓住姑娘的围裙。姑娘走近老爷身边，放慢了脚步。她走到他面前，停住脚步，脑袋往后一昂，向他鞠了个躬。直到他过去了，她才抱着公鸡往前走。聂赫留朵夫下坡来到水井那儿，遇见一个身穿一件肮脏的粗布衫背有点驼的老太婆，挑着两只沉甸甸的装满水的木桶。老太婆小心翼翼地把两只水桶放下来，也象姑娘那样把脑袋往后一昂，对他鞠了个躬。

过了水井就是村子。天气炎热晴朗，上午十点钟就闷热得厉害，空中的浮云只偶尔遮住太阳。整条街上都弥漫着浓烈而并不十分难闻的畜粪味，有从大车上山经过的平坦坚实的路上飘来的，但主要还是从各家院子耙松的畜粪堆里冒出来的。聂赫留朵夫正好走过各家敞开的大门院子。有几个农

民光着脚板，裤子和布衫上溅满粪汁，赶着大车上坡。他们不时回头望望身材魁伟的老爷，看见他头上戴着灰色礼帽，缎子的帽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手里拄着光亮的银头曲节手杖，每走两步就拿手杖往地上一敲，上坡往村子走来。那些从大田里赶着空车回来的农民，在驭座上颠个不停，看见街上走着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向他脱帽致敬。农妇们走到大门外，或者站在台阶上，对他指指点点，目送他经过。

聂赫留朵夫走到第四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住脚步，让一辆吱吱嘎嘎响的大车从院子里驶出来。这辆大车装着堆得很高，拍打得很结实的畜粪，上面铺着一张供人坐的蒲席。大车后面跟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兴高采烈地等着坐车。一个脚穿树皮鞋，年轻的农民迈着大步，把马赶出门外。一匹蓝灰色长腿马驹从大门里窜出来，看见聂赫留朵夫，吓了一跳，身子贴紧大车，腿蹭着车轮，窜到母马前面。那母马刚把大车拉到门外，低声嘶鸣着，显得心神不宁。后面还有一匹马，由一个精神矍铄的瘦老头牵出来。这老头也光着脚板，穿着条纹裤和肮脏的长布衫，隆起尖尖的肩胛骨。

把马赶上了撒满仿佛烧焦的灰黄色粪块的大路，老头又回到大门口，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个躬。

“你是我们那两位小姐的侄儿吧？”

“是的，我是她们的侄儿。”

“欢迎欢迎。你是不是来看看我们哪？”老头兴致勃勃地说。

“对了，那么，你们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饶舌的老头连忙拖长声音说。

“怎么会这样糟呢？”聂赫留朵夫一面走进大门，一面问。

“这算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老头一面说，一面跟着聂赫留朵夫走进院子，来到草棚下畜粪已经铲掉的地方。

聂赫留朵夫也来到草棚底下。

“你瞧，我一家老少有十二口呢。”老头继续说，同时指着两个手拿大叉、头巾滑下来的女人，她们站在还没有清出的粪堆上，满头大汗，裙摆掖在腰里，露出半截溅满粪汁的腿肚。“月月都得买进六普特粮食，可是哪来的钱哪？”

“难道自己打的还不够吃吗？”

“自己打的？！我的地只能养活三口人，还吃不到圣诞节。”老头冷笑一声说。

“那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这么办：一个孩子送出去做长工，又向府上借了点钱。但不到大斋节就用光了，可是税还没有缴呢！”

“税要缴多少？”

“我们每户每四个月得缴十七卢布。唉，老天爷，这年头，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可以到你们屋里看一下吗？”聂赫留朵夫说着，穿过院子，从那已经铲除畜粪的地方走到用大叉翻过、冒出强烈气味的红棕色畜粪上。

“当然可以，请吧。”老头说。他迅速迈动脚趾缝里冒出粪汁的两只光脚，跑到聂赫留朵夫前头，给他打开小屋的门。

那两个农妇理好头巾，放下裙摆，露出好奇和恐惧的神情，瞧着袖口钉着金钮子的整洁的老爷走进来。

两身穿粗布衫的小姑娘，从小屋里跑出来。聂赫留朵夫弯下腰，脱去帽子，进了门廊，接着又走进充满着食物酸味的肮脏小屋。小屋里放着两台织布机。炉灶旁站着一个老太婆，卷着袖子，露出两条又黑又瘦、青筋毕露的胳膊。

“瞧，东家少爷看我们来了。”老头说。

“哦，那太高兴了。”老太婆放下卷起的袖子，亲热地说。

“我要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说。

“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您就瞧吧。这小房子眼看就要倒了，说不定哪天会压死人。可老头子还说这房子挺不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天地。”大胆的老太婆神经质地晃动着脑袋，说，“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得喂饱那些干活的人。”

“你们吃些什么呀？”

“吃什么？我们的伙食好得很。第一道是面包下克瓦斯，第二道是克瓦斯下面包。”老太婆露出蛀掉一半的牙齿，笑着说。

“不，您别开玩笑，让我看看今天你们吃些什么。”

“吃什么？”老头儿笑着说。“我们的伙食并不讲究。你给他看看，老婆子。”

老太婆摇摇头。

“你想看看我们庄稼人的伙食吗？老爷，我看你这人太认真了。什么都想知道。我说过，面包下拌克瓦斯，还有菜汤，昨天婆娘们送来几条鱼。喏，这就是菜汤，吃完汤就是土豆。”

“没有别的了？”

“还能有什么呢，最多在汤里加一点牛奶。”老太婆笑着说，然后抬起眼睛望着门口。

房门开着，门廊里挤满了人。男孩、女孩、怀抱婴儿的女人都挤在门口，瞅着这个察看庄稼人伙食的怪老爷。老太婆显然因为能同老爷周旋感到很得意。

“是啊，老爷，我们真是糟得很。”老头说，“你们跑来干什么！”他回头又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

“好吧，再见了。”聂赫留朵夫说他，觉得又窘迫又羞愧，但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多谢您来看望我们。”老头说。

门廊里互相挤紧的人，给聂赫留朵夫让出一条路。聂赫留朵夫来到街上，沿着斜坡往上走。两个赤脚的男孩跟着他从门廊里出来：年纪大些的穿一件脏得要命的白衬衫；另一个穿一件窄小的褪色粉红衬衫。聂赫留朵夫回头瞧了瞧他们。

“你到哪儿去？”穿白衬衫的男孩问。

“去找玛特廖娜。”他说。“你们认识她吗？”

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知为什么笑起来，而岁数大些的那个一本正经地反问道：

“哪一个玛特廖娜？是很老的那一个吗？”

“对了，她很老了。”

“哦——哦。”他拖长声音说。“那是谢梅尼哈，她住在村子尽头。我们带你去。走，费吉卡，我们带他去。”

“那么马怎么办？”

“那不要紧！”

费吉卡同意了。他们三人就一起沿着街道往坡上走。

## 五

聂赫留朵夫觉得同孩子们一起比同大人一起自在得多。一路上他同他们随便聊天。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再笑，而象那个大孩子一样懂事地说话。

“那么，你们村里谁家最穷啊？”聂赫留朵夫问。

“谁家穷？米哈伊拉，谢苗·玛卡罗夫，还有玛尔法也穷得要命。”

“还有阿尼霞，比她还要穷。阿尼霞连一头母牛都没有，他们在过讨饭的生活呢？”小费吉卡说。

“她没有牛，但他们家总共才三个人，可玛尔法家有五个人呢。”大孩子反驳说。

“可阿尼霞到底是个寡妇哇。”穿粉红衬衫的男孩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说阿尼霞是寡妇，人家玛尔法也同寡妇没什么两样。”大孩子接着说。“她丈夫不在家，同寡妇一样。”

“她丈夫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

“蹲监牢，喂虱子。”大孩子用老百姓惯常的说法回答。

“去年夏天他在东家树林里砍了两棵小桦树，就被送去坐牢。”穿粉红衬衫的男孩赶紧补充说。“到如今都关了有五个

多月了，他老婆在要饭，还有三个孩子，一个害病的老太婆。”他仔仔细细地说。

“她住在哪儿？”聂赫留朵夫问。

“喏，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男孩指着一所房子说。房子前面有一个非常瘦小的淡黄头发男孩。那孩子生着一双罗圈腿，身子摇摇晃晃，站在聂赫留朵夫走着的那条小路上。

“华西卡，你这淘气鬼，跑到哪儿去了？”一个穿着脏得象沾满炉灰的布衫的女人从小屋里跑出来，大声喊叫道。她神色惊惶地跑到聂赫留朵夫前面，抱起孩子就往屋里跑，好象怕聂赫留朵夫会欺负他似的。

这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女人，她的丈夫因为砍伐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小桦树而坐牢。

“那么，玛特廖娜呢，她穷吗？”聂赫留朵夫问，这时他们已经快走到玛特廖娜的小屋。

“她穷吗？她在卖酒。”穿粉红衬衫的瘦男孩断然回答。

聂赫留朵夫走到玛特廖娜小屋跟前，把两个孩子打发走，自己走进门廊，进到屋子里。玛特廖娜老婆子的小屋只有六俄尺长，要是高个子躺到炉子后面的床上，就无法伸直身子。聂赫留朵夫心里想：“卡秋莎就是在这张床上生了孩子，后来又生了病的。”玛特廖娜的整个小屋几乎被一架织布机占满。老婆子和她的孙女正在修理织布机。聂赫留朵夫进门时，头在门楣上撞了一下。另外两个孩子紧跟着他钻进小屋，小手抓住门框，站在他后面。

“你找谁？”老婆子正因织布机出了毛病，心里很不高兴，怒气冲冲地问。再说，她贩卖私酒，见了陌生人就害怕。



“我是地主。我想跟您谈谈。”

老婆子不再吭声，仔细对他瞧了瞧，他脸色顿时变了。

“啊呀，我的主人儿，我这傻瓜可没认出您来呀，我还以为是什么过路人呢。”玛特廖娜装出亲热的口气说。“哎哟，我的好老爷呀……”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最好不要有外人在场。”聂赫留朵夫望着打开的门说。门口站着几个孩子，孩子后面站着一个手里抱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娃娃的瘦女人。那娃娃十分虚弱，但一直笑嘻嘻的，头上戴着一顶碎布缝成的小圆帽。

“有什么好看的，我来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把拐杖给我！”老婆子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把门关上，听见没有！”

孩子们一哄而散，抱娃娃的女人把房门关上。

“我正在琢磨，这是谁来了？原来是老爷，是我们的心肝宝贝，百看不厌的美男子！”老婆子说。“您怎么光临我们这个穷地方了，也不嫌这儿脏。啊，您真象金刚钻一样好看！来吧，老爷，这儿坐，就坐在这个矮柜上吧。”她说着用围裙擦擦矮柜。“我还以为是哪个鬼溜进来了，原来是东家，是好老爷，是恩人，是养活我们的好人。你可得原谅我这老糊涂，是我瞎了眼。”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老婆子站在他面前，右手托住脸颊，左手抓住尖尖的右臂肘，用唱歌一般的声音讲起来：

“老爷，你也见老了。想当年你真是棵鲜嫩鲜嫩的牛蒡。可是现在呢，简直认不出来了！你准是太操心了。”

“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件事的，您还记得卡秋莎·玛丝洛娃吗？”

“卡吉琳娜吗？怎么不记得，她是我的外甥女……怎么不记得，我为了她流过多少眼泪，流过多少眼泪！那件事我全知道。我的老爷，谁在上帝面前没有作过孽？谁在皇上面前没有犯过法？年轻人嘛，就是这样的，再加上喝了咖啡红茶，就让魔鬼迷了心窍。要知道，魔鬼可厉害了。有什么办法呢！你又没有把她扔掉，你赏了她钱，给了她整整一百卢布。可她干了什么呀？她就是没有头脑糊涂。她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会过日子了。她虽是我的外甥女，我得直说，这姑娘不走正道。我后来给她安排了一个多好的差使，可她不听话，竟然骂起东家来了。难道我们这类人可以骂老爷吗？人家就把她辞掉了。后来又和林务官家里干，日子本来也过得去，可她又不干了。”

“我想打听一下那孩子的情况。她不是在您这儿生了个孩子吗？那孩子在哪儿？”

“当年为了那娃娃我费了不少心思，我的好老爷。她那时病得太厉害，我料想她再也起不了床了。我就照规矩给孩子受了洗，把他送到育婴堂。哎，做母亲的眼看就要死了，何必叫这小宝贝的灵魂受罪呢。换了别人，就会把娃娃撂下不管，也不会给他吃，让他去死算了。可我想还是花点力气，把他送育婴堂吧。好在还有几个钱，就打发人把他送去了。”

“有登记号码吗？”

“号码是有的，可他当时就死了。她说刚一送到，他就死了。”

“她是谁？”

“就是住在斯科罗德诺耶村的那个女人。她是专干这个行

当的。她叫玛拉尼雅，现在死了。这女人可聪明啦，干得挺灵巧！人家把娃娃送到她家里，她就收下来养在家里，喂他吃。喂了一阵子，另外凑几个再送去。咳，我的好老爷！等凑满三四个，一起送去。她干这事可聪明了：先做一个大摇篮，好象双层床，上上下下都装娃娃。摇篮上还有把手。她就这样一下子装四个娃娃，让他们脚对着脚，脑袋各在一边，免得相碰，这样一次就送走四个。她还用几个假奶头塞在娃娃嘴里，这样他们就不会吵了。”

“后来怎么样？”

“后来，卡吉琳娜的娃娃就这么被送走了。她在家里把他养了两个礼拜的样子。那娃娃在她家里就生病了。”

“那娃娃长得好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好看极了，再也找不着比他更好看的娃娃了。长得跟您一模一样。”老太婆一只眼睛眨了眨，说。

“他怎么会这样弱？一定是喂得很差吧？”

“哪里谈得上喂！只不过做做样子罢了。这也难怪，又不是自己的孩子。只要送到的时候活着就行。那女人说刚把他送到莫斯科，就断气了。她连证明都带回来了，手续齐备，真是个聪明女人。”

关于他的孩子，聂赫留朵夫就只打听到这些。

## 六

聂赫留朵夫出来时在小屋的门楣上和门廊的门楣上又接连碰了两次头，才来到街上。穿白衬衫的、穿灰衬衫的、穿粉红衬衫的几个孩子都在门外等他。另外还有几个孩子也凑到他身边来。另有几个抱婴儿的女人也在等他，包括那个不费劲地抱着头戴碎布小圆帽、脸色苍白的娃娃的瘦女人。这娃娃的脸象个小老头，但一直现出古怪的笑容，摆动着痉挛的大拇指。聂赫留朵夫明白这是一种痛苦的笑容。他打听这个女人是谁。

“她就是我对你说的那个阿尼霞。”岁数大些的男孩说。

聂赫留朵夫转身招呼阿尼霞。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问。“你靠什么过活？”

“怎么过活吗？要饭。”阿尼霞说着哭起来。

模样象小老头的娃娃整个脸上浮起笑容，同时扭动两条象蚯蚓一般的细腿。

聂赫留朵夫掏出皮夹子，给了那女人十个卢布。还没有走出两步，另一个抱娃娃的女人就追上了他，然后是一个老太婆，接着又是一个女人。她们都诉说着自己的穷困，要求周济。聂赫留朵夫把皮夹子里的六十卢布零钱都散发掉后，十

分忧郁地走回家，也就是回到管家的厢房。管家笑咪咪地迎接他，告诉他农民将在傍晚集合。聂赫留朵夫向他道了谢，没有进房间，而走到花园里，在撒满白色苹果花瓣、杂草丛生的小径上徘徊，回忆着刚才见到的种种情景。

厢房周围先是静悄悄的，但过了一会儿，聂赫留朵夫听见管家房里传来两个女人愤怒的争吵声，偶尔还夹杂着管家笑吟吟的平静声音。聂赫留朵夫留神倾听。

“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你为什么还要扯下我脖子上的十字架？”一个女人的愤怒声音说。

“你要知道，它刚闯进去。”另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说，你还给我吧。你何必折磨牲口，还害得我孩子没有牛奶吃！”

“你得赔钱，或者做工来抵偿。”管家若无其事地回答。

聂赫留朵夫走出花园，来到厢房的台阶前。那里站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其中一个怀了孕，看样子快要分娩了。管家身穿帆布大衣，双手插在口袋里，也站在门口台阶上。两个女人一看见东家，都不作声了，动手理理头上的头巾；管家从口袋里抽出手，脸上泛起了笑容。

事情是这样的：据管家说，农民常常故意把小牛甚至奶牛放到东家草场上。现在，这两个农妇的两头奶牛就在草场上被捉住，被赶到这里来了。管家要罚每头奶牛三十戈比，或者做两天工抵偿。两个农妇再三说，第一，她们的奶牛是偶然闯进来的，第二，她们没有钱，第三，她们即使答应做工抵偿，也要求先立刻放还这两头牛，因为它们一早就在太阳底下曝晒，没有吃过一点饲料，正在那里可怜地嗷嗷叫。

“我向你们提过多少次了。”管家一面笑嘻嘻地说，一面

回头瞧瞧聂赫留朵夫，仿佛要请他做见证似的，“要是你们回家吃午饭，一定得把牲口看好。”

“我刚离开去看看我的娃娃，那些畜生就离开了。”

“你既然在放牛，就不能随便走掉。”

“那么叫谁去喂娃娃呢？总不能要你去喂奶吧。”

“要是牲口真的踩坏了草场，那我们也没有话说，可是它只是刚跑进去。”另一个女人说。

“整个草场都被踩坏了。”管家对聂赫留朵夫说。“要是不处分她们，将来一点干草都收不到。”

“哎，别造孽了。”怀孕的女人叫道。“我的牲口从来没有被人捉住过。”

“喏，这会儿可被捉住了，你要么罚款，要么做工抵偿。”

“算了，做工就做工，你快把牛放了，别把它饿死了！”她恶狠狠地嚷道。“人家没日没夜地干。我婆婆生病。我丈夫只知道灌酒。我一个人里里外外忙个没完，气力都用尽了。你还要逼人家做工，也不怕罪过！”

聂赫留朵夫叫管家把牛放了，自己走到花园里继续想心事，但此时已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他觉得事情一清二楚，因此弄不懂象这样清楚的问题人家怎么看不出，他自己又怎么这样长久一直没有看出来。

“老百姓纷纷死亡，他们对死已不当一回事，因为经常有人死亡。儿童夭折，妇女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东西。老百姓一步一步落入这种悲惨的境地，他们自己却未发觉，也不怨天尤人。而我们就认为这种状况历来如此，理所当然。”现在他十分清楚，老

百姓知道并经常提及，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唯一能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被地主霸占了；他十分清楚，儿童和老人纷纷死亡，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吃，而所以没有牛奶吃，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放牧牲口，又收不到粮食和干草；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的全部灾殃，或者说老百姓遭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而在那些享有土地所有权、靠老百姓劳动过活的人手里。老百姓渴望土地，由于缺地而死去，但土地又靠他们耕种，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又被卖到国外去，这样地主就可以给自己买礼帽、手杖、马车、青铜摆件等东西。这一点聂赫留朵夫十分清楚，就象不放马到牧场上去吃草而把它们关在围墙里，它们吃光围墙里的草就会消瘦，就会饿死一样……这种现象真是太可怕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设法消灭，至少自己不能参与。“我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他在最近一条桦树夹峙的小径上徘徊，同时想。“各种学术团体、政府机关和报纸都在讨论老百姓贫穷的原因和改善他们生活的办法，唯独忽略这种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不再从他们手里夺走他们必需的土地。”他清楚地想起亨利·乔治的基本原理，想起当年他对它的信奉，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不能成为商品，就象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人人都有权享用土地，享用土地提供的一切。”现在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一想到处理库兹明斯科耶土地的办法，就感到害臊。他在欺骗自己。他明明知道谁也无权占有土地，却还要肯定自己享有这种权利。他把一部分土地收益送给农民，但在灵魂深处他知道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今后他不打算再这样做，并

且要改变库兹明斯科耶的那套办法。他心里拟定了一个方案，把土地交给农民，收取租金，并规定地租是农民的财产，由他们自己支配，缴纳税款或用作公益事业。这不是单一税，但在现行制度下是最接近单一税的办法。不过主要是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他回到房子里，看见管家笑得特别高兴，还请他吃午饭，还说什么他担心妻子在那个耳朵上戴绒球的侍女帮助下做的菜会煮得太烂，烤得太熟。

还铺着一块粗桌布，上面放着一块绣花手巾代替餐巾。桌上摆着一个撒克逊古瓷汤盆，盆耳已断，盆里盛着土豆鸡汤——那只一会儿伸出这条黑腿、一会儿伸出那条黑腿的公鸡已被切成块，上面还留着些鸡毛。吃完汤以后，下道菜还是那只连毛都烤焦的公鸡。然后是加了大量奶油和砂糖的煎奶渣饼。这些菜虽然并不可口，聂赫留朵夫还是吃了下去，根本没留意他在吃些什么。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思索，把他从村子里带回来的烦恼都忘记了。

神色慌张、耳朵上戴绒球的姑娘每次上菜，管家的妻子总要从门缝向里张望，而管家则一直以他妻子的烹饪手艺而自鸣得意，笑得更欢了。

饭后，聂赫留朵夫好容易使管家坐定下来。为了看看自己的想法是否对头，同时也想对人家说说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就对管家讲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方案，并且征求他的意见。管家笑笑，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似乎早就想到过这问题，并且乐于听取聂赫留朵夫的意见。其实他对这个方案可说是一窍不通。这倒不是因为聂赫留朵夫没有讲清楚，而是



因为根据这个方案聂赫留朵夫必须为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管家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那就是人人都在损人利己。现在聂赫留朵夫竟主张土地的全部收益应成为农民的公积金，管家就以为可能是有些话他没有听懂。

“我懂了。就是说这笔公积金的利息归您收取，是不是？”管家满脸堆笑说。

“绝对不是。您要明白，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

“这话很对！”

“因此土地上的收益应归大家共享。”

“这样一来，您岂不是没有收入了？”管家收起笑容说。

“我就是不要。”

管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笑了。现在他明白了，聂赫留朵夫头脑有毛病。于是他就开始研究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的方案，看能不能从中找到对他有利的东西，并且断定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他做管家的一定能从中捞到好处。

不过，当他明白没有这样的可能时，他对方案就不再感兴趣，并且只是为了讨好东家，脸上才保持着笑容。聂赫留朵夫看到管家不再理解他，就让他走了，自己则在刀痕累累、墨迹斑斑的桌旁坐下来，动手起草他的方案。

太阳已落到吐出翠绿新叶的菩提树后面，蚊群飞进屋里，不住叮着聂赫留朵夫。他刚写完方案草稿，就听见村子里传来牲口的叫声、吱嘎的开门声，以及来开会的农民的谈话声。聂赫留朵夫对管家说，不必叫农民到帐房来，他决定亲自到集合农民的院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喝完管家端给他的一杯茶，就匆匆往村子里走去。

## 七

村长的院子里人声鼎沸，但聂赫留朵夫一到，农民们就停止交谈，并且象在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那样纷纷脱下帽子。这里的农民比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要穷得多。村里的姑娘和婆娘耳朵上都戴着绒球，男人则几乎个个穿着树皮鞋、粗布衫和老式长外衣。有几个光着脚板，只穿一件衬衫，仿佛刚干完活回来。

聂赫留朵夫提起精神向农民们宣布，他打算把土地都交给他们。农民都不作声，脸上表情也毫无变化。

“因为我认为。”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不种地的不应该占有土地，而且人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话说得很对。”几个农民响应说。

聂赫留朵夫又说，土地的收入应该大家平分。因此他建议他们接受土地，付出他们自己定的价钱作为公积金，这笔公积金今后仍归他们享用。院子里又传出一片称赞声，但农民们严肃的脸色却也越来越严肃了，原来瞅着东家的眼睛都垂了下去，仿佛看穿了他的诡计，谁也不愿上当，但又不愿使他难堪。

聂赫留朵夫讲得相当清楚，农民也都是明白的，但这会

儿他们不理解他的话。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话，就同管家无法理解他的话一样。他们深信，维护自己利益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点不容置疑。他们通过祖祖辈辈的经验知道，地主总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因此，要是地主把他们召拢来，向他们提出什么新办法，那准是想用更狡猾的手段来欺骗他们。

“那么，你们打算定个什么价钱呢？”聂赫留朵夫问。

“怎么要我们来定价钱？我们可不能定。地是您的，权柄在您手里。”人群中有人回答。

“不，这些钱将来都要用在你们村的公益事业上。”

“这我们不能定。村是村，钱是钱。”

“你们要明白。”管家跟在聂赫留朵夫后面，想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含笑说：“公爵老爷把土地交给你们，要你们出一笔钱，但这笔钱又当作你们的本钱，供村社使用。”

“这号事我们太明白了。”一个牙齿脱落的老头连眼睛都未抬，怒气冲冲地说。“这事有点象银行，到时候就得付钱。我们不来这一套，由于我们已经够苦的了。再来这一套，非得破产不可。”

“用不着这一套。我们还是照老规矩办吧。”有几个人发出不满意的、甚至粗鲁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提出要立一个契约，他将在上面签字，他们也得签字。他们听了，反对得更加激烈。

“签字干什么？以前我们怎样干活，以后还是怎样干活。来这一套干什么？我们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

“我们不同意，因为这一套弄不惯。以前怎么办，以后还

怎么办。只要种子能取消就好了。”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所谓取消种子，就是说，照现行规矩，在对分制的农田上种子应由农民自己出，现在他们要求种子由地主出。

“这么说，你们拒绝这个办法，不愿接受土地罗？”聂赫留朵夫对一个年纪轻轻、面色红润的赤脚农民说。这个农民身穿破旧的老式长外衣，弯着左胳膊，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得特别直，就象士兵听到脱帽的口令拿着帽子那样。

“是，老爷。”这个农民说，他显然还没有改掉士兵的习惯，一听到口令，就好象中了催眠术。

“这么说，你们的地够种啦？”聂赫留朵夫说。

“不，老爷。”这个退伍士兵装出快乐的神气回答，竭力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前面，仿佛要把它奉送给愿意要的人。

“嗯，你们还是把我的话好好想想吧。”聂赫留朵夫感到困惑不解，把他的建议又说了一遍。

“我们没什么好想的。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做。”脸色阴沉、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说。

“我明天还要在这儿待一天。你们要是改变主意，就派人来对我说。”

农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聂赫留朵夫就这样一无所获，失望地回到帐房里。

“我老实对您说吧，公爵。”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管家说，“您同他们是谈不到一起的，这些老百姓顽固得很。开起来，他们总是固执得要命，谁也说服不了他们。他们什么事情都有顾虑。那些庄稼汉，白头发的也好，黑头发的也好，尽管不同意你的办法，可人都挺聪明。他们到帐房里来，你

只要请他们坐下来喝杯茶。”管家笑嘻嘻地说，“一谈起来，真是海阔天空，头头是道，活象一位大臣。可是一开会，就换了个人，咬定一点，死不改口……”

“那么，能不能找几个最明白事理的农民来这里？”聂赫留朵夫说，“我想给他们详细解释解释。”

“这个行。”管家笑嘻嘻地说。

“那么就请您约他们明天来一下。”

“这都好办，我召集他们明天来就是了。”管家说，更加欢畅地笑了笑。

“瞧，他这人真鬼！”一个皮肤黝黑、胡子蓬乱的庄稼汉晃晃荡荡地骑着一匹肥马，对旁边那个身穿破旧老式长外衣、又老又瘦的庄稼汉说。那个庄稼汉所骑的马，腿上的铁绊索叮咚作响。

这两个庄稼汉夜里到大路上放马，并无视他们的马溜到地主的树林里吃草。

“‘你只要签个字，我就把土地白白送给你。’哼，他们捉弄咱们还不够吗！不成，老兄，办不到，如今我们也学乖了。”他接着说，同时叫唤一匹离群的周岁马驹。“小驹子，小驹子！”他想把马驹叫住，可是回头一看，马驹不在后面，而是往斜里闯到草场上去了。

“瞧你这狗杂种，溜到东家草场上去了。”皮肤黝黑、胡子蓬乱的庄稼汉听见那匹离群的马驹一面嘶鸣，一面在露珠滚滚、野草芳香的洼地上奔跑，踩得嚓嚓发响，叫嚷着。

“你听见吗，草场上都长满杂草了，到了休息日得打发娘

儿们到对分制田里去锄草。”穿破旧老式长外衣的瘦庄稼汉说，“要不然镰刀都会割坏的。”

“他说‘你签个字吧’。”胡子蓬乱的庄稼汉继续评论东家的话。“你一签字，他就会把你一口活活吞下肚子去。”

“这话一点不错。”年纪老的那一个应和说。

他们不再说什么。只听得坚硬的大路上响起得得的马蹄声。

## 八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他们已把帐房收拾干净供他过夜。帐房里有一张高大的床，铺着鸭绒垫子，放着两个枕头，还有一条厚得卷不拢的大红双人被子，织得很细密，带有花纹，大概是管家妻子的嫁妆。管家请聂赫留朵夫吃中午剩下的饭菜，但被聂赫留朵夫谢绝了。管家对伙食的粗劣和条件简陋表示歉意，然后告辞，把聂赫留朵夫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农民们的拒绝并没有使聂赫留朵夫感到丝毫困惑。正好相反，尽管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接受他的建议并再三向他道谢，而这里的农民却不信任他，甚至对他抱着敌意，他却觉得心情平静而快乐。帐房里又闷又脏。聂赫留朵夫走到户外，

想到花园里去，可是一想到那个夜晚，想到侍女房间的窗户，想到后门廊，他就不愿再到那些被罪恶的往事玷污的地方去。他又坐在门廊里，吸着充满桦树嫩叶浓香的温暖空气，久久地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花园，聆听磨坊汨汨的流水声、夜莺的鸣啭和门廊附近灌木丛里一只小鸟的单调叫声。管家窗子里的灯光早已熄灭了。东方，在仓房后面，初升的月亮倾泻出一片银光。远处传来雷声，三分之一的天空被乌云遮住。空中的闪电越来越清楚地照亮鲜花盛开的花园和颓败的房子。夜莺和其他鸟类都停止了鸣叫。在磨坊的流水声中传来鹅的嘎嘎声。然后在村子里，在管家院子里，早醒的公鸡开始啼叫——每逢雷雨交加前夕的闷热夜晚，它们总是叫得特别早。俗话说：夜晚过得好，公鸡啼得早。对聂赫留朵夫来说，那个夜晚不止过得好。是个欢乐幸福的夜晚。他那时还是个单纯的少年，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种种情景如今都历历在目。他觉得现在不仅同当年一样快活，而且如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样幸福。他不仅记得，而且重新体验到，在十四岁那年他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向他揭示的真理。他还记得，小时候怎样伏在妈妈膝盖上，哭着向她告别，答应她永远做个好孩子，决不使她伤心。他还记得小时候同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一起说定，他们将互相帮助过高尚的生活，并尽力为一切人谋幸福。

这会儿，他也想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经受的诱惑：他留恋他的房子、树林、农庄和土地。如今他问自己：他是不是还舍不得那些东西？他甚至觉得奇怪，他居然会留恋那些东西。他想起白天见到的种种景象：那带着几个孩子而失去丈

夫的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因为砍伐他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树木而坐牢的；还有那荒唐的玛特廖娜，她居然认为或者至少口头上说，象她们那种女人理应充当东家的情妇；还有她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把孩子送往育婴堂的办法；那个头戴小圆帽、样子象小老头、不住地苦笑的不幸孩子，因为吃不饱而奄奄一息；那个怀孕的瘦弱女人，因为劳累过度，没有看好饥饿的奶牛而被迫为他白白做工。他又想到了监狱、阴阳头、牢房、恶臭和镣铐，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以及京城里全体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事情一清二楚，不容怀疑。

一轮近乎圆满的明月从仓房后面升起，院子里布满了黑黑的阴影，破房子的铁皮屋顶都被照得闪闪发亮。

一只夜莺沉默了一阵，似乎不愿辜负这皎洁的月光，又在花园里鸣啭起来。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决定今后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他想起他怎样被这些问题困扰，无法解决，因为他对每个问题都顾虑重重。现在他又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发现它们都很简单，不禁感到奇怪。所以变得简单，因为他现在不再考虑对他将有什么后果，甚至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而只考虑照道理应该怎么办。说也奇怪，应该为自己作些什么，他简直毫无主张，可是应该为别人作些什么，他却一清二楚。现在他明白，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因为保留土地是很自私的。他明白，不应该撇下卡秋莎，而应该帮助她，不惜任何代价向她赎罪。他明白，必须研究、分析、理解一切同审判和刑罚有关的问题，因为他看出一些别人没有看出来的事。这一切会有什么后果，他不知



道，但他明白，不论是第一件事，亦或第二件事，还是第三件事，他都非做不可。这种坚强的信念使他感到快乐。

乌云逼近了。现在看见的已不是远处朦胧的电光，而是照亮整个院子、破屋和倒塌门廊的明亮闪电。雷声在头上隆隆震响。鸟雀都已停止鸣叫，但树叶却飒飒地响起来，风一直吹到聂赫留朵夫坐着的门廊里，吹动了他的头发。大颗的雨点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敲打着牛蒡叶子和铁皮屋顶。一道明晃晃的闪电照亮整个天空，刹那间万籁俱寂。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从一数到三，一声霹雳就在头上打响，接着空中隆隆地滚过一阵响雷。

聂赫留朵夫走进屋里。

“真的，真的。”他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的全部意义，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有两个姑妈？为什么尼科连卡死了，可我却活着？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一个卡秋莎？我怎么会对她疯疯癫癫？为什么要发生那场战争？后来我怎么过起放荡的生活来？要理解这一切，理解主的全部事情，我无能为力。但执行深铭在我心灵里的主的意志，则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这样做，自然就心安理得。”

滴滴答答的小雨已变成倾盆大雨，雨水从屋顶上泻下来，哗哗地落到一个木桶里；闪电不时照亮院子和房屋，但不那么频繁了。聂赫留朵夫回到屋里，脱下衣服，躺到床上，但担心有臭虫，因为肮脏的破墙纸里很可能藏着臭虫。

“是的，我不是东家而是仆人。”他这样想，心里感到高兴。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刚一熄灯，小虫就来咬他了。

“交出土地，到西伯利亚去，西伯利亚有的是跳蚤、臭虫、肮脏……那有什么了不起，既然得受这种罪，我也受得了。”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愿望，他还是受不了这个罪。他起来坐到打开的窗口前，欣赏着渐渐远去的乌云和重新露面的月亮。

## 九

聂赫留朵夫直到下半夜才睡着，因此第二天醒得很迟。

中午，七名被推选出来的庄稼汉应管家的邀请来到苹果园的苹果树下。管家安排了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都是用木桩打进地里，再铺上木板搭成的。聂赫留朵夫和管家费了不少口舌才使农民戴上帽子，在板凳上坐下。那个退伍的士兵现在包着干净的包脚布，穿一双干净的树皮鞋，特别恭敬地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胸前，仿佛送丧一般。直到那个肩膀宽阔、相貌端正的老农戴上他的大帽子，紧了紧崭新的土布长外衣，走到长凳旁坐下，其余的人才学着他的样，戴上帽子，落坐了。这个老农留着花白的髭曲大胡子，活象米开朗琪罗塑造的摩西，他那光秃的前额被太阳晒得发黑，周围生着花白的髻发。

等大家都坐好，聂赫留朵夫也在他们对面坐下来，臂肘

撑在桌上，面前摆着一张纸，他根据纸上的提纲开始说明他的方案。

不知是因为今天农民少一些呢，还是因为聂赫留朵夫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只关心大家的事，今天他并不感到心慌意乱。他自然而然地主要对肩膀宽阔、留花白大胡子的老农说话，看他赞成还是反对。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估计错了。这个相貌端正的老农虽然有时也赞同地点点他那具有家长气派的头，有时听到别人的反驳就皱着眉摇摇头，但其实他并不太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往往要等别的农民用他们自己的话重新解释一番，他才明白。倒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小老头比较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这个小老头瞎了一只眼睛，脸上几乎没有胡子，身穿一件打过补丁的土黄布紧身外衣，脚上套着一双后跟磨歪的旧皮靴。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砌炉匠。这个小老头飞速地动着眉毛，留神倾听，立刻把聂赫留朵夫的话翻译一遍。那个身材矮壮、留着雪白大胡子、一双机灵炯炯有神的眼睛的老头儿也很能领会他的话，并且找各种时机插几句嘴嘲弄东家，借此卖弄自己的小聪明。退伍士兵看样子也很懂事，可惜长期的士兵生活使他头脑迟钝，而士兵的习惯又使他讲起话来叫人摸不着头脑。对这事态度最认真的是那个声音低沉、鼻子很长、蓄有一小撮山羊胡子的高个子。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土布衣服和一双新树皮鞋，完全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而且非不得已不开口。还有两个老头儿——一个就是昨天在会上坚决反对聂赫留朵夫一切建议的牙齿脱落的老头儿；另一个老头个儿很高，头发全白，相貌和善，瘸腿，两只瘦脚用雪白的包脚布裹着，外套一双农民靴子——几乎

没有开过口，虽然一直很用心地听着。

聂赫留朵夫首先说明他对土地所有制的看法。

“照我看。”他说，“土地不能买进，也不能卖出。如果可以买卖，那么有钱人就可以买进全部土地，他们就可以凭土地所有权任意夺取没有土地的人的东西。哪怕你在地上站一下，他们也要向你收钱。”他引用斯宾塞的理论补充说。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翅膀捆起来，看他还能不能上天。”留花白大胡子的老头眼含笑意说。

“这话说得不错。”长鼻子老头声音低沉地说。

“是的，老爷。”退伍的士兵说。

“有个婆娘给她的奶牛割了点儿草，就被抓起来，送去坐牢。”相貌和蔼的瘸腿老头说。

“我们自己的地在五俄里外。租地又贵得要命；付了地租，本钱都不能捞回来。”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补充说，“人家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比劳役制还糟。”

“我同你们想的一样。我认为占有土地是罪孽。因此我要把土地交出去。”聂赫留朵夫说。

“嗯，这可是好事。”留摩西式髭曲大胡子的老头说，显然以为聂赫留朵夫想出租土地。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我不想再占有土地了。现在就是想一下，土地应该怎么分。”

“把地交给庄稼汉，不就成了吗？”牙齿脱落、怒容满面的老头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句话含有怀疑他诚意的味道，乍一听来叫人很不舒服。但他立刻镇静下来，赶紧说完自己要说的

话。

“我是愿意交的。”他说，“可是交给谁？怎么交？交给哪些庄稼汉？还有，为什么要交给你们村社而不交给杰明斯科耶村社？”（这是邻近的一个村，那里份地很少。）

大家都不作声，只有退伍士兵说了一句：

“是的，老爷。”

“那么，好吧。”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倒说说，要是皇上说把地主的地都拿过来，分给农民……”

“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牙齿脱落的老头儿说。

“没有，皇上什么也没有说。这只是我说的：要是皇上说，把地主的地都拿出来交给农民，你们怎么办？”

“怎么办？把全部土地按人头平分，庄稼人有份，老爷也有份。”砌炉匠忽上忽下地迅速动着眉毛，说。

“要不又怎么办？按人头平分好了。”相貌和善、裹白色包脚布的瘸腿老头说。

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认为它能使人人满意。

“到底怎样按人头分呢？”聂赫留朵夫问。“做佣人的也有份吗？”

“绝对不行，老爷。”退伍士兵说，竭力想显出既快乐又有精神的样子。

不过，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不同意他的意见。

“既然分，那就该人人有份，大家平分。”他想了想，声音低沉地回答。

“不行。”聂赫留朵夫事先就准备好反驳意见。“要是大家平分，那些自己不劳动的人，譬如老爷、官吏、听差、厨师、

文书、所有的城里人，就都可以领到一份，他们可以把地卖给有钱人。这样土地就又集中到财主手里。那些靠自己一小块地过活的人，他们生儿育女，人口增加，土地就更加分散。财主又能把缺地的人抓在手里。”

“是，老爷。”退伍士兵赶快响应。

“那就得禁止买卖土地，只有自己耕种的人才有地。”砌炉匠怒气冲冲地打断退伍士兵说。

聂赫留朵夫反驳说，谁在给自己耕种，谁在给别人耕种，很难区别。

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大家用合作社方式耕种。

“凡是种地的就分，凡是不种地的就不分。”他用坚决的低音说。

对这种共产主义式方案，聂赫留朵夫也准备好了反对意见。他说，想做到这一点，就得人人有犁，人人有同样的马，谁也不能比谁差，或者马匹、犁、脱粒机和整个农场都是公有的，而要共同经营，还得大家意见一致。

“我们老百姓是死也不会同意的。”怒容满面的老头说。

“这样打架就打不完了。”眼睛含笑的白胡子老头说。“娘儿们肯定会彼此把眼珠都挖出来。”

“再说，土地有肥有贫，怎么办？”聂赫留朵夫说。“凭什么有人能分到黑土，有人只能分到粘土和砂地呢？”

“那只好把所有的地都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大家平分。”砌炉匠说。

聂赫留朵夫反对说，问题不在于一个村社分地，而在于

各省都要全分。要是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那么凭什么有人分到好地，有人只能分到坏地呢？人人都想分到好地。

“是，老爷。”退伍士兵说。

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因此事情并不象看起来那么简单。”聂赫留朵夫说。“这一层不仅我们在考虑，许多人都在考虑。有一个叫乔治的美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意他的意见。”

“反正你是东家，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谁敢拦着你？你作主就行了。”怒容满面的老头儿说。

这种插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窘迫，但他高兴地发现，对这种插话感到不满的，不止他一个人。

“等一下，谢苗大叔，你让他把话说完。”明白事理的农民用威严的低音说。

他这番话使聂赫留朵夫得到了鼓舞，就向他们说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属于上帝。”他讲道。

“对，这话不错。”有几个人同声回答。

“土地都是公有的，人人享有同等权利。土地有好有坏，谁都想得到好地。那么，该怎样分才公平呢？该这么办：凡是分到好地的人就该按地价付钱给没有土地的人。”聂赫留朵夫自问自答。“但究竟谁应该付钱给谁，很难确定；再说村社公益事业也需要筹款。因此得这么办：凡是分到土地的人，都要按地价付钱给村社作用途。这样就公平合理了。你想要土地，就得付钱，好地多付些，坏地少付些。你不要土地，就不用出钱，公益金就由拿到土地的人替你付。”

“这样比较合理。”砌炉匠动动眉毛说，“谁的地好，谁就多出些钱。”

“那乔治倒是个有头脑的人。”相貌端正、胡子髭曲的老头说。

“但价钱要大家出得起才好。”高个儿农民声音低沉地说，显然已预见到下一步的问题。

“价钱不能定得太贵，也不能太便宜……要是太贵，人家付不起，就会亏空；要是太便宜，相互买卖，就会拿土地做生意。我在这里就是要把这件事办好。”

“这话很对，这话有理。行，这样办很好。”农民们说。

“他的头脑行。”肩膀宽阔、头发髭曲的老头又说。“那个乔治！想出来的办法多好。”

“那么，要是我希望弄到一块地，该怎么办？”管家笑嘻嘻地说。

“要是有空地，您就自己拿去种吧。”聂赫留朵夫说。

“你要地干什么？没有地你也够饱的了。”眼睛含笑的老头说。

会议到此结束。

聂赫留朵夫把他的建议重复了一遍，但并不要他们当场答复，而是劝他们同大伙商量商量，再来给他答复。

农民们说他们会去同大伙商量，然后再给他答复。他们告别了东家，心情激动地走了。他们响亮的说话声，久久地从大路上传来，越来越远。但村子里农民们的谈话声从河上传来，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农民们没有干活，都在讨论东家的建议。全村



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家的建议对他们有利，没有危险；另一派认为其中有诈，但不知道诈在哪里，因此顾虑重重。不过到第三天，大家都同意东家的建议，走来向聂赫留朵夫宣布整个村社的决定。在接受东家的建议上，有个老太婆的一番话起了作用。她说东家在考虑他的灵魂，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灵魂。老头儿们同意她的话，这就取消了对东家行为有诈的忧虑。聂赫留朵夫在巴诺伏逗留期间施舍了不少钱，这也证实老太婆的解释有道理。不过，聂赫留朵夫在这里施舍钱财，起因是他第一次看到本地农民贫穷和困苦的程度，大为震惊，因此虽然知道施舍是不合理的，但还是忍不住散发了一些钱。目前他手头的钱特别多，因为收到了去年出售库兹明斯科耶树林的钱，还有出卖农具的定金。

老百姓听说东家对求告的人都给了钱，顿时就有许多人从附近各村赶来求他帮助，其中主要是妇女。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按什么原则行事，该周济谁，该给多少。他觉得既然他有的是钱，就应该周济那些确实很穷的求告者。不过，有求必应却是没有意思的。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一走了事。他就赶紧离开这地方。

在巴诺伏逗留的最后一天，聂赫留朵夫来到正屋，清理房子里的杂物。在清理时，他在姑妈那个配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柜底下的抽屉里找到许多信件，里面夹着一张几个人合拍的照片，上面有索菲雅姑妈、玛丽雅姑妈、做大学生时的他和卡秋莎。卡秋莎显得纯洁、娇嫩、美丽、生气勃勃。从正房的杂物中，聂赫留朵夫只取走了信件和这张照片。其余的东西都让给了磨坊主。磨坊主通过笑嘻嘻的管家的介绍，以

十分之一的价钱买下这些东西，包括巴诺伏的正屋和全部家俱。

聂赫留朵夫回想他在库兹明斯科耶时如何舍不得放弃财产的感觉，感到奇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现在他越来越感到放下包袱的轻松愉快，并且象旅行家发现新大陆那样觉得新鲜。

## 十

聂赫留朵夫这次回城，觉得这个城市特别新奇。傍晚，他穿过一片光亮的街灯，从火车站回到寓所。个个房间里都还有臭樟脑的气味，阿格拉斐娜和柯尔尼都疲劳不堪，满腔怨气，甚至为收拾衣物吵架，而那些衣物的就在于挂出来晾一晾，透透风，再收藏起来。聂赫留朵夫的房间没有被占用，但也没有收拾好。许多箱子堵住通道，进出房间十分不便，因此聂赫留朵夫这时回来，显然妨碍了出于奇怪的习惯而发生在这里。聂赫留朵夫以前也参加过这类活动，但农村的贫困在他头脑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觉得这种活动显然是荒唐的，因此十分反感。他决定第二天就搬到旅馆去住，听凭阿格拉斐娜收拾衣物——她认为这是必要的，——直到他姐姐来了，再由她最后清理房子里的全部东西。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所房子，在监狱附近随便找了一家简陋、肮脏的配备家俱的公寓，要了两个房间，吩咐仆人把他从家里挑出来的东西搬到这里，自己就去找律师。

外边天气很冷。在雷雨之后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春寒。天很冷，风那么刺骨，聂赫留朵夫穿着薄大衣觉得身上发冷，就不断加快步伐以暖和身子。

他回忆着农村里的各种人：妇女、孩子、老人，他们的贫穷和困顿（他仿佛第一次见到似的），特别是那个模样象小老头、乱蹬着两条细细的腿、一味苦笑的孩子。他情不自禁地拿农村的情形同城里的景象作对比。他经过肉店、鱼店、服装店，看到那么多肥头大耳、衣冠楚楚的老板，不禁感到惊奇，仿佛第一次看见似的，因为乡下没有这样的人。这些老板显然满心相信，他们千方百计哄骗不识货的顾客，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十分有益的活动。在城里，丰衣足食的还有臀部肥大、背上钉有钮扣的私人马车夫，头戴饰丝绦制帽的看门人，头发髻曲、身着围裙的侍女。特别显眼的是那些后脑勺剃得光光的出租马车夫，他们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轻便马车上，鄙夷而好色地打量着过往行人。聂赫留朵夫发现这些人都是乡下人，他们丧失了土地，因此被迫进城。这些乡下人中间，有的善于利用城市条件，过起上等人的生活，并且洋洋自得。但有的在城里过的生活比乡下还不如，因此更显得可怜。聂赫留朵夫觉得那些在地下室窗口干活的鞋匠，就是这种可怜人；还有那些洗衣女工也是挺可怜的，她们身体干瘦，脸色苍白，披头散发，露出瘦胳膊，在敞开的窗前熨衣服，而从窗子里不断冒出带肥皂味的蒸汽。聂赫留朵夫遇

见的两个油漆工也同样可怜，他们系着围裙，赤脚套着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他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露出晒得黑黑的筋脉毕露的胳膊，手里提着油漆桶，不住地相互对骂。他们的脸色显得疲劳而愤怒。运货马车夫，一身灰土，脸色乌黑，坐在大板车上摇摇晃晃，也是同样的脸色。那些衣衫褴褛、面孔浮肿，带着孩子站在街角要饭的男女，也是这样的脸色。聂赫留朵夫乘车经过小饭店，从窗子里望见里面的人也是这样的脸色。那儿，在几张摆满酒瓶和茶具的肮脏桌子之间，穿白衣服的堂倌正摇晃着身子，来回穿梭，桌子周围坐着些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而神情呆滞的人，嘴里又嚷又唱。有一个人皱起眉头，努出嘴唇，眼睛呆呆地瞪着前方，坐在窗口仿佛在拼命回想什么事。

“他们聚集在这儿想做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不由自主地吸着由寒风送来的灰尘和空气中新鲜油漆的刺鼻味儿。

在一条街上，一队运铁器的货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发出可怕的隆隆声，追上了他，震得他脑袋和耳朵作痛。他加紧步伐，想赶到货车前头去。在这铁器的隆隆声中，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慌忙停住脚步，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辆轻便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军官，容光焕发，肤色红润，留着两端翘起的八字胡子，胡子上涂过油。他热情地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笑得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聂赫留朵夫！是你吗？”

聂赫留朵夫开始感到很高兴。

“啊！申包克！”他快活地说，但他立刻明白，根本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这就是当年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去过的申包克。聂赫留朵夫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不过听说他尽管一身是债，从步兵团调到了骑兵团，却不知凭什么法术始终待在有钱人圈子里。证明这一点的是他那志得意满的神气。

“啊，碰到你真是太好了！眼下我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哎，老兄，你可见老了。”申包克跳下马车，把胸脯挺起来说。“我是从你走路的样子认出你来的。喂，咱们一起吃饭去，怎么样？你们这儿哪家饭馆好些？”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奉陪。”聂赫留朵夫回答，一心想尽快摆脱这个朋友而又不至于得罪他。“你为什么事来这儿？”他问。

“有事啊，老兄。关于监护的事。我现在当上监护人了。在管理萨玛诺夫的产业。说实在的，他是个财主。他得了脑软化症。可他有五万四千俄亩土地呢！”他神气活现地说，仿佛他自己拥有这么多土地。“他那份产业被糟蹋得厉害。土地全都租给了农民。可是他们一个钱也不交，欠款就达八万多卢布。我去了一年就改变了局面，让东家增加收入百分之七十。你说怎么样？”他洋洋得意地说。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听人说过，申包克因为败光了家产，还欠下一屁股债，这才通过特殊关系，当上一个挥霍成性的老财主的产业监护人。现在他就靠这种监护工作生活。

“怎样才能摆脱他而又不至于得罪他？”聂赫留朵夫一边想，一边瞧着他那张容光焕发、胡子抹油的胖脸，听着他亲切地谈论哪家饭馆的菜好，吹嘘他搞监护工作的本领。

“嗯，咱们究竟上哪儿去吃饭呢？”

“我可没工夫。”聂赫留朵夫瞧瞧表说。

“那么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赛马。你去吗？”

“不，我不去。”

“去吧！我自己现在虽然没有马。但我总是赌格里沙的马。你记得吗？他养着几匹好马。你就去吧，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我也不能去吃晚饭。”聂赫留朵夫微笑着说。

“嘿，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现在上哪儿去？要我送你去吗？”

“我去找个律师。他住在这儿，拐个弯就到。”聂赫留朵夫说。

“噢，对了，你在监狱里忙什么事吧？你是不是在替坐牢的人说情？柯察金家的人告诉我了。”申包克笑着说。“他们已经走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倒说说！”

“对，对，这都是真的。”聂赫留朵夫回答，“但街上怎么说好呢！”

“是的，是的，你一向是个怪人。那么赛马你去看吗？”

“不，我没有时间去，也不想去。请你不要生气。”

“噢，生气，哪儿的话！你现在住在哪儿？”申包克问，忽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眼神停滞，眉头皱起。显然他想回忆一件什么事。聂赫留朵夫看到他脸上有一种迟钝的表情，同他刚才从饭店窗口里惊奇地望见的那个皱起眉头、努起嘴唇的人一模一样。

“天是很冷的吧？”

“是的，是的，很冷。”

“我买的東西在你车上吗？”申包克转身问马车夫。

“嗯，那么再见。遇见你真是愉快，真是愉快。”申包克说，接着紧紧地握了握聂赫留朵夫的手，跳上马车，把他那只戴白麂皮手套的大手举到红润的脸庞前，挥了挥，照旧露出白得异样的牙齿笑了笑。

“难道我原来也是个这样的人吗？”聂赫留朵夫一面想，一面继续往律师家走去。“是的，原来我还不完全是这样，但很希望做个这样的人，这样过上一辈子。”

## 十一

律师没有按照次序，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并且立刻谈到明肖夫母子一案。他看过这份案卷，对缺乏根据控告他们表示愤慨。

“这个案子真叫人气愤。”他说，“火很可能是房东为捞到一笔保险费自己放的。但问题在于明肖夫母子的罪行根本没有得到证实，一点罪证也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分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弄出来的。这个案子只要不转到县里，而是在这里审讯，我担保官司一定会赢，而且是免费服务。好，现在谈另一个案件。费多霞给皇上的呈文已经写好了。您要是上彼得堡，就随身带着，亲自递上去，再托托人情。要不然他们随便问一下司法部，那边敷衍了事，把它一下子推出来，

也就是驳回上诉，这样，官司就完了。您得设法送到最高当局那里去。”

“见皇上去吗？”聂赫留朵夫问。

律师笑起来。

“那可是最高级了，高得不能再高了。我说上诉委员会秘书或者主任最高当局。那么，没有别的事了吧？”

“有，我这里还有封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怪事了。我今天一定要同他们见个面，了解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冤案都要通过您一个一个流出来了。”律师笑嘻嘻地说。“实在太多了，您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真是咄咄怪事。”聂赫留朵夫说，接着就简要地讲了讲案情。有一个村子，老百姓在礼拜日聚在一起读福音书。长官走来，把他们驱散。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在一起。长官就派了警察来，写了个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他们就被判处流放。“这真是骇人听闻。”聂赫留朵夫说。“这样的事难道真有可能吗？”

“这并不奇怪？”

“一切都很怪。嗯，警察奉命捕人，这我是能理解的，但草拟起诉书的副检察官，他总是受过教育的吧？”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总以为检察官、侦讯官都是些自由



派，都是新派人。不错他们曾经是这样的人，可现在完全变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的二十号。他们领薪水，还想加薪。他们行动的全部准则就在于此。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要审判谁就审判谁，要定谁的罪都可以。”

“一个人因为同人家一起读读福音书，就被判处流放，这样的法律天下真有的吗？”

“只要证实他们在读福音书时胆敢不按教会规定解释，他们就不仅会被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而且可能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当众诽谤东正教，按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要被判处终身流放。”

“这不会的。”

“我老实告诉您，我一向对法官老爷们说。”律师接着讲下去，“我看见他们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我没有坐牢，您没有坐牢，我们大家都没有坐牢，那他们的恩德得被感谢。至于要剥夺我们每人的特权，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要是检察官和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哈哈大笑。

“哈哈，看您提出什么问题来了！哎，老兄，这可是个哲学问题呀。当然，这种问题也可以谈。您礼拜六来我家里吧。您可以遇见学者、文人和画家。到那时咱们就可以谈谈这些问题了。”律师说“这些问题”时带有嘲讽的口气。“我妻子您是认识的。您来吧！”

“好的，我想法子来。”聂赫留朵夫回答，感觉自己在说

谎。事实上，他所谓想法子，就是想法子不来参加晚会，避免同学者、文人和画家应酬。

刚才聂赫留朵夫讲到法官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并且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律师听了他的话却哈哈大笑，而在谈到“哲学”和“这些问题”时又带着特殊的语气，这使聂赫留朵夫觉得他跟律师，大概也包括律师的朋友，对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他还觉得尽管现在他跟申包克之流的旧友有了距离，但他跟律师和律师圈子里的人的距离则更大得多。

## 十二

到监狱的路很远，时间已不早了，聂赫留朵夫就雇了一辆马车。车夫是个中年人，从相貌看起来人聪明而善良。在一条街上，他向聂赫留朵夫转过身来，指给他看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

“您瞧，他们在盖一座多阔气的大楼。”他说，那副神气好象他也是这座房子的股东，因此洋洋得意。

那座房子确实很大，式样别致，结构复杂。坚固的脚手架用粗大的松木搭成，再用铁钩扣紧，围着正在兴建的大楼，一道板墙把它同街道隔开。溅满石灰浆的工人，象蚂蚁似的

在脚手架上来来往往，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劈砖头，有的在把沉甸甸的砖头和泥桶提上去，然后把空斗和空桶放下来。

一个衣着讲究的胖老爷，大概是建筑师吧，站在脚手架旁，指手划脚地对一个毕恭毕敬地听着的弗拉基米尔籍包工头说着什么。有些载满货物的大车从门里进来，有些空车从门里出去，驶过建筑师和包工头身边。

“做工的人也好，迫使他们做工的人也好，这样过日子是他们公认的。尽管工人们的妻子怀了孕，不能胜任的重活还得在家里做；他们的孩子戴着碎布小圆帽，在濒临饿死前象小老头似的露出苦笑，乱蹬着细腿；他们自己还得为一个愚蠢无用的人，一个掠夺他们并迫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么一座愚蠢无用的宫殿。”聂赫留朵夫瞧着这座房子，心里想。

“是的，盖这样的房子真是荒唐。”他不禁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生气地说，“老百姓靠它吃饭，它可不说荒唐！”

“要知道这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既然人家在盖，那就是有意义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有饭吃了。”

聂赫留朵夫不说话了，特别是因为车轮辘辘作响，说话很费力。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马车从石子路拐到驿道上，谈话就方便了。马车夫又同聂赫留朵夫聊起来。

“今年怎么有这么多乡下人涌进城里来。”他说着从驭座上转过身，给聂赫留朵夫指指一伙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和口袋迎面走来。

“这比往年多吗？”聂赫留朵夫问。

“多得多啦！今年到处都挤满人，简直要命。老板把乡下人丢来扔去，简直象刨花一样。人到处都挤满了。”

“为什么这样多呢？”

“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去。”

“人怎么会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们不肯待在乡下？”

“待在乡下没活干。没有土地呀。”

聂赫留朵夫好象一个负伤未愈的人，觉得别人总是有意把他的伤疤碰痛，其实那是因为碰到痛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感觉。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吗？”他暗想，并询问马车夫，他们村子里土地有多少，他自己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待在城里。

“老爷，我们乡下的地，每人平均只有一俄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讲起来。“我家里有父亲，一个兄弟，还有一个兄弟当兵去了。他们在地里干活，可是活不多，一会儿就完了。所以我那个弟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你们不能租地来种吗？”

“如今租不着地了？原来的地主老爷都把家产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地死死抓在手里。从他们手里你租不上土地，他们都自己经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法国人，他把我们老东家的地全买下，自己经营。他不肯出租土地，你也毫无办法。”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国人？”

“一个叫杜弗尔的法国人，您也许听说过。他曾经在大剧院里给演员做假发。那是个好买卖，他发了财。他把我们女

东家的地产全买下了。如今我们只好任他摆布。他想怎样欺侮我们就怎样欺侮我们。谢谢天老爷，他本人还是挺好的。可他娶的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雌老虎，但愿上帝保佑别让我碰上她。她搜刮起老百姓，可凶了……喏，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在大门口吗？我看他们是不让进去的。”

## 十三

聂赫留朵夫在监狱大门口拉了铃。他不知道玛丝洛娃今天情绪怎样，又想到她和她同监的人都对他保守着什么秘密，不禁心神不定，精神紧张。他向出来开门的看守说明要见玛丝洛娃。看守回去打听了一下，告诉他玛丝洛娃现在在医院里。聂赫留朵夫去了医院。医院看门的是个和善的小老头，立刻放他进去，问明他要见什么人，就把他领到儿科病房。

一个浑身散发着石炭酸味的青年医生，在走廊里接见聂赫留朵夫，严厉地问他有什么事。这位医生对囚犯非常同情，因此经常同监狱当局，甚至同主任医生发生冲突。他唯恐聂赫留朵夫提出什么违章要求，就表示他对任何人一视同仁，还装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这里没有女病人，这里是儿科病房。”青年医生说。

“我知道，不过这里有个是从监狱里调来担任助理护士的

女人。”

“对，这样的女人这儿有两个。您究竟有什么事？”

“其中有个叫玛丝洛娃的，我同她是熟人。”聂赫留朵夫说，“我想见见她，我为她的案子要到彼得堡去上诉。我想把这东西交给她。里面只有一张照片。”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

“行，这个可以。”医生态度缓和下来说，接着吩咐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婆把助理护士玛丝洛娃叫来。“您坐在这儿吗？到候诊室去也行。”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趁医生态度好转，就向他打听玛丝洛娃在医院里工作得好不好。

“还不错，要是考虑到她过去的生活经历，应该是很好的了。”医生说。“喏，她来了。”

老太婆从一扇门里走出来，后面跟着玛丝洛娃。玛丝洛娃穿着一件条纹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一块三角巾，盖住了头发。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刷地红起来，迟疑不决地站住，然后皱起眉头，垂下眼睛，踏着走廊里的长地毯快步向他走来。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本想同他握手，但后来还是向他伸出了手，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自从上次他们谈话时她发了脾气又道了歉以后，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见到过她。他料想她今天的心情同上次一样。但今天她完全不同，一种新的表情在脸上出现了：拘谨，羞怯，而且聂赫留朵夫觉得她对他很反感。他对她说的话同刚才对医生说的话一样，他告诉她他将去彼得堡，并且把装着他从巴诺伏带来的照片的信封交给她。

“这是我在巴诺伏找到的很旧的一张照片，说不定您会喜欢的。拿去吧！”

她扬起黑眉毛，用她那双斜睨的眼睛惊奇地瞅了瞅他，仿佛在问这给她做什么。然后默默地接过信封，把它插在围裙里。

“您的姨妈我在那里看到了。”聂赫留朵夫说。

“看到了。”她冷冷地说。

“您在这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挺好。”她说。

“辛苦吗？”

“不，不算什么。可我还没有过习惯。”

“我很替您高兴。与那边相比要好一些。”

“‘那边’指什么地方？”她问，顿时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监狱呀？”聂赫留朵夫赶快回答。

“好什么呀？”她问。

“我想这里的人比那边的人好些。”

“那边好人多得很。”她说。

“明肖夫母子的事我奔走过了，但愿他们能得到释放。”聂赫留朵夫说。

“但愿上帝保佑，那老太婆人真好。”她说，再次表示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接着微微一笑。

“我今天就去彼得堡。您的案子很快就会受理。我希望能撤销原判。”

“撤销也好，不撤销也好，如今对我都一样。”她说。

“为什么说都一样？”

“不为什么。”她说，并用询问的眼光瞅了一下他的脸。

聂赫留朵夫把她这句话和这个眼光理解为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坚持他的决定，还是接受了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主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您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真的都一样。不管情况怎样，我都将照我说过的话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那双斜睨的黑眼睛既象瞅着他的脸，又象瞅着别的地方。她整个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采。不过她嘴里所说的同她眼睛所说的截然不同。

“您何必说这种话呢！”她说。

“我说这话是要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这事您已经说得够多了，用不着再说了。”她好容易忍住笑说。

病房里不知怎的喧闹起来。传来孩子的哭声。

“他们好象在叫我。”她不安地回头望望说。

“好吧，那么再见了。”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出来的手，没有跟他握手就转过身，想把她得意的神气竭力掩饰起来，沿着走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身上起了什么变化？她在想些什么？她有什么感受？是她要考验我，或是真的不能原谅我？她是无法把她的思想和感受说出来，还是不愿说？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仍怀恨在心？”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怎么也回答不出来。他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她变了，她的心灵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使他同她联结起来，而且使他同促成这变化的上帝联



结起来。这样的联结使他欢欣鼓舞，温暖充满心间。

玛丝洛娃回到放有八张童床的病房里，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她铺床单的时候腰弯得太低，脚底一滑，差点儿跌倒。脖子上扎着绷带的一个男孩，正在休息，看见她差点儿跌跤，笑起来。玛丝洛娃也忍不住，在床边一坐，发出响亮而富有感染性的笑声，几个孩子被逗得哈哈大笑。护士生气地对她嚷道：

“笑什么？你以为你还在原来那种地方吗！快把饭拿来。”

玛丝洛娃不作声了，拿起食具到护士吩咐她的地方去，但当她同那个扎着绷带、被护士禁止笑的男孩相互看了一眼之后，又扑哧一声笑出来。这天白天，当房间里没有人时，玛丝洛娃几次从信封里取出照片，快速欣赏一下。晚上下班以后，她回到同另一个助理护士合住的房间里，又从信封里把照片取出来，含情脉脉地一动不动仔细察看着照片上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服装、阳台的台阶、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前面他的脸、她的脸和两位姑妈的脸，看了很长时间。她看着这张发黄的褪色照片，怎么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对她那张额上鬈发飘飞的年轻美丽的脸看得出了神。她看得这样专心致志，连那个跟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屋子，她都没有发觉。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吗？”身体肥胖、心地善良的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了看照片，问道。“这难道是你吗？”

“不是我又是谁？”玛丝洛娃笑吟吟地瞧着同伴的脸说。

“那么这是谁？就是他？这是他母亲吗？”

“是姑妈。你难道看不出来？”玛丝洛娃问。

“怎么看得出来？一辈子也认不出来。整个模样都变了。我看离现在都有十年了吧！”

“不是几年，是隔了一辈子。”玛丝洛娃说完。她的活泼样儿突然消失了。脸色变得阴郁，眉毛之间一条皱纹凹进去。

“怎么样，那边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吧。”

“哼，轻松。”玛丝洛娃闭上眼睛，摇摇头说。“服苦役都比那儿强。”

“那怎么会？”

“就是这样。从晚上八点钟忙到早晨四点钟。天天这样。”

“那为什么不抛下这种生活呢？”

“抛是想抛的，可是办不到。说这些做什么！”玛丝洛娃说着，霍地站起来，拿起照片往抽屉里一扔，愤怒的眼泪好不容易忍住，砰地一声带上门，跑到走廊里。刚才她瞧着照片，觉得自己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迷迷糊糊地想起着她当年是多么幸福，现在要是同他在一起又将是多么幸福。同伴的话使她想起她目前的处境，那边的生活也使她想起来了。——那种痛苦的生活，她当时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却不让自己去深入思量。现在她才清楚地想起那些痛苦的夜晚，特别是谢肉节的夜晚，等待那个答应替她赎身的大学生的她。她想起那天她穿着一件酒迹斑斑的袒胸红绸连衣裙，蓬乱的头发上系着一个大红蝴蝶结，精疲力尽，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深夜两时才把客人们送走。趁跳舞间歇，她在那个瘦得皮包骨头、满脸粉刺的给小提琴伴奏的弹钢琴女人旁边坐下，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向她诉说。弹钢琴女人也诉说她处境的不幸，很想改变环境。这当儿，克拉拉也走到她们跟前。她们三人立

刻决定抛弃这种生活。她们以为这个夜晚已经过去，刚要走散，忽然听见有几个喝醉酒的客人在前厅喧闹。小提琴手又拉起前奏曲，女钢琴师也使劲又敲着琴键，弹奏卡德里尔舞曲第一节，用的是一首欢乐的俄罗斯歌曲。一个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矮小男人，满头大汗，酒气薰天，打着饱嗝，走过来一把搂住她的腰。到弹第二节时，他连燕尾服也脱掉。另外一个留大胡子的胖子，也穿着燕尾服（他们刚从一个舞会上出来），搂住了克拉拉的腰。他们旋转，跳舞，叫嚷，喝酒，闹了好一阵……就这样，年复一年，一年又一年过着同样的日子。一个人怎么能不变！归根结蒂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对他的旧恨顿时又涌上心头。她真想把他痛骂一顿。她后悔今天错过机会没有对他说：她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她决不受他欺骗，不让他精神上利用她，就象从前在肉体上利用她那样，也不让他借她来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她又是责备他，又是怜惜自己。她很想喝点酒来浇灭心头的怒火。要是她此刻在监狱里，她就会不遵守诺言，喝起酒来。在这里要喝酒，除了找医士，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她害怕医士，因为他老是纠缠她。现在她厌恶同男人来往。她在走廊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小屋子里，没有答理同伴的话，而为自己饱经沧桑的身世哭了好半天。

## 十四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有三件事要办：向枢密院提出上诉，要求重新审查玛丝洛娃案；把费多霞的案子提交上告委员会；受薇拉之托到宪兵司令部或者第三厅去要求释放舒斯托娃，并让一个做母亲的与关在要塞里的儿子见面。为了这事薇拉给他写过信。这两件事他并在一起，算作第三件。再有就是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们因为诵读和讲解福音书而被迫离开家人，流放高加索。其说是答应他们，不如说是自己下定决心，一定要使这个案子真相大白。

自从聂赫留朵夫上次访问玛斯连尼科夫，特别是回乡一次以后，他不是随便断定，而是全身心感觉到，他开始憎恶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圈子，憎恶那个为了确保少数人享福而迫使千万人受苦并且竭力加以掩盖的圈子。那个圈子里的人没有看到，也看不到穷人的苦难，因此也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残酷和罪恶。聂赫留朵夫现在同那个圈子里的人交往，不能不觉得厌恶，不能不责备自己。不过，长期的生活习惯又把他吸引到那个圈子里去，他的亲友也吸引着他。而主要是因为要办理他现在唯一关心的事——帮助玛丝洛娃和他愿意帮助的其他一切受难者，他不得不求助于那个圈子里的人，尽

管那些人不仅无法使他尊敬，而且常常使他感到愤慨和蔑视。

聂赫留朵夫来到彼得堡，在姨妈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住下。他的姨父做过大臣。他一到姨妈家，就落到同他格格不入的贵族社会的核心里。他很反感这样，但又无可奈何。要是不住姨妈家而住旅馆，那就会把姨妈得罪。而他知道姨妈交际广阔，对他要奔走的各种事可能极有帮助。

“啊，关于你，什么事我听到啦？真是太奇怪了。”姨妈等他一到马上请他喝咖啡，这样对他说。“你简直是霍华德！你帮助罪犯，视察监狱，平反冤案。”

“不，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做。”

“那很好。不过，这里面好象还有什么风流韵事吧。嗯，你倒说说！”

聂赫留朵夫把他同玛丝洛娃的往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我记得，记得，可怜的爱伦对我说起过，当年你住在那两个老太婆家里，她们好象要你同她们的养女结婚。”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向瞧不起聂赫留朵夫的两姑妈。“原来就是她吗？她现在还漂亮吗？”

这位姨妈今年六十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兴致勃勃，很健谈。她的身材又高又胖，唇上有黑色汗毛。聂赫留朵夫喜欢她，她生气蓬勃和快活开朗的性格使他从小就受到影响。

“不，姨妈，那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只想帮助她，因为第一她被冤枉判了刑，我有责任。再说她这辈子弄到如此地步，我更是罪责难逃。我觉得我应该尽一切力量替她奔走。”

“可我怎么听人说你要同她结婚呢？”

“是的，这样的想法我有过，可是她不愿意。”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扬起眉毛，垂下眼珠，惊讶地默默瞧了瞧外甥。她的脸色顿时变了，现出高兴的样子。

“嗯，她比你聪明。嘿，你可真是个傻瓜！你真的想同她结婚吗？”

“当然。”

“她干过那种营生，你还愿意同她结婚吗？”

“更加愿意了。因为我是罪魁祸首。”

“哼，你简直是个蠢货。”姨妈忍住笑说。“十足的蠢货，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十足的蠢货。”她反复说，特别喜欢“蠢货”这个名词，因为她认为这个名词确切地表明了外甥的智力和精神状态。“说来也真凑巧。”她说下去。“阿林办了个出色的抹大拉收容所。我去过一次。她们真叫人恶心。我回来从头到脚都好好地洗了一遍。不过阿林办这事是真心真意的。我们就把她，你那个女人，交给她吧。要叫她们这批人改恶从善，再没有比阿林更有办法了。”

“不过她被判服苦役了。我就是来替她奔走，要求把这个判决撤销。这是我来求您的第一件事。”

“原来是这样！那么她的案子归哪里管呢？”

“枢密院。”

“枢密院吗？对了，我那个亲爱的表弟廖伏什卡就在枢密院。不过他是在那儿的傻瓜部里办事，当承宣官。至于真正的枢密官我可一个也不认识。天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不是德国人，什么盖啦，费啦，德啦，无奇不有，就是什么伊凡诺夫啦，谢苗诺夫啦，尼基丁啦，再不然就是什么伊凡宁科啦，西蒙宁科啦，尼基丁科啦，五花八门，都是另一个世界

的人。好吧，反正我对丈夫说一下就是了。他认识他们。他什么人都认识。我会对他说的。但你对他得交待清楚，我的话他总是听的。不管我说什么，他总是说什么也不明白。他这是存心装不懂。人家个个听得懂，就是他听不懂。”

这时，一个穿长统袜的男仆端来一个银托盘，一封信在上面放着。

“正好是阿林写来的信。这下子你就可以听见基泽维特的讲话了。”

“基泽维特是什么人？”

“基泽维特吗？你今天晚上来吧。你就会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了。他讲得那么动人，就连死不改悔的罪犯听了也会跪下来，痛哭流涕，诚心忏悔。”

不论这事有多怪，也不论这事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脾气多么格格不入，她却狂热地信奉基督教的精神关于赎罪那种学说。她常到宣传这种学说的聚会场所，有时还把信徒召集到家里。这种风行一时的学说不仅否定一切宗教仪式和圣像，而且否定圣礼，但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却在每个房间里挂着圣像，甚至圣像连床头上都有，她还参与一切教会仪式，并不认为这同赎罪说有什么矛盾。

“对了，应该让你的抹大拉听听他的讲道，她会皈依的。”伯爵夫人说。“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听听他的讲道。那是位出色的人物。”

“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姨妈。”

“我告诉你，这很有趣。你一定要来。那么，你倒说说，你还有什么事要我办？全说出来吧！”

“还有，在要塞那边也有一件事。”

“在要塞那边？好，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信，你到那边去找克里斯穆特男爵。他这人人品极好。你自己会知道的。他是你父亲的同事。他就是对死亡着了迷。不过，这也没关系。他这人心地不错。你在那边有什么事？”

“我要求他们准许一个做母亲的同关在那边的儿子见一次面。不过我听说这种事不归克里斯穆特管，它归切尔维扬斯基管。”

“我可不喜欢切尔维扬斯基这人，但他是玛丽爱特的丈夫。可以托托她，她肯为我出力的。她挺可爱。”

“我再要为另一个女人求情。她坐了几个月牢，可是为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不会的，她自己一定知道为了什么。她们清楚得很。她们都是罪有应得，这批剃光头的家伙。”

“是不是罪有应得我们不知道。可是她们在受罪。您是位基督徒，相信福音书，可是心肠这么硬……”

“这可不相干。福音书是福音书，讨厌就是讨厌。譬如说，我恨虚无党，特别是那些剪短头发的女虚无党，我假装喜欢他是不好的。”

“您到底为什么恨她们呢？”

“在出了三月一日事件以后，你还要问原因吗？”

“那些女人又不是个个都参加了三月一日事件。”

“还不是一样，闲事她们为什么要管？那又不是女人家的事。”

“那么，为什么您认为玛丽爱特就可以过问那种事呢？”聂



赫留朵夫说。

“玛丽爱特吗？玛丽爱特是玛丽爱特。可是天知道她的路数是什么。一个轻薄的女人倒想教训起大家来了。”

“不是教训人，只是想帮助老百姓。”

“没有她们，人家也知道谁该帮助，谁不该帮助。”

“不过，您要知道，老百姓穷得很。喏，我刚从乡下回来。农民干活干得累死累活，还吃不饱肚子，我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这难道合理吗？”聂赫留朵夫不由得受他姨妈善心的影响，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那你是不是要我也去做工而不吃饭呢？”

“不，我不是要您不吃饭。”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由得笑了，“我只是要人人工作，个个有饭吃。”

姨妈又拧紧眉头，垂下眼帘，又好奇地瞧着他。

“我的好外甥，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她说。

“那是为什么呀？”

这时候，一个身材很高、肩膀宽阔的将军走进房间里来。这就是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丈夫，一位退休的大臣。

“啊，德米特里，你好。”他说，凑过刮得光光的脸颊让聂赫留朵夫亲吻。“你几时来的？”

接着，他默默地吻了吻妻子的前额。

“哦，他这个人真是少见。”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对丈夫说。“他叫我到河边去洗衣服，光吃土豆过日子。十足的傻瓜是他，不过他求你的事，你还是帮他办一下吧。他是个十足的蠢货。”她又说。“你有没有听到，据说卡敏斯卡雅伤心得不得了，大家怕她的命会保不住。”她对丈夫说，“最好你去看她一下。”

“是吗，这太可怕了。”做丈夫的说。

“好，你去同他谈谈，我要写信了。”

聂赫留朵夫刚走到客厅旁边那个房间里，她就对他叫道：

“那么要给玛丽爱特写封信吗？”

“劳驾您了，姨妈。”

“那么我就在信纸上留一块空白，你自己把那个短头发女人的事写上去，玛丽爱特会叫她丈夫去办的。他一定会办的。你别以为我这人心眼儿坏。她们，就是那批受你保护的人，都很可恶，但我不希望她们倒霉。上帝保佑她们！你去吧。不过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可以听听基泽维特的讲道。我们一块儿做祷告。只要你不反对，对你这是很有益外的。我知道，爱伦也好，你也好，在这方面都很落后。那么再见了。”

## 十五

察尔斯基伯爵是位退休大臣，对某些事情自己有不可改变的看法。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坚定相信，鸟儿天生要吃昆虫，要披羽毛和绒毛，要在空中飞翔，同样，他生下来就该吃名厨烹调的山珍海味，该穿轻暖舒适的华贵衣服，该坐最快最稳的马车，因此都得为他准备好这一切。此外，察尔斯基伯爵还

认为，他从国库支取的现款越多，他获得的勋章——包括钻石勋章——越多，他同皇亲国戚的交往越频繁，他就越满意。同这种基本宗旨相比，察尔斯基伯爵认为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其他一切，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都无所谓。本着这种信念，察尔斯基伯爵在彼得堡生活了四十年，活动了四十年，并在四十年届满时当上了大臣。

察尔斯基伯爵谋得这种高位的主要条件是，第一，他有本事看懂公文和法规，有本事起草虽不漂亮但可以看懂的公文，而且没有什么错别字；第二，他生得仪表堂堂，在必要时可以装得十分自负，甚至使人感到高不可攀，威风凛凛，在另一种场合，却又可以卑躬屈膝，达到肉麻和下贱的地步；第三，不论在个人道德还是公务处理上他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只要有需要，他可以同意一切，也可以反对一切。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竭力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使人不觉得他自相矛盾。至于他的行为是不是合乎道德规范，对俄罗斯帝国或全世界会造成极大益处还是极大害处，他都无所谓。

他当上大臣以后，不仅所有依赖他的人（依赖他和他的亲信极多），甚至一切局外人和他自己都深信，他是一个英明的治国之材。但过了一些时候，他却毫无政绩。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法则，就有一些同他一样能起草公文和看懂公文、仪表堂堂而毫无原则的官僚把他排挤出去，他只好退休。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他这人不仅并不英明卓越，深谋远虑，而且鼠目寸光，不学无术，甚而刚愎自用。其实照他的程度只能勉强读懂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的社论。的确，他同那些不学无术、刚愎自用、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毫无区别。这一层

他自己也十分明白，但这丝毫也不会动摇他的信念，他应该年年领取大笔公款，年年获得新的勋章来装饰他讲究的衣服。这种信念十分顽强，因此谁也不敢停止给他这些酬劳。他照旧每年领取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参与国事的报酬，因为他在最高政府机关里挂了个名，又担任各种各样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还年年获得他所珍重的肩上或长裤上的丝绦，礼服上的新绶带和珥琅星章。这样，察尔斯基伯爵的交际就越发广阔了。

察尔斯基伯爵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就象以前听办公室主任报告什么事一样。他听完以后说，他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部枢密官沃尔夫的。

“人家对他有种种说法，但不论怎么说，他是个正派人。”他说。“他还欠了我的情，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办的。”

察尔斯基伯爵给他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他对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费多霞一案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想就此事写个呈文给皇帝，察尔斯基伯爵说这事确实很动人，有机会要向那边透露的。但他不能说定。上诉还是照章办理的好。他想，要是有机会，要是礼拜四举行碰头会，这件事他可能谈一谈。

聂赫留朵夫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爱特的信，立刻就到那几个地方去。

他先去找玛丽爱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一些关于他不好的名声，主要是他对千百个政治犯冷酷无情，且特别擅长折磨人。聂赫留朵夫照例心头

感到十分沉重。他想到自己为了帮助被压迫者不得不站在压迫者一边，因为他得去向他们求情，要他们对某几个人手下留情，把他们习以为常、因而不以为意的残酷手段稍稍减轻一下。而他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遇到这种情况，他总觉得内心很矛盾，自怨自艾，对求情与否拿不定主意，但最后还是决定去。这样做，他在玛丽爱特和她丈夫面前确实感到别扭、羞愧、不愉快，但关在单身牢房里那个受罪的不幸女人却能因此获得释放，她和她的亲人就不会再备受折磨。此外，他觉得向那批人求情往往言不由衷，因为他已不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而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处身在这个圈子里，觉得又落入惯常的旧轨道，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笼罩这个圈子的轻浮罪恶的气氛。他在察尔斯基姨妈家里就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早晨他同她谈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时，就用了戏谑的口吻。

总的说来，久别的彼得堡仍旧对他起了刺激肉体 and 麻痹精神的作用：一切都是那么清洁、舒适、方便，主要是人们在道德上无所追求，过日子就特别轻松。

干净漂亮、彬彬有礼的马车夫，载着他在干净漂亮、彬彬有礼的警察身旁经过，沿着洒过水的干净漂亮的街道，经过干净漂亮的房子，来到河滨玛丽爱特的房子前。

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戴眼罩的英国马。一个模仿英国人气派的马车夫，留着络腮胡子，穿着号衣，手拿马鞭，神气活现地坐在驭座上。

门房穿着一身非常干净的制服，打开通往门廊的大门。门廊里站着一个跟班，号衣更加干净，上面镶着丝绦，络腮胡

子梳理得更加整齐好看。还有一个值班的勤务兵，穿一身干净的崭新军服，身上带着刺刀。

“将军现在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她现在要出门。”

聂赫留朵夫拿出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信，取出他的名片，然后走到放着来宾留言簿的小桌旁，拿起笔来写道：“来访未晤，甚以为憾。”他刚写到这里，跟班走到楼梯口，门房走到大门外，喝道：“来车！”勤务兵就挺身立正，两手贴住裤缝，用目光迎接从楼上下来的身材瘦小而步伐快得同她的身份不相称的太太。

玛丽爱特头戴一顶插有羽毛的大帽子，身穿黑色连衣裙，外披黑斗篷，手戴崭新的黑手套，面纱遮在了脸上。

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把面纱撩起，露出她那非常可爱的脸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充满疑问地对他瞅了一眼。

“啊，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公爵！”她用愉快动听的声音叫道。“我该认得……”

“怎么，您连我的头衔都还记得吗？”

“可不是，我跟我妹妹当年还爱上了您呢。”她用法语说，“唉，您的模样变化可真大。可惜我现在要出去。要不，我们到楼上去吧。”她说，犹豫地站住了。

她瞧了瞧墙上的挂钟。

“不，不行。我要到卡敏斯卡雅家去参加丧事礼拜。她非常伤心。”

“卡敏斯卡雅是谁呀？”

“难道您没听说吗？……她的儿子在决斗中被人打死了。他跟波森决斗。他是独生子。真是可怕。他母亲伤心死了。”

“是的，我听说了。”

“不，我还是去一下好，您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来吧。”她说，迈开轻快的步子向大门口走去。

“今天晚上我不能来。”他跟她一起走到大门口，回答说。“要知道，我有事找您。”他说着，眼睛却瞧着那对向门口走来的棕黄马。

“什么事啊？”

“喏，这是我姨妈的信，信上讲的就是那件事。”聂赫留朵夫说，递给她上面印有很大花体姓氏字母的长信封。“您看了信就明白了。”

“我知道，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以为我在公事上可以左右丈夫。她错了。我无能为力，我也不愿过问他的事。不过，当然罗，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可以破一次例。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她说，用那只戴黑手套的小手摸索她的口袋，却没有找着。

“有个姑娘被关在要塞里，可是她有病，吃了冤枉官司了。”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李迪雅·舒斯托娃。信上写了。”

“好吧，我去试试。”她说，接着轻盈地跳上挡泥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皮座弹簧马车，打开阳伞。跟班在驭座上坐下来，示意车夫赶车。马车刚一移动，她就用阳伞碰碰车夫的脊背，那两匹漂亮的细皮英国种母马就被缰绳拉住，仰起好看的头，站住，但不住地活动着它们的细腿。

“您务必要来，且不光是为了办您那些事。”她说着嫣然

一笑，而且很懂得这一笑的力量。接着，仿佛戏演完放下幕布，她把面纱放下。“好，我们走吧。”她又用阳伞碰碰车夫。

聂赫留朵夫举起帽子。那两匹纯种棕黄色母马喷着鼻子，蹄子得得地敲击着马路，飞奔而去，马车的新橡胶轮胎在道路坎坷的地方不时偶尔轻轻跳动一下。

## 十六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竟同玛丽爱特相对微笑，不禁把头摇了摇，对自己感到很满意。

“还没来得及反省一番，就又跌进那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疑虑。每逢他不得已去讨好他并不尊敬的人时，这样的感觉总有。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先到哪里，然后再到哪里，免得白走路，就动身去枢密院。他被领到办公室，在那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他看见许多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文官。

那些文官告诉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的上诉书已收到，并交给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姨父的信正好就是写给他的。

“枢密院本星期要开庭审案，玛丝洛娃一案在这次未必能审理。但要是托一下人，本星期三开庭时也可能审理。”一个



文官说。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办公室等他们查明案情，又听见他们在谈论那场决斗。他们详细谈到小卡敏斯基被人打死的经过。他这才知道这个轰动整个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饭店里吃牡蛎，照例喝了许多酒。有个军官对卡敏斯基所属的那个军团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卡敏斯基当面斥责他造谣污蔑。那个军官就动手打了卡敏斯基。第二天两人进行决斗，卡敏斯基腹部中了弹，两小时后就死了。凶手和两个副手都被捕，但据说关了两星期禁闭又都获得释放了。

聂赫留朵夫从枢密院办公室出来，乘车到上诉委员会去拜访权力很大的沃罗比约夫男爵。这位男爵住在一所豪华的官邸里。门房和听差都毫不客气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除了会客日之外见不到男爵，今天他在皇上那里，明天还要去禀报。聂赫留朵夫把信留下，又坐上车，到枢密官沃尔夫家去。

沃尔夫刚吃过早饭，照例吸着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帮助消化。他接见了聂赫留朵夫。沃尔夫的确为人十分正派。他把这种品德看得高于一切，并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一切人。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品德，因为全凭它，他才如愿以偿，获得高官厚禄，也就是说通过结婚而获得一笔财产，使他每年有一万八千卢布收入，又靠自己的勤奋而当上了枢密官。他认为自己不仅为人十分正派，而且象骑士一般廉洁奉公。他所谓廉洁奉公，就是不在暗中接受贿赂。至于他向公家报销各种出差费、车旅费、房租，并且象奴隶般忠实执行政府指令，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当年他在波兰王国某省任省长，残

酷迫害当地几百名无辜百姓，使他们因眷恋同胞和世代相传的宗教而破产、流放和坐牢。他这样做，非但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出于高尚、胆略和爱国而建立的功勋。他霸占热爱他的妻子的财产和他姨妹的财产，同样不以为耻。相反，他还认为这是为一家人生活而作的合理安排。

沃尔夫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财产也被他侵占的姨妹——他卖掉她的田产，在自己名下把钱存上了——和那温柔胆怯、外貌不扬的女儿。这个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为了排遣郁闷，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常常参加阿林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的聚会。

沃尔夫的儿子天性善良，十五岁就长了胡子，从此开始喝酒，放荡，到二十岁那年从家里被撵了出去，因为他一个学校也没有念完，而且交了坏朋友，欠下不少债务，败坏父亲的名声。做父亲的有一次替儿子偿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另一次偿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声明这是最后一次，他要是不洗心革面，就要被撵出家门，并要同他断绝父子关系。儿子不仅没有改悔，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对父亲肆无忌惮地说，他在家本来就觉得憋气。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请便，但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从那时起，沃尔夫就装做自己没有儿子，家里谁也不敢向他提到儿子的事，而沃尔夫却自以为妥善安排了家庭生活。

在书房里沃尔夫站住，同聂赫留朵夫打了招呼，情不自禁地露出亲切而又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这种笑容表示他自认为比大多数人高尚正直。然后他读了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

“您请坐！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坐，我要走走。”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说，同时在这个格调庄重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轻快地来回踱步。“同您认识，我很高兴，当然我也愿意为察尔斯基伯爵效劳。”他说着，吐出一口芳香的淡蓝色烟雾，小心翼翼地从小嘴里取下雪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早一点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非去西伯利亚不可，那还是早一点去好。”聂赫留朵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从下城搭第一批轮船动身，我知道。”沃尔夫露出宽容的微笑说，不论什么事只要人家一开口，他总是立刻就懂得人家的意思。“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走到写字台旁，看了看公文夹上的一张纸。

“哦，哦，玛丝洛娃。好的，我去跟同事们商量一下。我们礼拜三就办这个案子。”

“我能打电报先通知律师吗？”

“您还请了律师？那又何必？不过，也随您的便。”

“上诉理由也许不够充足。”聂赫留朵夫说，“不过我想从案卷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由于误会。”

“是的，是的，这也可能，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眼睛瞧着烟灰，严厉地说。“枢密院只审查引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特殊的。”

“我知道，我知道。每个案子都是特殊的。我们必须照章办事。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上，但已有裂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难得到彼得堡来，是吗？”沃尔夫说，把

雪茄竖起来，免得烟灰落下来。但烟灰还是摇摇欲坠，沃尔夫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到烟灰碟旁，烟灰果然落下了。“卡敏斯基的事真是太惨了！”他说。“一个很好的青年。又是独生子。做母亲的可不好受哇。”他说，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着彼得堡流行着的有关卡敏斯基的故事。

沃尔夫还谈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谈到她对新教义信得入迷。而他对这种新教义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不过从他高尚正直的观点来看，这种东西显然是多余的。然后他拉了拉铃。

聂赫留朵夫便起身告辞。

“您要是方便，就来我家吃饭。”沃尔夫一面说，一面伸出手去，“礼拜三来最好。到那时我可以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天色晚了，聂赫留朵夫乘车回家，也就是回到姨妈家里。

## 十七

察尔斯基伯爵家七点半钟开饭。吃饭用的是一种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的新办法。菜都先摆上桌，摆好后仆人退出餐厅，吃饭的人就自己动手取菜。男人们拿出男子汉气概，为不让太太们过分劳累，毅然承担起给太太们和自己分菜斟酒

的重任。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按一按桌上的电铃，仆人们就悄无声息地走进来，迅速地把用过的菜碟收走，再端来下一道菜。菜肴很讲究，酒也很高级。在灯火通明的大厨房里，法籍厨师正带着两个穿白衣服的助手做菜。吃饭的有六个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一个脸色忧郁、双臂搁在桌上的近卫军军官，聂赫留朵夫，法籍女朗诵员和从乡下来的伯爵家的总管。

餐桌上也谈到那场决斗。大家也说起皇上对这事的态度。大家知道，皇上很怜悯死者的母亲，大家也都为她难过。不过大家又知道，皇上虽然很同情母亲，但又不愿严办身为军人的凶手，因此大家对身为军人的凶手也就宽大为怀。只有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敢想敢说，无所顾忌，对凶手作了谴责。

“他们这样喝酒胡闹，会把一个个好端端的青年都打死的，我说什么也不能原谅他们。”她说。

“你这话我可明白了。”伯爵说。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总是不明白的。”伯爵夫人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人人都明白，就是我的丈夫不明白。我说我很为做母亲的难过，我不愿看到一个人杀了人还洋洋得意。”

到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儿子开始为凶手辩护，反对母亲的意见，粗声粗气地向她证明，身为军官非这样做不可，要不然同事们将批评他，把他驱逐出团。聂赫留朵夫听着，没有插嘴。他当过军官，对小察尔斯基的理由虽不加认可，但是能够理解。他还情不自禁地拿杀人的军官，同监狱里那个因殴斗误伤人命而被判苦役的漂亮的青年农民进行比较。两人都是因喝醉酒而打死人。那个农民在火头上打死人，就此

抛下妻儿，离开亲友，戴上脚镣，剃了阴阳头，去服苦役；而那个军官却坐在漂亮的禁闭室里，吃着上等伙食，喝着上等美酒，看看书，而且迟早一定会获得释放，又可以象原来那样生活，甚至更受人注意。

他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开头同意外甥的话，后来却不言语了。其他的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才发觉他讲这些话是失礼的。

晚上，吃过饭以后，大厅里象开会似的摆着几排雕花高背椅，桌子后面放着一把圈椅，旁边有一个茶几，玻璃水瓶在上面放着，那是给讲道的人饮用的。外国人基泽维特将在这里讲道，听的人纷纷来到。

大门口停着许多华贵的马车。在摆设考究的大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绸缎、丝绒和花边衣服的贵妇人，假发在头上戴着，腰身勒得很细。在贵妇人中间坐着一些男人，有军人，有文官，还有五个老百姓：两个扫院子的、一个小店老板、一个听差、一个马车夫。

基泽维特体格强壮，头发花白，讲一口英语。一个戴夹鼻眼镜的瘦姑娘又快又好地替他翻译。

他说我们的罪孽这样深重，将要受到的惩罚又这样严厉而且无法逃脱，因此不能坐等惩罚临头。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触怒仁慈的上帝，致使基督受难，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可能得到宽恕，我们没有出路，我们不可能得救，我们大家注定要灭亡。灭亡是可怕的，永恒的磨难在等着我们。”他用哆嗦的带哭的声音说，

“怎样才能得救哇？兄弟们，怎样从这场可怕的烈火中得救哇？烈火已经包围了房子，没有出路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泪真的沿着脸颊滚滚而下。八年来，每当他讲到这个他十分得意的地方时，总会感到喉咙哽塞，鼻子发酸，眼泪夺眶而出。眼泪一出来，他自己就更加激动。房间里响起了一片哭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坐在一张精工镶嵌的小桌旁，两手抱住脑袋，肥胖的肩膀不住抖动着。马车夫惊奇地瞧着这个德国人，仿佛他正赶着一辆车，车杠眼看就要撞到德国人身上，而德国人却不肯让开。多数人坐的姿势跟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样。沃尔夫的女儿，相貌很象父亲，穿着一件时髦的连衣裙，双手捂住脸，跪在地上。

口若悬河的讲道人忽然容光焕发，露出那种象演员表示高兴的可以乱真的微笑，声音温柔甜蜜地说：

“现在有救了！这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拯救。这种拯救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流了血，他情愿为我们受苦受难。他用苦难，他用鲜血拯救了我们。兄弟姐妹们！”他又流着眼泪说，“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吧，上帝为了替人类赎罪而献出了他的独生子。他的宝贝……”

聂赫留朵夫感到十分恶心，就悄悄站起来，皱着眉头，忍住羞愧的呻吟，踮起脚尖走出大厅，回自己的房间去。

## 十八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刚穿好衣服，正准备下楼，听差就给他送来莫斯科律师的名片。律师是为自己的事来的，他说，如果玛丝洛娃一案枢密院即将审理，他愿意出庭。聂赫留朵夫发出的电报，正好同他掠身而过。聂赫留朵夫告诉他玛丝洛娃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由哪几个枢密官审理，他听了微微一笑。

“这三个枢密官正好是三种类型。”他说。“沃尔夫是典型的彼得堡官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贝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法学家，因此他在三人中间最有生气。”律师说。“希望也在他身上。那么上诉委员会那边的事进行得怎样了？”

“喏，今天我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里去，昨天是没有机会遇到他的。”

“您知道沃罗比约夫是怎么当上男爵的吗？”律师说，在说这个纯粹俄国姓和外国爵位时露出滑稽的口吻。“这是保罗皇帝赐给他祖父的，他祖父大概是个听差。他不知什么事博得了皇上的欢心。皇上说：‘封他为男爵吧，这是我的旨意，谁也不准拦着。’这样就冒出一个沃罗比约夫男爵来。他为此



很得意。其实是个老滑头。”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嗯，那太好了，咱们一块儿走吧。用车子我送您去。”

临走以前，聂赫留朵夫在前厅里接到听差交给他的玛丽爱特的法文信。

“我不惜违反我的原则，遵嘱在丈夫面前替您所庇护的人求情。不久此人即可获释。丈夫已对该司令官发了手谕。那么，您就堂而皇之来看我吧。我等您。玛。”

“这叫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对律师说。“真是太可怕了！一个女人在单身牢房里被关了七个月，原来什么罪也没有。如今把她释放，也只需要一句话。”

“这种事向来如此。嗯，至少您的愿望实现了。”

“是的，但事情这样容易解决，反而使我觉得不是滋味。请问：那里究竟在干些什么？究竟为什么把她关起来？”

“算了，这种事还是不要追本溯源的好。我送您去吧。”律师说，这时他们已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律师所雇的那辆漂亮轿车来到门前。“您现在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儿去，是吗？”

律师告诉车夫到什么地方。几匹骏马就把聂赫留朵夫送到男爵家门口。男爵在家。进门第一间里有一个穿文官制服的青年官员，他的脖子特别细长，喉结突出，步伐特别轻快。另外还有两位太太。

“贵姓？”喉结突出的青年官员异常洒脱地从两位太太那里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

聂赫留朵夫把姓名报了过去。

“男爵谈到过您。请稍等一下！”

青年官员走进一个房门关着的房间，从那里领出一个身穿丧服、满脸泪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瘦削的手指放下随便卷起的面纱将泪痕掩饰。

“请进！”青年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步态轻盈地走到书房门口，推开门，自己则在门口站住。

聂赫留朵夫走进书房，看见大写字台后面的圈椅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结实男子，头发剪得很短，身穿礼服，快活地用眼睛瞧着前方。他一见聂赫留朵夫，那张双颊鲜红、胡子雪白的和蔼的脸立即浮出亲切的微笑。

“见到您很高兴，我跟令堂早就认识，我们是老朋友。您小时候我就见过，后来您当上军官，我又见到过。好吧，请坐，您说说，我能为您做什么事。是的，是的。”他听着聂赫留朵夫讲费多霞的事，摇摇他那白发剪得很短的头说。“您说吧，说吧，我全明白。是的，是的，这事确实很叫人感动。那么，您已经提出上诉了？”

“上诉书我已准备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口袋里拿出诉状。“但我要请您对这个案子多多关照。”

“您做得很好。我一定亲自向上奏明这个案子。”男爵说着，那张快乐的脸上竭力想装出怜悯的样子，但装不象。“这个案子很动人。看样子她还是孩子，丈夫先是待她很粗暴，使她嫌恶他，但过了一阵，他们又和好了……是的，我要把这个案子向上奏明。”

“察尔斯基伯爵说，他打算去向皇后求情。”

聂赫留朵夫话音未落，男爵的脸色顿时变了。

“不过，您把上诉书送到办公室去吧，我将尽力而为。”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这时候，青年官员又走了进来，显然有意卖弄着他那种潇洒的步态。

“那位太太要求再说几句话。”

“好，请她来吧！唉，老弟，你在这儿会看到很多眼泪，要是能把大家的眼泪都擦干就好了！但也只能尽力而为。”

那位太太走了进来。

“我忘记求您，女儿可不能让他抛弃，因为他已经横了心……”

“我不是说过我会尽力而为吗？”

“男爵，看在上帝份上，您救救我这个做母亲的吧！”

她抓住他的一只手，虔诚地吻了起来。

“一切都会好的。”

等那位太太走了，聂赫留朵夫也起身告辞。

“我们一定尽力去做。我们要同司法部商量一下。他们会给我们答复的。到那时我们再尽力去办。”

聂赫留朵夫走出房间，穿过办公室。象在枢密院那样，他在这个漂漂亮亮的房间里又看到许多漂漂亮亮的官员，个个整齐清洁，彬彬有礼，服装端庄大方，说话严肃清楚。

“为什么这种人这样多，真是多得要命！他们的身子都保养得这么好，他们的衬衫和手都多么干净，他们的靴子又擦得多么亮。他们靠的是谁？别说同囚犯比，就是同乡下人比，他们也显得多么阔绰优裕呀！”聂赫留朵夫又不由自主去想。

## 十九

操纵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是一个德国男爵出身的老将军。他一生有卓著战功，得过许多勋章，但平时只在钮扣孔里挂一个白十字章。据说现在他头脑已糊涂了。这枚他特别引以为荣的十字章是他在高加索服务时获得的。当时他统率剪短头发、身穿军服的俄罗斯农民，手持步枪和刺刀，屠杀了一千多名保卫自由、家园和亲人的人。后来他在波兰服务时，又驱使俄国农民犯下种种罪行，为此他又获得了勋章和军服上新的饰品。后来他又在别的地方工作过。如今他已是龙钟的老人，但获得了这个重要职位，再加一座好房子、一笔可观的年俸和尊贵的地位。上司的各种命令他认真执行，对派给他的任务特别卖力。他非常重视上司的命令，认为天下万事都可以改变，唯独上司的命令不能改变。他的职责就在于把男女政治犯关在特种监狱和单身牢房里，关得这些人在十年之内一半瘐死，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痼病，一部分自杀；其中有人绝食而死，有人用玻璃割破血管，有人上吊，有人自焚。

这一切老将军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他眼前发生的，但所有这些事都没有触动他的良心，就象雷击和洪水等天灾造成

的苦难不会触动他的良心一样。这一切都是执行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的结果。这些命令都非执行不可，因此考虑这类命令的后果是完全无意的。老将军也不让自己去考虑这些事，认为军人的爱国天职不容许他考虑，免得在执行时心慈手软。

老将军按照规定的职责，每星期到各监狱巡查一次，询问囚犯有什么要求。囚犯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他都不动声色地听着，对他们的要求总是置之不理，认为这些要求都是非法的。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老将军寓所，塔楼上的自鸣钟正用尖细的钟声奏出《荣耀归于上帝》的乐曲，然后敲了两下。聂赫留朵夫听着这钟声，不禁回想起十二月党人的笔记，其中谈到这种每小时响一次的可爱音乐怎样打动终身囚徒的心。聂赫留朵夫来到的时候，老将军正坐在阴暗的会客室里，挨着一张嵌花小桌，跟一个年轻人一起在纸上转动一个小碟。那年轻人是他一个部下的弟弟，是个画家。画家潮润的细弱手指嵌在老将军皮肤发皱、瘦骨嶙峋的僵硬手指中。这两只合在一起的手一起按住一个倒扣的茶碟，茶碟在那张写有全部字母的纸上转动。那个茶碟正在解答将军的问题：人死后灵魂怎样才能相互认识？

勤务兵拿着聂赫留朵夫名片进来的时候，贞德的灵魂正在通过茶碟说话。贞德的灵魂刚用一个个字母拼成的字句说：“他们相互认识是……”这几个字刚记下来。勤务兵一进来，茶碟刚拼完“通过”两字，正在滑来滑去转动。茶碟所以这样游移不定，老将军认为是由于下一个字应该是“清”，也就是贞德要说，人的灵魂只有通过清除一切尘世杂念，相互才

能认识。画家却认为下一个字应该是“灵”，即贞德的灵魂将说，他们相互认识是通过灵魂本身发出的光。老将军阴郁地拧紧两条浓密的白眉毛，盯住茶碟上面的两只手，拼命把茶碟往拼成“清”的字母上推，但却以为那是茶碟自己在移动。脸色苍白的年轻画家则把稀疏的头发撩到耳朵后面，一双暗淡无神的浅蓝眼睛瞧着会客室里阴暗的角落，神经质地动着嘴唇，努力把茶碟往拼成“灵”的字母那里推。老将军因为手头的事被打断而皱起眉头，沉默了一会儿，接过名片，戴上夹鼻眼镜，因为他的粗腰作痛哼了一声，他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揉揉发麻的手指。

“请他到书房里去。”

“大人，您让我一个人来弄完他吧。”画家站起来说。“我觉得灵魂还在这儿。”

“好的，您把它弄完吧。”老将军果断而严厉地说，迈开僵直的腿，刚毅而均匀地大步朝书房走去。“欢迎，欢迎！”将军用粗糙的声音亲切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写字台旁那张圈椅请他坐。“到彼得堡好长时间了吗？”

聂赫留朵夫说来了没多久。

“令堂大人，公爵夫人身体好吗？”

“妈妈已经过世了。”

“对不起，真没想到，太遗憾了。儿子对我说他遇见过您了。”

将军的儿子象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他在军事学院毕业后，就进侦察局工作，并为这个差事洋洋得意。管理暗探是他的工作。

“是啊，我跟令尊同过事。我们是老朋友，又是老同事。怎么样，您在担任什么差事吗？”

“不，我没有担任什么差事。”

将军不以为然地低下头去。

“我有事要麻烦您，将军。”聂赫留朵夫说。

“太—好了。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哇？”

“如果我拜托您的事不得当，那就请您原谅。但这件事我不得不来麻烦您。”

“什么事啊？”

“您这儿关着一个叫古尔凯维奇的人。他的母亲要求探望他，或者至少能把一些书转交给他。”

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的话，既没有表示高兴，也没有表示不高兴，只是侧着头，眯缝着眼睛，仿佛在考虑似的。其实他根本不在思考，对聂赫留朵夫的问题也毫无兴趣，因为他心里明白他将照章回答。他只是在闭目养神，根本没想什么。

“这件事，老实说，我做不了主。”他歇了一会儿说。“探监的问题，最高当局有批准的法令明确规定，凡是法令许可的，可以同意。至于书籍，我们这儿有个图书馆，凡是许可的书，都可以借给他们看。”

“是的，不过他需要学术性的书籍，他要研究学问。”

“您别相信他们那一套。”将军沉吟了一会儿，说。“他们根本不是要研究学问。他们只是无事生非罢了。”

“不过，他们处境是这么艰难的，总得有些活动消磨消磨时间哪。”聂赫留朵夫说。

“他们老是诉苦。”将军说。“我们可知道他们。”他谈到他们就象谈到一群品质恶劣的特殊的人。“其实这里给他们提供的条件很舒服，这在监狱里是少见的。”将军继续说。

他仿佛要证实自己的话，就详详细细列举为囚犯提供的各项舒服条件，仿佛他们的宗旨就是为囚犯安排舒适的居留地。

“以前确实相当艰苦，但现在他们在这儿得到最好的照顾。他们经常吃三道菜，而且总是有肉吃：不是牛排就是肉饼。每逢礼拜天还要添一道菜，就是甜点心。啊，上帝保佑，但愿每个俄国人都能吃到这样的伙食！”

将军也象一切老年人那样，一旦遇到他要强调的事，总会唠唠叨叨讲上好几遍。此刻他只不过想证明，那些囚犯都是贪得无厌，不知感恩的。

“我们给他们提供宗教书籍，还有旧杂志。在我们图书馆里合适的书有的是，可是难得去翻阅。开头他们似乎还感兴趣，后来新书倒有一半书页都没有裁开，旧书更没有人问津。我们还做过试验。”将军似笑非笑地说，“故意在书里夹上一些纸片。结果那些纸片都原封不动夹在里面。再有，这里也不禁止他们写字。”将军继续说。“发给他们石板，发给他们石笔，他们尽可以写写字消遣消遣。而且可以擦掉再写。可他们也不写。不，他们很快就完全安定下来了。只是开头有点烦躁，后来甚至会慢慢发胖，变得十分安静。”将军说，根本没想到他的话其实是多么残酷。

聂赫留朵夫听着他那沙哑苍老的声音，瞧瞧他那僵直的手脚和白眉毛下暗淡无神的眼睛，又瞧瞧他那被军服直领撑



住的皮肉松弛的光颧骨，以及他特别引以为荣的白十字章——那是因为极端残酷和血腥屠杀而获得的，——心里明白，反驳他或者揭穿他这话的实质，都是多余的。但他还是强自镇定，又问到另一个案子，打听囚犯舒斯托娃的情况，还说他今天得到消息，上面已下令要释放她了。

“舒斯托娃吗？舒斯托娃……我记不住所有犯人的名字。因为人数太多。”他说，显然责怪犯罪的人数太多。他打了打铃，吩咐把办事员叫来。

将军趁办事员还没有来，就劝告聂赫留朵夫担任些差事，说什么凡是高尚正直的人（他自以为是其中的一个）都是皇上……“和祖国”所特别需要的。他加上“和祖国”三个字，显然只是为了说起来音调更动听罢了。

“我虽然老了，但还要尽力当好差。”

办事员瘦小而结实，生有一双聪明灵活的眼睛，走来报告说，舒斯托娃关在一个警卫森严的特殊地方，有关她的公文还没有收到。

“只要公文一下来，我们当天就把她释放。我们是不留住他们的，他们的光临我们并不太欢迎。”将军说，又试图挤出调皮的微笑，结果只是使他的老脸显得更丑。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并竭力克制自己，免得流露出对这个可恶的老头又嫌恶又怜悯的复杂心情。老头儿呢，他则认为对老同事的这个轻浮的分明不走正路的儿子不必过分严厉，只要顺便教诲他几句就是了。

“再见，老弟，请勿见怪，我这是爱护您才说这些话的。不要跟关在我们这里的人打交道。他们都是有罪的。他们都

是些道德败坏的人。我可了解他们了。”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对这一点确实毫不怀疑，倒不是因为这是事实，而是因为不这样想，他就无法肯定自己是一位可敬的英雄，无法心安理得地过优裕的生活，而变成一个出卖过良心、到晚年还在出卖良心的泼皮。“您最好还是去担任些差事。”他继续说。“皇上需要正直的人……祖国也需要正直的人。”他补充说。“嗯，要是我们这些人都象您那样不当差，这怎么能行呢？叫谁来干呢？我们动不动就批评现在的制度，可自己又不愿帮政府的忙。”

聂赫留朵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低低地鞠了一躬，握了握宽宏大量地向他伸出来的瘦骨嶙峋的大手，走出房间。

将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揉揉腰，又回到会客室里。画家已把贞德灵魂的答复记录下来，正在那里等候将军。老将军戴上夹鼻眼镜，念道：“他们相互认识是通过灵魂本身发出来的光。”

“啊。”将军闭上眼睛，怀疑地说，“要是大家的光都是一样的，那又怎么认得清楚呢？”他问，又在小桌旁坐下来，手指同画家的手指夹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这时正好驶出大门。

“这地方真气闷哪，老爷。”马车夫对聂赫留朵夫说，“我本来想不等您出来就走掉。”

“是的，很气闷。”聂赫留朵夫同意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望望空中烟灰色的浮云和涅瓦河上被小舟与轮船激起的银光闪闪的波浪。

## 二十

第二天要开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就坐车去枢密院。在枢密院大厦雄伟的大门口，已停了好几辆马车。他看见法纳林律师也乘车赶来。他们沿着富丽堂皇的楼梯登上二楼。律师熟悉这里的一切通路，往左一拐，就走进一扇上面刻着诉讼条例制定年份的木门。他在第一个长方形房间里脱去大衣，露出燕尾服、白胸衬和白领带，从门房那里打听到枢密官都已到齐，就煞有介事地走进下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右边放着一个大橱，旁边有一张桌子，左边是一道旋梯。这时候，一个身穿文官制服、风度翩翩的官员，腋下夹着皮包，从楼梯下来。房间里有一个留着银白长发的小老头，穿着短上衣和灰长裤，样子象个家长。他的旁边毕恭毕敬地站着两个跟班。

这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钻进充作更衣室的大橱，关上橱门。这时候，法纳林看见一个同行——跟他一样穿燕尾服、系白头带的律师，马上兴致勃勃地同他攀谈起来。聂赫留朵夫乘机打量一下房间里的人。大约有十五个人来旁听，其中两个是女的：一个年轻的戴一副夹鼻眼镜，另一个头发花白。今天要审理一个报纸诽谤案，因此旁听的人比较多，主要是新

闻界人士。

一个脸色红润、相貌英俊穿着漂亮的制服的民事执行吏，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法纳林跟前，问他哪一个案子要办。听说是办玛丝洛娃案，就在纸上记下来，走开了。大槓的门这时候开了，家长模样的小老头从里面出来，已经换上一身镶满丝绦的官服，胸前挂满闪闪发亮的勋章和奖牌。他的模样活象一只大鸟。

这身可笑的服装显然使小老头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他慌忙匆匆走到入口处对面的一扇门里。

“这位就是，德高望重的贝。”法纳林对聂赫留朵夫说，又介绍同行与他认识，然后讲起当前即将审理的是他认为很有趣的案子。

不多一会儿，这个案子开审了。聂赫留朵夫同旁听群众一起往左走进法庭。他们，包括法纳林在内，走到栅栏后面的旁听席上。只有那个彼得堡律师来到栅栏前面的斜面写字台旁。

枢密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的法庭要小一点，布置也简单些，唯一的区别是枢密官面前桌上铺的不是绿呢，而是镶有金边的深红色丝绒。不过，凡是行使审判职能机关的标志：守法镜、圣像、皇帝御像等，这里一一齐备。民事执行吏也那样庄严地宣布：“开庭了。”所有的人都那样站起来，身穿制服的枢密官也那样纷纷走进法庭，也那样在高背扶手椅上坐下，也那样用臂肘支在桌上，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枢密官总共四名。首席枢密官尼基丁脸型狭长，不留胡子，生有一双银灰色眼睛。沃尔夫煞有介事地噘起嘴唇，用

他那双白净的小手翻阅着案卷。接着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体格魁梧，麻脸，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第四个是贝，就是那个样子象家长的小老头，他走在最后。跟枢密官一起进来的还有书记长和副检察官。副检察官是个中等身材体形干瘦，脸色很黑，胡子刮得精光，生有一双忧郁的黑眼睛的年轻人。尽管他穿着一身古怪的制服，聂赫留朵夫还立刻认出他是大学时代的要好朋友。双方已有六年未见面。

“副检察官是谢列宁吧？”聂赫留朵夫问律师。

“是的，怎么样？”

“我跟他很熟，人品极好……”

“也是个很好的副检察官，很能干。对了，您本应该托托他。”法纳林说。

“他不论办什么事总是凭良心的。”聂赫留朵夫说，想起他同谢列宁的亲密关系和友谊，想起谢列宁的种种优秀品质，例如纯洁、诚恳和正派。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法纳林聚精会神倾听着案情报告，低声说。

原来高等法院的裁定并没有改变地方法院的判决，现在开庭就是审理对高等法院裁定的上诉。

聂赫留朵夫留神倾听着，竭力想弄明白目前开审的案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也象在地方法庭上一样，使他理解不了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所讲的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些枝节琐事。这个案子涉及报上一篇揭发某股份公司董事长舞弊的文章。问题的关键在于股份公司董事长有没有真的侵占股东利益，他的侵占行为怎样才能制止。可是这一点根本没

有谈到。他们谈论的只是按照法律，报纸发行人有没有在报上刊登小品文的权利而已。发表了小品文，又是犯了什么罪，是诽谤还是诬蔑，是诽谤中含有诬蔑，还是诬蔑中含有诽谤。此外还涉及某个总署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和决议，这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

聂赫留朵夫只理解了一点，那就是报告案情的沃尔夫虽然昨天对他声色俱厉地说，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此刻在报告时却显然有意偏袒被告，以利于撤销高等法院的裁定。谢列宁呢，一反向来的稳重作风，用意料不到的激烈言词发表了相反意见。一向老成持重的谢列宁如此愤激，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吃惊，其中却是有原因的。原来谢列宁无意中得知这个董事长在金钱方面手脚不干净，沃尔夫几乎就在临开庭之前参加了这个商人的豪华宴会。此刻沃尔夫在报告案情，虽然措辞十分慎重，但分明是在偏袒这个商人。谢列宁听了火冒三丈，就用异常愤激的口气痛加驳斥。他的话显然触犯了沃尔夫：他面红耳赤，身子哆嗦，惊讶的神气默默地装出来，带着威风凛凛而又深受冒犯的样子跟其他几个枢密官一起向议事室走去。

“请问，哪一个案子你来办？”等枢密官们一走，民事执行官吏又问法纳林。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是办玛丝洛娃的案子。”法纳林说。

“对，对，这个案子今天要审理。不过……”

“不过怎么样？”律师问。

“不瞒您说，这个案子不公开辩论了，因此枢密官先生在宣布案子的裁定以后，未必会再出来。但我可以去通报

.....”

“怎么去通报？.....”

“我会去通报的。”在纸上民事执行吏又记了些什么。

枢密官们果然打算在宣布诽谤案的裁定后，不再离开议事室，在那里一边喝茶吸烟，一边办完其他案子，包括玛丝洛娃一案在内。

## 二十一

枢密官们在议事室里刚围桌坐下，沃尔夫就滔滔不绝地说出必须撤销本案原判的种种理由。

首席枢密官尼基丁为人一向刻薄，今天心情更是格外恶劣。在审案的时候，听着案情报告，他就有了主意。此刻他坐在那里听沃尔夫发言，心里却在想自己的事。他在回想昨天写在备忘录上的一件事，那就是他垂涎已久的一个肥缺，没有委派给他，却委派给了维梁诺夫。尼基丁深信，凡是在他任职期间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一二等文官，他对他们的评述将成为重要历史文献。他昨天写了一章备忘录，猛烈抨击几个一二等文官，说他们阻挠他拯救俄国，而他却要使俄国避免被当今那些统治者所摧毁。事实上，他们只是阻挠他领取更多的薪俸罢了。此刻他正在思考，怎样使子孙后代对这些

事有个全新的认识。

“是啊，那当然。”他回答沃尔夫说，其实他根本就没听沃尔夫说什么。

贝脸色忧郁地听着沃尔夫的话，同时在面前的一张纸上画着花环。他是一个十足的自由派。忠心耿耿地捍卫六十年代的传统，即使有时放弃严格的公正立场，那也是为了偏袒自由派。因此当前审理这个案子，除了提出控诉的董事长是个卑鄙的人之外，贝之所以主张驳回上诉，还因为控告报馆人员犯诽谤罪，就是对新闻自由压制。等沃尔夫报告完毕，贝就撂下没有画完的花环，将闷闷不乐的神色露出——他之所以闷闷不乐，是因为象这样起码的常识还要他多费口舌，——用温柔悦耳的声音，简单扼要而又令人信服地说明，上诉是缺乏根据的。然后低下白发苍苍的头，继续把花环画完。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坐在沃尔夫对面，不停地用粗手指把上下胡子塞进嘴里咀嚼。等到贝的话音一落，他就不再咀嚼胡子，用尖厉刺耳的声音说，虽然董事长是个坏蛋，如果有法律根据，他还是主张撤销原判，但既然没有法律根据，那他就只有支持贝的意见。他说完暗暗高兴，因为他借此机会对沃尔夫挖苦了一番。首席枢密官赞同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意见，这个案子就这样被否决了。

沃尔夫很不高兴，特别是因为他那种不正当的偏袒行为似乎被揭穿了。不过他装得若无其事，翻开由他报告的玛丝洛娃案的卷宗，用心阅读。枢密官们这时打了打铃，叫人送茶来，又纷纷谈起与卡敏斯基决斗案同时轰动整个彼得堡的



另一件事。

这是关于某局长的案子，他触犯刑法第九九五条，遭到揭发检举。

“太下流了！”贝不胜嫌恶地说。

“这有什么不好？我可以在图书资料里找出一位德国作家的文章给您看。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这种事不算犯罪，男人同男人也可以结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拚命吸着一支夹在指根中间揉皱的香烟，声音响亮地哈哈大笑。

“那不可能。”贝说。

“我可以拿给您看。”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举出那本著作的全名，甚至还说出出版年份和地点。

“据说他已被调到西伯利亚某城当省长去了。”尼基丁说。

“太好了。主教准会举着十字架去迎接他。应该找一个同他一样的主教。我倒可以推荐一个给他们。”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着，把烟蒂丢进茶碟，然后又竭力把上下胡子都塞到嘴里咀嚼。

这时候，民事执行吏进来报告说，律师和聂赫留朵夫希望在审理玛丝洛娃一案时出庭作证。

“这个案子啊。”沃尔夫说，“倒是一件风流韵事呢。”他就把他所知道的聂赫留朵夫跟玛丝洛娃的关系讲了一遍。

枢密官们就这事谈了一阵，吸足烟，喝够茶，然后回到法庭，宣布对上一个案子的裁决，接着开始审理玛丝洛娃案。

沃尔夫用尖细的嗓子详细报告了玛丝洛娃要求撤销原判的申诉，他的措辞又不很公正，明显听得出是希望撤销法庭的原判。

“有什么您要补充的吗？”首席枢密官转身问法纳林。

法纳林站起来，挺起穿着白胸衬的宽阔胸膛，措辞庄重而准确，逐条证明法庭有六点背离了法律规定。此外他还扼要提了一下本案的实质，指出原判的不公正令人发指。法纳林作了简短有力的发言，他的口气仿佛是在表示歉意，因为他相信所坚持的理由，诸位枢密官凭他们明察秋毫的目力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一定看得比他更明白，更透彻地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出于所承担的责任的要求罢了。法纳林这番话似乎使人觉得，枢密院无疑会撤销原判。法纳林发言完毕后，得意洋洋地微微一笑。聂赫留朵夫望望律师，看见这种笑容，相信这场官司一定会打赢。不过，他向枢密官们瞅了一眼，才看出只有法纳林一人在笑，一人在得意。枢密官们和副检察官都没有笑，也没有得意的神色，却露出厌烦的神色，象是在说：“你们这种人发言我们听得多了，毫无意思。”直到律师发言完毕，不再耽搁他们了，他们才感到满意。律师发言刚结束，首席枢密官就转身对副检察官说话。谢列宁发言简短而明确，认为要求撤销原判的各种理由都缺乏根据，主张维持原判。于是枢密官又纷纷起立，去开会商议。在议事室里意见有分歧。沃尔夫主张撤销原判。贝了解本案的症结所在，也坚决主张撤销原判，并且根据他的正确理解，给同事们生动地描摹了当时开庭的情景和陪审员们发生误会的经过。尼基丁照例主张严格从事，恪守官样文章，反对撤销原判。这样，本案就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态度。他主张驳回上诉，主要理由是聂赫留朵夫出于道德要求决定同那个姑娘结婚，实在可恶之极。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唯物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任何抽象道德的表现，或者更坏一点，任何宗教的表现，不仅是一种恶劣的癫狂，而且是对本人的侮辱。由这个妓女而引起的这场麻烦，再加上替她辩护的名律师和聂赫留朵夫的亲自出庭，在他看来都是可恶之至。他不住把胡子塞到嘴里，做出一脸苦相，天真地装做并不了解本案内情，只不过认为撤销原判理由不足，因此同意首席枢密官意见，不批准本案的上诉。

就这样驳回了上诉。

## 二十二

“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同收拾好皮包的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这个明明白白的案子，他们还要死抠形式，把它驳回。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连谢列宁都主张驳回。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反复说。“现在怎么办呢？”

“向皇上告御状。趁您还在这里，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来给您起草。”

这时候，个头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服，佩着几枚星章，走

进接待室，来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充足的理由没有哇。”他闭上眼睛，耸耸肩膀说，接着就走开了。

谢列宁也跟着沃尔夫出来了。他从枢密官那里得知他的旧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唇上露出笑意，但眼睛仍旧显得很忧郁。“你来彼得堡我根本不知道。”

“你当上了检察官我也不知道……”

“副检察官。”谢列宁更正说。“你怎么会来枢密院的？”他忧郁而颓丧地瞧着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是这样到这儿来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的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说。“那个上诉状完全缺乏根据。”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

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就应该声明呀。”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繁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对聂赫留朵夫的风流韵事显然毫无所知。聂赫留朵夫注意到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是的，不过就是现在这样，原判显然也是很荒谬的。”他说。

“枢密院是无权这样说的。要是枢密院认为原判不公正，因而把它撤销，那么暂不说枢密院可能丧失立场，不能维护正义，反而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一面回想刚才的案子，一面说，“姑且不说这一点，至少陪审员的裁决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只知道一点，那个女人是完全无辜的，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丧失了。最高机构竟批准了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也无权审查案子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里吧。”他话锋一转，“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外国人讲道。”谢列宁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说。

“是的，我去听过，实在讨厌，我听了一半就走了。”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谢列宁岔开话题使他很恼火。

“哦，那又何必呢？无非是一种宗教感情罢了，虽然有点过火，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简直是胡闹。”聂赫留朵夫说。

“哦，是不能这样说的。说来奇怪只有一点，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道理当作什么新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见解告诉老朋友。

聂赫留朵夫惊奇地仔细瞧瞧谢列宁。谢列宁没有垂下眼睛，他的眼神忧郁，却带有恶意。

“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直勾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太奇怪了。”他说。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这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一定得找个机会再见见面。”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找得到你吗？至于我，晚上七点钟吃饭前总在家里。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告诉聂赫留朵夫他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

“要是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对往外走的谢列宁说，经过这番简短的交谈，他觉得这个原来亲切可爱的人，变得生疏、隔膜而难以理解。

## 二十三

谢列宁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个优秀学生，忠实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非常正直诚恳。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却读得很好，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除了进政府机关工作，没有其他途径，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工作作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却觉得这种工作并不能实现他有益于人们的愿望，也不觉得这样做就尽了本份。由于他同浅薄庸俗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就更加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

他时刻感到，一切都和他的期望截然相反，一切都和应有的情况截然相反。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奔走，替他谋得宫中侍从的职位。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

白麻布胸衬，坐车一家家登门道谢，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听差。他左思右想，也不能解释这种差事的意义。他觉得这种差事比在政府机关任职更加“不对头”，然而，一方面他又不能拒绝这项委任，否则就会惹怒那些热心帮他忙的人。另一方面，这项委任又迎合他的劣根性。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穿金绦制服，人家见到他肃然起敬，又感到沾沾自喜。

他在婚姻问题上也遇到同样情况。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看来很美满的婚姻。他结婚的原因，主要因为如果拒绝这门亲事，他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它成功的新娘和撮合的亲戚，同时也因为同这个年轻貌美、门第显贵的姑娘结婚，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这门亲事很快就被证实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以后，就不愿再生孩子，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也得参加。她长得并不特别美，但对他是忠实的。她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丈夫的生活，自己除了浪费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也可以说一无所获。虽然如此，她还是竭力维持这种生活。他千方百计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但她在亲友支持下认为非这样生活不可，结果他的愿望就象撞在石墙上一样粉碎了。

他们有个女孩，生着长长的金黄鬈发，露着两条白腿。但做父亲的并不喜欢她，主要因为她不是按照他的愿望培养的。夫妇之间经常发生隔阂，甚至双方都不愿意互相了解，因此一场不动声色、瞒过外人耳目、碍于礼节而保持一定分寸的明争暗斗就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痛苦。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就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象所有同时代和同圈子里的人那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就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枷锁，并且不知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脱。他是一个严肃而正直的人，在大学念书、并同聂赫留朵夫交往的青年时代，就公然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官位的步步高升，特别是当时社会上保守的反动势力的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同他的活动发生冲突。且不说家里的情况，尤其是他父亲死后为他做安魂礼拜，母亲要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对他施加的压力。就是在机关里任职，他也不得不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而且无法逃避。对这种礼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假装信仰（凭他诚实的天性，这是办不到的），要么认为这些宗教仪式虚伪，竭力避免参加。但为了处理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却需要做大量工作。除了必须同周围的人经常斗争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自以为通过现在职务可以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利益。为了要这样做，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就象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在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只好自己欺骗一下自己。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首先就得进行研究。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但它却把他引向大的虚伪，他至今还不能摆脱。

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全要他信仰东正教，不承认这个教，他就无法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的活动。因此，对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在心中他早已有了答案。同时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的著作，而读黑格尔的哲学和维奈、霍米雅科夫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论著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精神上的宽慰和对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宗教教义的熏陶，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它们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会充满烦恼，而只要承认它，一切烦恼就会都消失了。此外，他也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术，例如个人的智慧无法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总和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神的启示，只有教会才能保存神的启示，等等。自从那时起，他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守斋，对着圣像画十字，继续在机关任职，并不感到在自欺欺人。而在机关任职就使他觉得对人有益，并给他缺乏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安慰。他自认为信仰东正教，但另一方面，整个身心又空前强烈地感到，这种信仰完全“不对头”。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想起当年他认识聂赫留朵夫时还没有沾染这种虚伪的习气，他是个怎样的人。尤其是在他迫不及待地向聂赫留朵夫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以后，他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不对头”，心里十分悲哀。聂赫留朵夫见到这个老朋友，在一阵高兴以后，也有同样的感觉。

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表示再要见面，却没有

找机会会晤，结果在聂赫留朵夫逗留彼得堡期间，就没有再见过面。

## 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同律师一起从枢密院出来，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然后给聂赫留朵夫讲述枢密院里提到的那个局长的事，讲到 he 怎样被揭发检举，但他非但没有被依法判处苦役，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当省长了。律师讲完这事的前后经过和全部丑恶的内幕，还津津有味地讲了另一件事：有一笔捐款原是用作建造他们今晨乘车经过的一座未完成的纪念碑的，却被几个地位很高的人侵吞了，而那座纪念碑一直没有建成。他又讲到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发了几百万横财；某人出卖老婆，由某人买进。此外，律师还讲到政府高级官员怎样营私舞弊，犯下种种罪行，他们非但没有坐牢，而且在机关里仍旧坐着头几把交椅。这类奇闻轶事显然是讲不完的。律师讲得眉飞色舞，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律师赚钱的手段，同彼得堡高级官员赚钱的手段相比，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不等听完高级官员犯罪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自己雇马车回河滨街姨妈家去时，律师不禁感到很惊讶。

聂赫留朵夫心里非常愁闷。他所以愁闷，主要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无辜的玛丝洛娃不得不忍受无尽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他要跟她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就更难实现。再有，他想起律师津津有味地讲到那些骇人听闻的丑事，以及不时浮现在他面前的谢列宁的眼神——以前是那么坦率、高尚、可爱，如今却变得那么凶恶、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一切使他十分不愉快。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字条，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气，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她写道，她专程前来致谢她女儿的救命恩人，并恳请他光临瓦西里耶夫岛五马路某号。她还写道，薇拉非常希望他去。还说他不用顾虑，她们决不会用感谢的话来亵渎他的高尚情操。她们不会向他道谢，她们只是想见见他。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他在明晨光临。

另一张字条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写的。聂赫留朵夫曾托他把聂赫留朵夫亲自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呈交皇上。鲍加狄廖夫用粗大豪放的笔迹写道，他将信守诺言，把状子面呈皇上。但他有个主意，聂赫留朵夫是不是先去找一找经办本案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几天所得的印象，使他灰心丧气，觉得要办成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希望的。他觉得在莫斯科拟订的计划，就象青年时代的梦，一旦走进生活，就全部破灭。不过既然已来到彼得堡，他认为原定计划还是应该执行，于是决定明天先到鲍加狄廖夫家，然后照他的意见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人。

他刚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想重新读一遍，不料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听差来敲门，请他上楼喝茶。

聂赫留朵夫说他马上去。他把状子立刻收回皮包里，就到姨妈那儿去。上楼的时候，他无意中从窗子里往街上张望了一下，看见玛丽爱特那对枣红马，不禁高兴起来，忍不住想笑。

玛丽爱特头上戴着帽子，但身上穿的已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一件花哨的浅色连衣裙。她手里拿着一杯茶，坐在伯爵夫人圈椅旁，嘴里尖声尖气地嘟囔着什么，那双笑盈盈的美丽眼睛闪闪发亮。聂赫留朵夫进来的时候，玛丽爱特刚说了一句可笑的话，一句不成体统的笑话——聂赫留朵夫从笑声中听得出来，——逗得心地善良的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呵呵大笑，连肥胖的身子都哆嗦起来。玛丽爱特露出调皮的神气，微微撇着含笑的嘴，扭过她那张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脸，默默地瞧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从他听到的几个字中听出，她们在谈论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关于西伯利亚新省长的轶事。玛丽爱特就是在这件事上讲了一句非常可笑的话，逗得伯爵夫人好久都止不住笑。

“你可把我笑死了。”她笑得咳嗽起来，说。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批评玛丽爱特举止如此轻浮，玛丽爱特已发现他板着脸，有些不高兴。她立刻改变脸色，以及整个情绪，来讨他的欢心。自从她见到他以后，总是竭力这样做。此刻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似乎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她这

倒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产生了和聂赫留朵夫同样的心情，虽然她说不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她问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他就讲了上诉枢密院失败的过程，还讲到他遇见了谢列宁。

“啊！一颗多么纯洁的灵魂！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骑士。一颗纯洁的灵魂。”两位太太用了上流社会对谢列宁的惯用外号。

“他的妻子是个什么人呢？”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但她不了解他。怎么，难道她也主张驳回上诉吗？”玛丽爱特怀着由衷的同情问，“这太糟了，我非常可怜她！”她叹息着又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想改变话题，就谈起那个关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的舒斯托娃。他向玛丽爱特道谢，感谢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接着他说，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只因没有人想到他们而受苦，这件事想起都可怕，但她不让他把话说完，立刻把她的愤慨表现了出来。

“您不用对我说这些话。”她说。“我丈夫一告诉我她可以放出来，我就大吃一惊。既然她没有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看到玛丽爱特在同外甥调情，觉得很好玩。

“你听我说。”伯爵夫人等他们沉默下来，说，“你明天晚上到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吧。”她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告诉他，他说那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爱特，叫他务必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呀，伯爵夫人，第一，没有任何权利指挥公爵的行动。”玛丽爱特盯着聂赫留朵夫说，并且用这种目光表示，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上，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上，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完全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太喜欢……”

“不论什么事你总是顶牛，自作主张。”

“我怎么自作主张？我象个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嘻嘻地说。“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那你看到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说。

玛丽爱特说了那个著名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她演得太好了，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那我应该先去看谁呢，我的姨妈，先看女演员，还是先看传教士？”

“你不要找我的碴儿。”

“我想还是先看传教士，再看法国女演员的好，要不然就根本没有兴致去听讲道了。”聂赫留朵夫说。

“不，最好还是看完法国戏后再去忏悔。”玛丽爱特说。

“哼，你们别拿我取笑了。讲道是讲道，做戏是做戏。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可不用把脸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信仰会使人快活。”

“您哪，我的姨妈，传起教来可不比随便哪个传教士差呢。”

“我看这样吧。”玛丽爱特笑了笑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恐怕我去不成……”

一个听差进来通报有客来访，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那是伯爵夫人主持的慈善团体的秘书。

“哦，那是个很没意思的人。我还是到那边去接待他吧。回头就来。您给他倒点茶，玛丽爱特。”伯爵夫人说，向客厅轻快走去。

玛丽爱特脱下手套，露出一只强壮扁平、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手。

“要茶吗？”她说，拿起酒精灯上的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小手指。

她的脸色显得严肃而忧郁。

“我很尊重人家的意见，可他们总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弄得我心里很难过。”

玛丽爱特说最后几个字时，似乎要哭出来。她这些话，只要仔细想一想，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说并没有什么特别意思，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诚恳和善良。这是因为这位年轻美丽、衣着讲究的女人说这话时，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完全把聂赫留朵夫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着她，眼睛没有离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谁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赞赏您的行为，对您表示钦佩。”

“说实话，没什么值得赞赏的，我做得还不够。”



“这没关系。我了解您的心情，也了解她……嗯，好吧，好吧，这事不谈了。”玛丽爱特察觉到他脸上不高兴的神色，把话收住。“不过我还了解，您亲眼目睹监狱里的种种苦难，种种可怕的景象。”玛丽爱特说，一心想把他迷住，并且凭她女性的敏感猜出他重视的是什么，“那些苦难的人您想给予帮助，他们由于人家的冷酷和残忍吃尽了苦，真是吃尽了苦……我了解有人可以为此献出生命，我自己也真愿意这样做。但各人有各人的命……”

“难道您对您的命不满意吗？”

“我吗？”玛丽爱特问，仿佛搞不懂人家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应该满意，事实上也是满意的。不过我心里似乎有一条虫子在觉醒……”

“是不应该再让它睡觉了，应该相信它的呼声。”聂赫留朵夫说，把她的花言巧语当作真心话。

事后聂赫留朵夫多次回想同她的谈话，感到很羞愧。他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虚伪的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话，还有当他讲到监狱里的种种惨状和乡村的印象时，她那副悲天悯人的表情。

等伯爵夫人回来，他们已谈得十分投缘，仿佛老朋友一般。且不仅是老朋友，简直是极其知心的朋友。好象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唯独他们俩能相互了解。

他们谈到当权者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但在谈话时眉来眼去，仿佛在问：“你能爱我吗？”对方就回答说：“我能。”异性的魅力通过想象不到的迷人方式把他们相互吸引住了。

临走时，玛丽爱特对他说，她永远愿意为他效劳，并要求他明天务必到戏院去找她，哪怕只去一分钟也好，因为一件要紧事她要同他谈。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呢？”她叹了一口气，又说。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戴满戒指的手上。“您要说您一定会来。”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那天晚上，聂赫留朵夫独自待在房间里。他灭了蜡烛，在床上躺下，可是好久睡不着。他想起玛丝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决心跟她一起走，想起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突然，似乎同这些念头作对似的，他的眼前出现了玛丽爱特的脸、她的叹息、她说“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呢”这句话时的眼神以及她的笑容。这些形象是那么清楚，就象他真的看到了她。他不禁笑了。“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样好不好呢？我要放弃财产，这样又好不好呢？”他问着自己。

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月夜，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游移不定。他的头脑里一片混乱。他想唤起原来的思绪，继续思索原来的那些事情，可是他自己无法被他说服了。

“万一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无法那样生活，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后悔，那怎么办？”他问自己，却无法回答，心里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烦恼和绝望。他理不清这些问题，却渐渐进入痛苦的梦乡，就象以前赌输了一大笔钱后那样。

## 二十五

聂赫留朵夫早晨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昨天他做了一件卑劣的事。

他开始回想：卑劣的事没有做过，坏行为也没有，但有过一些想法，一些坏的想法，那就是他现在的种种打算，例如同卡秋莎结婚，把土地交给农民等，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无法坚持，都脱离实际，都不自然，他应该象过去那样生活才是。

坏的行为也确实没有，但有比坏行为坏得多的东西。那就是引起种种坏行为的思想。坏行为可以不再重犯，并为此感到后悔，但坏思想却经常产生坏行为。

一种坏行为能为其他坏行为开路；而坏思想却会拖着人顺着那条路一直往下滑。

早晨聂赫留朵夫在头脑里重温昨天的思想，不由得感到惊奇，自己怎么会有那些想法，哪怕只有一刹那。不论他打算做的事是多么新奇，多么困难，他也知道，这样行动是他现在唯一的出路。他知道，恢复原来的生活是多么轻而易举，但那是死路一条。他现在觉得，昨天的诱惑好比一个睡过头的人，已经不想再睡，却还要赖在床上，迷糊一会儿，虽然

他明明知道，他该起床去做那些等着他去做的重要而快乐的事。

今天是在彼得堡逗留的最后一天。他一早就到瓦西里耶夫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住在二楼。聂赫留朵夫按照扫院子人的指点，找到后门，顺着陡直的楼梯上去，一脚踏进了闷热的食物味道很浓的厨房。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卷起袖子，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里搅拌什么东西。

“您找谁？”她从眼镜架上边瞅着来客，厉声问。

不等聂赫留朵夫报名，惊喜交集的神色在那女人脸上却出现了。

“哦，公爵！”那女人用围裙擦擦手，惊叫起来。“您怎么走后楼梯呀？您是我们的恩人！我就是她的母亲。本来他们会把我们的姑娘完全给毁掉的。是您救了我啊！”她说着抓住聂赫留朵夫的手，拚命吻着。“我昨天到您那儿去过。是我妹妹特意要我去的。她就在这里。您跟我来，这边走，这边走。”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领聂赫留朵夫穿过一道狭门和一条黑暗的小过道，放下掖起的衣襟，理理头发说。“我妹妹叫柯尔尼洛娃，您大概听人说起过吧。”她在门口站住，轻声加了一句。“她被牵连到政治事件里去了。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打开一扇走廊门，把聂赫留朵夫领到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一张桌子，后面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身体丰满、个儿不高的姑娘，身穿一件条纹布上衣，一头淡黄的髻发围着一张苍白的圆脸，相貌很象她的母亲。她对面的

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男青年，腰弯得很低，穿一件绣花领子的俄国式衬衫，嘴唇上和下巴上都留着黑色的胡子。他们两人谈得津津有味，直到聂赫留朵夫进门，才回过头来。

“丽达，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就是……”

脸色苍白的姑娘紧张地跳起来，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滑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用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瞪着来客。

“那么，你就是薇拉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女人吗？”聂赫留朵夫说，笑眯眯地向她伸出手来。

“是的，我就是。”丽达说，露出一排漂亮的牙齿，象孩子般善良地笑了一笑。“我姨妈很想见见您呢。姨妈！”她用婉转悦耳的声音对着门叫了一声。

“薇拉因为您被捕心里很难过。”聂赫留朵夫说。

“请坐，来这儿坐舒服些。”丽达指着青年刚才坐过的那把破沙发说。“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觉聂赫留朵夫打量着那青年，就说。

那青年也象丽达一样和善地微笑着，同客人握手问好。等聂赫留朵夫在位子上坐下，他就搬过窗口一把椅子，坐在旁边。从另一扇门里又进来一个浅黄头发的中学生，大约十六岁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坐到窗台上。

“薇拉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可以说认识她。”丽达说。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进来一个女人，生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身穿白色短上衣，腰里束一条皮带。

“您好，您特地跑到这儿来，真是太感谢了。”她在长沙发上挨着丽达坐下，说。“哦，我们的薇拉怎么样？您见到她了？她生活得如何？”

“她不抱怨。”聂赫留朵夫说，“她说她的自我感觉好得不能再好了。”

“唉，我的薇拉，我了解她。”姨妈笑着摇摇头说。“应该了解她。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总是一心一意为别人，从来不替自己着想。”

“是的，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她只为您的外甥女操心。她说，她难过的主要是您的外甥女无缘无故被捕了。”

“确实是这样。”姨妈说，“这事真糟糕！说实在的，她是替我受罪。”

“根本不是的，姨妈！”丽达说。“即使您没有委托我，那些文件我也会保管的。”

“这事我可知道得比你清楚。”姨妈说。“不瞒您说。”她又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这是因为有人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房子，就把那些文件送到她那儿。不料当天晚上就来搜查，那些文件和她都被带走了。她一直关到现在，他们逼她说出这些文件是从谁手里拿来的。”

“我一直没有讲。”丽达慌忙说，神经质地撩一下头发，虽然那绺头发并不碍她的事。

“我又没有说你讲出来。”姨妈反驳说。

“他们逮捕了米丁，那也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丽达说，脸涨得通红，心神不宁地向四下里张望着。

“这事你不用提了，丽达。”做母亲的说。

“为什么不用提，我偏要讲。”丽达说着，已经收起笑容，但脸色还是通红，她不再撩头发，却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昨天你一提到这事，不是出了岔子吗？”

“根本没有……您不要管，姨妈。我一言未发，一直没吭声。他两次审我，问到姨妈，问到米丁，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还对他声明，我什么话也不回答。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个暗探，是个宪兵，是个大混蛋。”姨妈插嘴给聂赫留朵夫解释说。

“于是他。”丽达慌慌张张地继续说，“他便来说服我。他说：‘不论您对我说什么，都不会损害什么人，正好相反……您要是说出来，那么，那些也许是被我们冤枉的人就可以获得自由。’哼，可我还是咬定不说。于是他就说：‘嗯，好吧，您不说就不说，但我说出来您也别否认。’于是他就举出一个个名字来，也提到了米丁。”

“啊，你别讲了。”姨妈说。

“哎，姨妈，您别打岔……”她不断地拉扯着她那绺头发，不断往四下里张望。“到了第二天，真是想不到，忽然有人敲墙头告诉我，米丁被捕了。唉，我想这是我把他出卖了。我难受极了，这要使我发疯了。”

“其实他被捕同你完全没有关系。”姨妈说。

“可我当时不知道。我还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从这边墙跟走到那边墙跟前，走过来，走过去，头脑难以安静。总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躺下来睡觉，盖上被子，就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你把米丁出卖了，你把米丁出卖了，米丁是你出卖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是又无法克制。我想睡，睡不着；而不想又做不到。哦，这真是可怕！”丽达越说越激动，

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再把它松开，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丽达，你安静一下吧！”母亲说着碰碰她的肩膀。

可是丽达已克制不住了。

“这种事可怕就可怕在……”她又开口说，但没有说完就开始哭起来。她从沙发上跳起来，衣服在圈椅上钩了一下，从房间里冲了出去。母亲跟着她跑出去。

“统统绞死那些混蛋！”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姨妈问。

“我没说什么……只是随便说说。”中学生回答，抓起桌上的一支香烟，点上火，吸了起来。

## 二十六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真是可怕。”姨妈摇摇头说着，也点上一支烟。

“我看对谁都一样。”聂赫留朵夫说。

“不，不是对谁都一样。”姨妈回答。“我听人家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疗养。一个地下工作者总是生活动荡，缺衣少食，并且为自己、为别人、为事业提心吊胆，可是一旦被捕，就没事了，一切责任都可以卸下，你就坐下来休息吧。我听他们说，被捕时还高兴呢。不过，对



没有罪的年轻人——象丽达那样没有罪的人总是首先被捕，——对这些人来说，第一次打击确实很沉重。这倒不是因为丧失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对待，伙食很差，空气很坏，等等，这种种苦难都无所谓。苦难即使再加两倍，也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初次被捕时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

“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坐过两次牢。”姨妈凄苦而动人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那时有了一个孩子时，我才二十二岁，而且又怀孕了。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再痛苦，比起精神上的痛苦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当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一样任人摆布的东西。我想同女儿告别，可是他们逼我坐上马车。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说到了就会知道。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我。受过审问后，我被迫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编号的囚衣，又被押回走廊。他们打开牢门，把我推进牢房，再锁上门。他们走了，只留下一个掇枪的哨兵。他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我感到难受极了。当时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惊讶，那就是审问的时候宪兵军官递给我一支烟。可见他也懂得人是喜欢吸烟的。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他亦懂得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为什么冷酷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象一头野兽似的锁起来呢？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不可能不受到伤害。一个人原来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就会丧失这种信念。我不再相信人就是从那时起，心肠也变硬了。”她说完微微笑了笑。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进来，说丽达情绪不好，不来了。

“唉，为什么要这样摧残一个年轻的生命？”姨妈说。“我特别难过的是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康复的。”做母亲的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要不是您费了心，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谢谢您。我要同您见面，因为这有一封信要托您转交给薇拉。”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看，或者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总之，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信里并没有什么损害人的名誉的话。”她说。

聂赫留朵夫接过信，答应把它转交，然后起身告辞。

信他没看，把口封好，决定把它交给薇拉。

## 二十七

聂赫留朵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教派信徒案。他准备通过军队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把状子呈交皇上。他一早乘车来到鲍加狄廖夫家，碰到他还在吃早饭，但马上就要出门。鲍加狄廖夫生得矮壮结实，体力过人，能空手扭弯马蹄铁。他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

至有点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具有这些特点，但同宫廷关系密切，热爱皇上和皇族。他还有一种惊人的本领，那就是生活在社会最上层，却只看好的一面，也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正当活动。他从来不指摘什么人，也不批评什么措施。他总是要么声若洪钟地大胆说出他要说的话，要么保持沉默，同时纵声大笑。他这样大声说笑倒不是装腔，而是出于他的性格。

“啊，你来了，太好了。你不吃点早饭吗？要不你就坐下来。煎牛排挺不错。我吃一顿饭的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那么，你来喝点酒。”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大声说。“我一直在想你呢。那个状子让我递上去。当面呈交皇上，这没有问题。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下。”

他一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皱了皱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作主。不管怎样总归要去问他。说不定他当场就会满足你的要求。”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一下。”

“那太好了。嗯，彼得堡给你的印象怎么样？”鲍加狄廖夫大声说，“你说说，好吗？”

“我觉得我仿佛中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说。

“中了催眠术？”鲍加狄廖夫重复着他的话，哈哈大笑。“你不想吃，悉心尊便。”他用餐巾抹抹小胡子。“那么，你去找他吗？呃？要是他不干，那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他又大声说，接着，从桌旁站起来，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显然象他擦嘴一样漫不经心，然后佩上军刀。“那么，

再见了，我得走了。”

“我也要走了。”聂赫留朵夫，高兴地握了握鲍加狄廖夫强壮有力的大手说，象每次看到健康、朴实、生气勃勃的东西那样，他头脑里留下愉快的印象，在大门口同鲍加狄廖夫分了手。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去一次不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听从鲍加狄廖夫的劝告，坐车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案的人托波罗夫。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从其职责来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只有头脑迟钝和道德沦丧（托波罗夫正好具有这两种缺点）的人才看不出来。这种矛盾就在于它的职责是不择手段——暴力也包括在内——维护和保卫教会，但按教义来说，教会是由上帝建立的，它绝不会被地狱之门和任何人力所动摇。而这个由上帝创建并绝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的神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这类官僚所主管的机构来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没有看到这种矛盾，或许是不愿看到。因此他百倍警惕，唯恐有哪个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者教派信徒破坏地狱之门都无法征服的教会。托波罗夫也象一切缺乏基本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那样，确信老百姓是一种跟他完全不同的生物。有一种东西老百姓非有不可，而他即使没有也没有关系，他自己在灵魂深处没有任何信仰，并且觉得这样精神上无拘无束，十分惬意，但他唯恐老百姓也百无禁忌。因此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神圣职责是把他们从这种精神状态中解救出来。

有本烹调书说，龙虾天生喜欢被活活煮死；同样，他充

分相信老百姓天生喜欢成为迷信的人。不过，烹调书里用的是转义，他的话却是本义。

他对待他所维护的宗教，就象养鸡的人对待他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招人讨厌，但鸡却喜欢吃，因此得用腐肉来喂鸡。

不用说，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啦，喀山圣母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啦，都是愚昧的偶像崇拜，但既然老百姓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那就得维护这种愚昧。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之所以容易接受迷信，就是因为自古以来总是有象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这批人自己有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还要加强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在黑暗之中。

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办公室里同女修道院院长谈话。那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族妇女，她在俄国西部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信徒中间传播东正教，维护它的势力。

在接待室里，值班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打算为教派信徒向皇上呈送状子，值班官员就问能不能先让他看一看。聂赫留朵夫把状子交给他，他接了状子走进办公室。女修道院长头戴修道帽，脸上飘着一块面纱，身后拖着黑色长裙走出来。她拿着一串茶晶念珠，雪白的双手把指甲剔得干干净净，合抱在胸前，往出口处走去。但聂赫留朵夫却没有被请到办公室去。托波罗夫正在里面看状子，一边看一边摇头。他读着这个叙述清楚、行文有力的状子，心

里感到惊奇和不快。

“这状子万一落到皇帝手里，就可能引起麻烦，造成误会。”他看完状子想。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打了打铃，吩咐手下人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想起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且早就收到过他们的状子。原来这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后来送交法庭受审，法庭却判无罪释放。于是主教会同省长就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硬拆散丈夫、妻子和孩子，流放到不同地方。那些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则请求不要把他們拆散。托波罗夫记得当初这案子落到他手里时的情形。他当时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行为。但他知道，批准原来的决定，把这些农民家庭拆散分送到各地去，是不会有什麼害处的；倘若让他们留在原地，那就会影响其他居民，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再说，这事主教特别起劲，因此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决定办理。

可如今，忽然冒出一个聂赫留朵夫，一个在彼得堡交际广阔的辩护人。这个案子则可能作为一个暴行提到皇帝面前，或者刊登在外国报纸上，因此他当机立断，作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决定。

“您好。”他还是装出十分忙碌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起案子来。

“这个案子我知道。我一看到那些人的名字，就想起这个不幸的案子。”他拿状子向聂赫留朵夫一晃，说，“这件事您提醒了我，我很感谢。这事省当局做得过分了……”聂赫留朵夫默不作声，厌恶地瞅着这张没有血色、毫无表情象假

面具一样的脸。“我这就下命令撤销决定，把他们送回原籍。”

“那我就不用把这状子递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完全用不着。这事我答应您了。”他说时把“我”字说得特别响，显然充分相信自己的诚实，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麻烦您坐一下。我还是现在就写个命令的好。”

他走到写字台旁，坐下来写。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他那狭长的秃头，瞧着他那只迅速挥动钢笔的青筋毕露的手，心里感到惊奇，象他这样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此刻怎么肯做这件事，而且做得这么卖力。这是什么缘故？

.....

“喏，好了。”托波罗夫封上信，说，“您去告诉您那些当事人吧。”他加上说，撇一撇嘴唇，做出微笑的样子。

“那么，这些人究竟为什么受罪呀？”聂赫留朵夫接过信封问。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好像觉得聂赫留朵夫的问题很有趣。

“这一点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捍卫的人民的利益太重要了，因此对宗教问题过分热心，决不会比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这个问题过分冷淡有害和可怕。”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要求，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呢？……”

托波罗夫仍旧那么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觉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很好玩。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托波罗夫从国家高度看问题，总觉得他的话很偏激，很好玩。

“从个人观点看，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他说，“不过从国

家观点看，情况就不同了。对不起，我少陪了。”托波罗夫说着，低下头，伸出一只手。

聂赫留朵夫握了一下那只手，然后一言不发地匆匆走了出去，马上又后悔同他握了手。

“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腔调说。“你的利益，不过是你的利益罢了。”他走出托波罗夫官邸时想。

聂赫留朵夫头脑里逐一闪现被这些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和教育人民的机关处理过的人。他想到了因贩卖私酒而被判刑的农妇、因盗窃而被判刑的小伙子、因流浪而被判刑的流浪汉、因纵火而被判刑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而被判刑的银行家，以及仅仅因为要从她身上弄到必要情报而被监禁的不幸的丽达，还有因反东正教而被判刑的教派信徒，还有因要求制订宪法而遭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聂赫留朵夫仔细考虑，得出明确的结论：所有这些人被捕、被关或者被流放，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轨行为，或者有犯罪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和富人据有他们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财富。

妨碍他们这种剥削行为的包括贩卖私酒的农妇，在城里闲荡的小偷，藏匿传单的丽达，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和要求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所以聂赫留朵夫觉得十分清楚，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和托波罗夫起，直到政府各部里坐在办公桌旁官微职小而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止，他们对于无辜的人遭殃，根本无动于衷，反而把这些危险分子清除。

因此，他们不但不遵守宁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而决不冤



枉一个无辜的人这个信条，恰恰相反，他们宁可惩罚十个没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就象为了挖掉腐烂的皮肉，不惜把好的皮肉也一起挖掉。

这样解释眼前的种种现象，聂赫留朵夫觉得真是再简单明白不过了，但也就因为太简单明白，聂赫留朵夫反而犹豫不决，不敢肯定这样的解释。这样复杂的现象总不能用这样简单而可怕的理由来解释吧。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总不能只是一些空话，用来掩盖最野蛮的贪欲和暴行吧。

## 二十八

聂赫留朵夫原定那天傍晚离开彼得堡，但他答应玛丽爱特到戏院里去看她。虽然明明知道不该去，但他还是违背理性，以履行诺言为理由，到戏院去了。

“我能抵挡得住那种诱惑吗？”他内心斗争着。“我再试一次吧。”

他换上礼服，来到剧场。这时，《茶花女》正好演到第二幕，那个从国外新来的女演员正用新的演技表现患痨病的女人怎样渐渐死去。

剧场满座。聂赫留朵夫打听玛丽爱特的包厢在哪里，立

刻就有人恭恭敬敬地指给他看。

走廊里有一个穿号衣的跟班，象见到熟人一般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给他打开包厢门。

对面几个包厢里一排排坐着的和站在后面的人，在包厢旁边靠墙坐着的看客，正厅里的观众，有的白发苍苍，有的头发全秃，有的头顶半秃，有的涂过发蜡，有的头发鬈曲，总之，全体观众都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个身裹绸缎和花边、瘦得皮包骨头的女演员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地念着独白。包厢门打开时，有人嘘了一声，同时有两股气流，一股冷，一股热，向聂赫留朵夫脸上袭来。

包厢里坐着玛丽爱特和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那女人披着红披肩，头上盘着又高又大的发髻。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玛丽爱特的丈夫，一个是高大英俊的将军——神情严肃，高深莫测，生着鹰钩鼻子，胸部用棉花和土布胸衬垫得很高。另外一个男人头发浅黄，头顶半秃，留着威严的络腮胡子，下巴剃得很光洁。玛丽爱特妩媚，雅致，身材苗条，袒胸露肩的夜礼服更显露出她那丰满的美人肩和脖子与肩膀之间的一块黑痣。聂赫留朵夫一走进包厢，她立刻转过头来，用扇子指指她身后的一把椅子，对他嫣然一笑，表示欢迎和感激，但他觉得她的笑还别有一番情意。她的丈夫若无其事地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点了一下头。从他的姿势，从他同妻子交换眼色的神气中都可以看出，他就是这个美人的主人和所有者。

女演员的独白一念完，剧场里掌声雷动。玛丽爱特站起来，提起沙沙作响的绸裙，走到包厢后边，把聂赫留朵夫向丈夫介绍了一下。将军眼睛里一直含着笑意，嘴里说了一句

“幸会，幸会！”就心平气和而又莫测高深地不再吭声。

“我本来今天要走，可是我答应过您。”聂赫留朵夫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您要是不愿来看我，那么您就看看那个出色的女演员吧。”玛丽爱特针对他话中的话说。“她在最后一幕里演得太漂亮了，是吗？”她转身对丈夫说。

丈夫点点头。

“这戏打动不了我。”聂赫留朵夫说。“因为今天我看到了太多不幸的事……”

“您坐下来，讲一讲。”

她丈夫留神听着，眼睛里的讥笑越来越明显了。

“我去看过那个长期坐牢、刚刚放出来的女人。她完全垮了。”

“就是我对你说起过的那个女人。”玛丽爱特对丈夫说。

“是啊，她获得了自由，我很高兴。”他平静地说，摇摇头，在小胡子底下露出聂赫留朵夫认为显然是嘲讽的微笑。“我出去吸吸烟。”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等待玛丽爱特对他讲她要告诉他的那些话，可是她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讲，甚至没有要讲的意思，老是开着玩笑，谈着那个戏，说它一定会特别打动聂赫留朵夫的心。

聂赫留朵夫看出她根本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无非是要让他看看自己穿着夜礼服、露出肩膀和黑痣有多么迷人罢了。他感到又愉快又嫌恶。

她那娇艳的外表原来遮盖了一切，如今在聂赫留朵夫面

前虽不能说已经完全揭开，但毕竟让他看到了里面隐藏着的東西。他瞅着玛丽爱特，欣赏着她的姿色，但心里明白她是个虚伪的女人，她同那个用千百人的眼泪和生命猎取高官厚禄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却完全无动于衷。他还知道她昨天说的都是谎话，只是一味要把他迷往。至于为了什么，他不知道，她也不知道。他对她又迷恋又嫌恶。他几次拿起帽子想走，却又留下了。最后，她丈夫回到包厢里，浓密的小胡子散发着烟味，他居高临下、鄙夷不屑地对聂赫留朵夫瞧了一眼，仿佛不认得他似的。聂赫留朵夫不等包厢门关上，就来到走廊里，找到大衣，走出剧场。

他沿着涅瓦大街步行回家，发现在前面宽阔的人行道上有個女人悄无声息地走着。这女人个儿很高，身段优美，装束妖冶。从她的脸上和整个体态上都可以看出，她知道自己具有一种淫荡的魅力。凡是迎面走来的人和从后面赶上去的人，个个都要瞧她一眼。聂赫留朵夫走得比她快，也情不自禁地打量了一下她的脸。她的脸擦过脂粉，很好看。眼睛闪闪发亮，对聂赫留朵夫嫣然一笑。说也奇怪，聂赫留朵夫顿时又想到了玛丽爱特，因为他又象在剧场里那样产生了又迷恋又嫌恶的感觉。聂赫留朵夫匆匆赶到她的前头，不由得生自己的气。他转身拐到海军街，然后又来到滨河街，在那里来回踱步，引起警察的注意。

“刚才我走进剧场包厢的时候，那个女人也是这样对我嫣然一笑。”他心里想，“不论是那个的微笑，还是这个的微笑，含意都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这个女人直截了当地说：‘你需要我，那就可以摆布我。你不需要我，那就走你的路。’那

个女人装模作样，仿佛生活在高尚的情操中根本没想到这种事，其实骨子里都是一回事。这个女人至少老实些，那个女人却一味装假。何况这个女人是因为穷才落到这步田地，而那个女人却是放纵这种又可爱又可恶又可怕的肉欲，寻欢作乐。这个街头女郎是一杯肮脏的臭水，是供那些口渴得顾不上恶心的人喝的；剧场里那个女人却是一剂毒药，谁接触她，谁就会不知不觉被毒死。”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同首席贵族妻子的关系，可耻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人身上的兽性真是可憎。”他想，“当它赤裸裸地出现的时候，你从精神生活的高度观察它，就能看清它，蔑视它。因此不论你有没有上钩，你本质上不会受影响。不过，当这种兽性蒙上一层诗意盎然的华丽外衣，把你迷得神魂颠倒时，你就会对它敬若神明，跌进它的陷阱，分不清好坏。这才可怕呢。”

这一层聂赫留朵夫现在看得一清二楚，就象他看见前面的皇宫、哨兵、要塞、河流、木船、交易所一样。

今天夜里没有让人静心休息、催人安眠的黑暗，只有不知来自何处的朦朦胧胧的奇怪亮光。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同样不再存在愚昧的黑暗，使他昏然入睡。一切都清清楚楚。事情很明白，凡是人们认为重要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卑鄙龌龊，不值一提的。而那些光辉夺目、富丽堂皇的外衣，往往掩盖着司空见惯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风靡一时，被人们费尽心机加以美化。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这些事忘掉，避开，但他却不能视而不见。虽然他还没有看到替他照亮这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正象他不知道照亮彼得堡的光是从哪里来的一样，虽然这种

光显得朦胧，暗淡，古怪，他却不能无视这种光替他照亮的东西。他心里感到又快乐又惶恐。

## 二十九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把枢密院维持法院原判这一不幸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他对那份由律师起草、此刻将让玛丝洛娃签字准备呈交皇上的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说也奇怪，这事他现在倒不希望成功。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生活到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去。因此，要是玛丝洛娃无罪释放，他简直难以想象他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洛的话。梭洛在美国还存在奴隶制的时候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或得到庇护的国家里，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他在彼得堡访问了各种人，见到种种情景以后。

“的确，在现代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当他坐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的围墙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切。

医院看门人一认出聂赫留朵夫，立刻告诉他，玛丝洛娃

已经不在这里了。

“她去哪里了？”

“又回牢房了。”

“怎么又把她调回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她们本来就是那号人嘛，老爷。”看门人鄙夷不屑地笑着说，“她同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师打发走了。”

聂赫留朵夫万万没有想到玛丝洛娃的精神状态竟同他如此相似。听到这个消息，仿佛突然感到大难将要临头，不由得楞住了，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他感到难受极了。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竟得意扬扬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他想，她拒绝接受他的牺牲，她的责备，她的眼泪，这一切都是一个堕落女人的诡计，只不过想尽量从他身上多捞到点好处罢了。又觉得，上次探监时从她身上看出她这人不可救药，如今更显得一清二楚。当他随手戴上帽子，走出医院时，他的头脑里掠过这样的想法。

“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同甘共苦吗？既然她这样做，我可以撇开她不管吗？”

不过，他刚对自己提出这问题，就立刻明白，他可以撇开她不管，其实受到惩罚的不是他想惩罚的她，而是他自己。他害怕起来。

“不！那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坚定我的决心。她的精神状态促使她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她要跟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勾搭吧，那是她的事……我要做的是良心要我做的事。”他自言自语，“良心要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赎罪。我要同她结婚，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结婚；我要跟她走，不论她

被流放到哪里。我这些决心绝不改变。”他固执地自言自语着，走出医院，向监狱大门大踏步走去。

他来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的看守通报典狱长，希望同玛丝洛娃见面。值班的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象朋友那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要消息：原来的上尉被免职了，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

“现在办事严格多了，严格得简直要命。”那看守说。“他就在这里，我这就去通报。”

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不一会儿就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这位新典狱长是个瘦骨棱棱的高个子，额骨突出，脸色阴沉，动作缓慢。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能同犯人在探监室里见面。”他眼皮不抬说。

“我要她在呈交皇上的状子上签个字。”

“可以交给我。”

“我要求见一见这个犯人。以前一向允许我探望的。”

“那是以前的事了。”典狱长匆匆地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说，同时掏出皮夹子来。

“您让我看看。”典狱长说，仍旧没有看他的眼睛，同时伸出瘦长白净、食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从聂赫留朵夫手里接过文件，慢吞吞地看了一遍。“您请到办公室来。”他说。

这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坐到办公桌后面，翻阅着桌上的文件，显然想在他们会面时留在这里。聂赫留朵



夫问他能不能再同政治犯薇拉见面，典狱长很干脆回答说：不行。

“政治犯不准探望。”他说着，又埋头看文件。

聂赫留朵夫摸摸口袋里藏着的那封给薇拉的信，觉得自己好象一个企图犯罪的人，被人揭穿了企图。

等玛丝洛娃走进办公室，典狱长没有抬起头来，他眼睛不看玛丝洛娃，也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可以谈了！”他说完继续埋头看文件。

玛丝洛娃又象从前那样穿着白上衣，围着白裙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见他脸色冰冷，气愤，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垂下眼睛一只手揉着上衣底边。她的窘态使聂赫留朵夫相信医院看门人的话是真的。

聂赫留朵夫很想象上次那样对待她，但他已不能象上次那样主动同她握手。此刻他对她反感极了。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呆板地说，眼睛并不看她，也不向她伸出手，“上诉被枢密院驳回了。”

“我早就料到了。”她音调古怪地说，仿佛在喘气。

要是从前，聂赫留朵夫准会问她怎么会料到的，但此刻他仅是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但这不仅没有使他心软，反而使他更加恼火。

典狱长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尽管聂赫留朵夫此刻对玛丝洛娃十分反感，但他还是觉得应该为这事向她表示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皇上递的状子可能有结果。我希望……”

“我不是在想这件事……”她泪汪汪的眼睛凄苦地斜睨着他，说。

“那您在想什么？”

“您去过医院了，他们大概向您谈到过我了……”

“哦，那是您的事。”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冷冷地说。

他自尊心受到触犯而产生的强烈反感原来已平息了，此刻她一提起医院，这种反感就变得更强烈了。“象这样一个有财有势的人，上流社会随便哪个姑娘都会觉得嫁给他就是幸福，他却情愿去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而她偏偏又迫不及待地去跟一个医士调情。”他恼怒地瞧着她，心里想。

“喏，您就在这状子上签个字。”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放在桌上。她用头巾角擦去眼泪，在桌旁坐下来，问他写在哪里，写什么。

他指点着她写什么，写在哪里。她坐在桌子旁边，左手理着右手的袖子。他站在她后面，默默地俯视着她那伏在桌上、不时因为忍住呜咽而颤动的弓起的脊背。在他的心里，善与恶，受屈辱的自尊心，对这个受苦女人的怜悯，斗争得很激烈。结果后者占了上风。

他记不起哪种感情首先产生的：是先从心底里怜悯她呢，还是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罪孽，自己的卑劣行径——他现在也正为这种事责怪她。总之，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罪，同时又很怜悯她。

她签上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裙子上擦擦，然后站起来，对他瞧了一眼。

“不管结果怎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的决心绝不动摇。”

聂赫留朵夫说。

他一想到他原谅了她，他对她就越发怜悯，越发疼爱。他很想安慰安慰她。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不论他们把您发配到哪里，我定会跟着您。”

“这可用不着。”她慌忙打断他的话，脸色顿时开朗起来。

“您想想，您路上还需要什么。”

“好象不需要什么了。谢谢您。”

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聂赫留朵夫不等他开口，就同玛丝洛娃告辞，走出监狱。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而平静的心情，觉得一切人都很可爱。不论玛丝洛娃的行为怎样，他对她的爱都不会改变。这种想法使他高兴，使他的精神升华到空前的高度。让她去同医士调情吧，那是她的事。他聂赫留朵夫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不过，聂赫留朵夫信以为真的即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而被逐出医院，其实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有一次奉女医士派遣，到走廊尽头药房里去取草药，在那里碰到那个满脸粉刺的高个子医士乌斯基诺夫。乌斯基诺夫一直跟她纠缠不休，她很讨厌他。这一次玛丝洛娃为了摆脱他，把他使劲推了一把，使他撞在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架上掉下来，砸碎了。

这时候，主任医师正好从走廊上经过，听见砸碎瓶子的声音，又看见玛丝洛娃脸面红耳赤跑出来，就生气地对她嚷道：

“喂，小娘们，你要是在这里跟人家搞鬼，就请你开路。

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去，从眼镜架上严厉地瞧着医士，说。

医士为自己辩白时陪着笑脸。主任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抬起头来，透过眼镜对他瞧瞧，就到病房里去了。当天他就要典狱长另派一个稳重些的女助手来接替玛丝洛娃。所谓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就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因同男人调情的罪名被逐出医院，这使她感到特别难堪，因为她早已讨厌跟男人发生什么关系，自从她同聂赫留朵夫重逢以后，就更加憎恶这种事。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粉刺的医士在内，根据她过去的身分和现在的处境，都认为有权侮辱她，却竟然遭到她的拒绝，都不禁感到惊奇。她却觉得极其委屈，不由得为自己的身世暗自流泪。这会儿，她从牢房里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猜想他一定已听到她的新罪名，想为自己辩白一番，说这事是冤枉的。但觉得他不会相信，只会更加怀疑，于是哽住喉咙，说不下去。

尽管玛丝洛娃仍然认为并竭力要让自己相信，正象第二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但其实她早已重新爱着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要她做的，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做。她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还到医院里做杂务工。她所以这样做，只因为这是他的愿望。每次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不肯接受这样的牺牲。这固然是由于她有一次高傲地对他说这话，不愿再改口，但主要却是由于她知道，同她结婚，他会遭到不幸。她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而一想到他瞧不起她，认为她还是原来那种人，而没有看到她精神上的变化，她又觉得十分委屈。他

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丑事。这个念头比她听到最后判决服苦役的消息还要使她伤心。

## 三十

玛丝洛娃可能随第一批犯人遣送出去，因此聂赫留朵夫积极做着动身前的准备。但要做的事太多，他觉得无论有多少时间都来不及。他现在的情况同以前正好相反。以前他要想出些事来做，而且永远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不过，尽管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他本人，那些事情本身却都很乏味。现在的事情都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他聂赫留朵夫，但这些事情却是有意義的，很吸引人，而且多得数不清。

不仅如此，以前别人为聂赫留朵夫办事总使他感到烦恼和不满；如今为别人做事却使他心情十分愉快。

聂赫留朵夫现在要做的事可分三类。他把事情这样凭他的古板作风分了类，并且据此把有关文件分别放在三个文件夹里。

第一类事是为了玛丝洛娃和对她的帮助。这方面主要就是为告御状奔走，争取支持，以及为西伯利亚之行做好准备。

第二类事是处理地产。在巴诺沃，农民已得到土地，由

他们缴付地租，作为农民的公益金。但为了使这件事在法律上生效，他必须立下契约和遗嘱，并且在上面签字。在庫茲明斯科耶，事情象他生前安排的一样，就是他得收地租，得规定交租期限，并且确定从这笔钱中提取多少作为生活费，留下多少给农民做福利。他还不知道西伯利亚之行需要花多少钱，因此这笔收入他还不肯全部放弃，只是把它减去了一半。

第三类事是帮助囚犯们，并且求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起初，他遇到向他求助的犯人，总是立刻为他们奔走，竭力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后来求助的人实在太多，他无法一一帮助他们，这样他就情不自禁地承担起第四类事来。这一类事他近来最感兴趣。

第四类事就是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刑事法庭这种奇怪的机关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必要存在？是怎么产生的？有了这种机关，也就产生了他同部分囚徒相识的监狱，即从彼得保罗要塞起到萨哈林岛止的种种监狱，而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有了这么一部莫名其妙的刑法正在那里受尽苦难。

聂赫留朵夫通过他同囚徒的私人关系，通过他同律师、监狱牧师和典狱长的谈话，以及对被监禁人的经历了解，他把囚徒，也就是所谓罪犯，归纳为五种人。

第一种是完全无罪的，是法庭错判的受害者。例如被诬告的纵火犯明肖夫，又如玛丝洛娃和其他人。这种人不很多，据神父估计，大约占百分之七，但他们的遭遇尤其引人同情。

第二种人是在狂怒、嫉妒、酗酒等特殊情况下做了什么事而被判刑的。那些审判他们的人，要是处在同样情况下，多半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这种人，据聂赫留朵夫估计，大概

超过全体罪犯的半数。

第三种人受惩罚是由于他们做了自认为极其平常甚至良好的事，但他们的行为，按照那些和他们持有不同观点的制定法律的人看来，就是犯罪。属于这一种的有贩卖私酒的，有走私的，有在地主和公家大树林里割草打柴的。还有盗窃成性的山民、不信教的和打劫教堂的也属于这一种。

第四种人成为罪犯，只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社会上的一般人。这些人包括教派信徒，为争取独立而造反的波兰人和契尔克斯人，也包括为反抗政府而被判刑的各种政治犯——社会主义者和罢工工人。这种人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据聂赫留朵夫估计，他们所占的百分比很大。

最后，第五种是这样一些人，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要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重得多。社会把他们抛弃，他们经常受到压迫和诱惑，以致头脑愚钝，就象那个偷旧地毯的小伙子和聂赫留朵夫在监狱内外看到的几百名罪犯那样。他们不断受到生活的压力，以致做出那些所谓犯罪的行为来。据聂赫留朵夫观察，有好多盗贼和凶手就属于这一种。近来他同其中的一部分人有过接触。至于那些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聂赫留朵夫通过深入了解，认为也可归到这一种。然而犯罪学新派却把他们称为“犯罪型”，认为社会上存在这种人，就是刑法和惩罚必不可少的主要证据。照聂赫留朵夫看来，社会对这些人所犯的罪，其实远远超过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不过，社会不是对他们本人犯了罪，而是以前对他们的父母和祖先犯了罪。

吸引聂赫留朵夫的注意的是这些人中的惯窃奥霍京。奥

霍京是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夜店里长大，活到三十岁也没有见过一个道德比警察更高尚的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在盗贼群中厮混，却有天赋的滑稽的才能，招人喜爱。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帮忙，同时却又嘲笑自己，嘲笑法官，嘲笑监狱，嘲笑一切法律——不但嘲笑刑法，而且嘲笑神的律法。另一个是相貌英俊的费多罗夫，他带领一伙匪徒劫掠一个年老的官吏，并把他打死。费多罗夫出身农民，他父亲的房屋被别人非法霸占，他自己后来当了兵，在军队里因为爱上军官的情妇而吃尽了苦头。他天生活泼热情，到处寻欢作乐。在他的心目中，天下没有一个人会克制欲望，及时享乐。他也从来不知道，人生在世除了享乐还有其他目标。聂赫留朵夫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人都禀赋优异，只是缺少教养，以致畸形发展，犹如植物无人照管就会疯长，长成畸形一样。他还见过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女人，他们麻木迟钝、表面残酷，使人望而生畏，但他怎么也看不出他们就是意大利犯罪学派所谓的“犯罪型”。他只觉得他讨厌他们，就象他讨厌监狱外面那些穿礼服、佩肩章的男人和全身饰满花边的女人一样。

为什么上述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坐牢，而另一些与他们一样的人却自由自在，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审判？这就是聂赫留朵夫所关心的第四类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想从书本上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他就把凡是同这问题有关的书都买来。他买了龙勃罗梭、嘉罗法洛、费利、李斯特、摩德斯莱、塔尔德的著作，用心阅读，但越读越感到失望。有些人研究学问，目的不是在学术方面做点什么事，例如写作、辩论、教书等等，而是在寻找一些简单



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其结果往往令人失望。聂赫留朵夫现在碰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学术给他解答了成千上万个同刑法有关的深奥问题，可就是没有解答他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他问：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把另一些人关押起来，加以虐待、鞭挞、流放、杀害，而他们自己其实跟被他们虐待、鞭挞、杀害的人毫无区别？他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胡作非为？回答他的却是各种各样的议论：人有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能不能用头盖骨测定法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犯罪型”？遗传在犯罪中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天生道德败坏的人？究竟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疯狂？什么是退化？什么是气质？气候、食物、愚昧、摹仿、催眠、情欲对犯罪有什么影响？什么是社会？社会有哪些责任？等等，等等。

这些议论使聂赫留朵夫想起一个放学回家的男孩曾这样回答他的问题。聂赫留朵夫问他有没有学会拼法。男孩回答说：“学会了。”“好，那么你拼一下‘爪子’这个词。”“什么‘爪子’？是狗爪子吗？”那个男孩狡猾地回答他。在那些学术著作里，聂赫留朵夫为他的主要问题所找到的，也就是这种反问式的答案。

那些书里有许多聪明、深奥、有趣的见解，但就是没有回答他的主要问题：凭什么有些人可以惩罚另一些人？不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所有的议论都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替惩罚作辩解，认为不能缺少惩罚，这是天经地义。聂赫留朵夫看了很多书，但断断续续，这样他就把找不到答案归咎于钻研不足，希望答案以后能寻找到。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还不能肯定近来越来越频繁地萦绕在头脑里的那个答案。

## 三十一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预定七月五日出生。聂赫留朵夫准备在那天跟她一起走。动身前一天，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和姐夫一起进城来，同他再见一面。

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比弟弟大十岁。他的成长多少受到她的影响。他小时候，姐姐很喜欢他。后来，在她快出嫁时，他们特别谈得来，简直象同龄人那样默契，虽然她已是个二十五岁的姑娘，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当时她曾爱上弟弟的朋友尼科连卡，后来尼科连卡死了。姐弟俩都很爱尼科连卡，因为他们都具备四海一家的博爱精神。

后来他们俩都堕落了：他到军队里服务，沾染了不良习气；她则嫁了人，但她只在肉体上爱丈夫，而她的丈夫对她同弟弟之间以前认为最神圣最宝贵的一切不仅不喜爱，甚至不理解他们的感情，还把她原来作为生活目标的追求道德完善和为人们服务的志向，说成纯属虚荣心作怪，想在大家面前出风头。

娜塔丽雅的丈夫拉戈任斯基没有名望，也没有产业，但是个头脑灵活的官场老手。周旋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他随机应变，左右逢源，尽量利用此时此地能给他的生活带来

最大利益的那一派。不过，他在司法界飞黄腾达，步步高升，还主要是依靠某种能博得女人欢心的特殊本领。他在国外认识聂赫留朵夫一家时，年纪已经不很轻了。他使年纪也不算太轻的姑娘娜塔丽雅爱上他，并违背她母亲的心意同她结了婚。她母亲认为这门亲事不是门当户对。聂赫留朵夫也憎恨姐夫，虽然他竭力克制这种情绪，避免想到这一点。聂赫留朵夫所以对姐夫反感，是因为姐夫感情庸俗，目光短浅而又刚愎自用。不过，他对他反感的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姐姐居然会那么热烈、自私，从肉体上爱上这个精神贫乏的人，并且为了讨好他而摒弃自己的一切美德。聂赫留朵夫每次想到，娜塔丽雅就是这个浑身汗毛、秃头发亮且刚愎自用的人的妻子，心里就很痛苦。他甚至对这个人的孩子都感到按捺不住的嫌恶。每次听说娜塔丽雅要生孩子，他就会产生一种痛惜的感情，仿佛她从这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身上又传染到了什么脏东西。

拉戈任斯基夫妇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这次没有带来。他们在一家最好的旅馆里开了一套最好的房间后，娜塔丽雅立刻乘车到娘家去，但在那里没有碰到弟弟。阿格拉斐娜告诉她，弟弟已搬到一个带有家具的公寓里。娜塔丽雅又到那里去找他。在光线昏暗、恶臭难闻、白天也点着灯的走廊里，一个肮脏的茶房告诉她，公爵不在家。

娜塔丽雅想到弟弟房间里，给他留一张字条。茶房就领她去。

娜塔丽雅走进聂赫留朵夫的两个小房间，仔细观看了一下。处处都看到她所熟悉的那种整齐清洁，但同时也发觉房

间里的陈设简朴得使她吃惊。她看见写字台上放着那个镶有铜狗的吸墨纸床，还有几个文件夹、一些纸张和文具、几本《刑法典》、一本英文的亨利·乔治的著作和一本法文的塔尔德的著作，书里还夹着一把她所熟悉的弯曲大象牙刀。

她在桌子旁写了一张字条，要他务必到她那里去一次，而且今天就去。又对眼前的景象摇了摇头，就回旅馆了。

娜塔丽雅现在对弟弟的两件事很关心：一件是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是她在她居住的城里听到的，那里对此事议论纷纷；另一件是他要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事大家也知道了，而且被许多人看作危险的政治行为。他要同卡秋莎结婚，娜塔丽雅心里一方面有点高兴。她欣赏这种果断行为，因为又看到了出嫁前他们姐弟俩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又想到弟弟竟然要同这样一个下贱的女人结婚，则感到不寒而栗。相比之下后面这种感情要强烈得多，于是她决定竭力去影响他，劝阻他，虽然知道这是极其困难的。

至于他打算把土地交给农民，那件事她并不怎么关心。但丈夫对此却十分愤慨，要她劝阻弟弟。拉戈任斯基说，这种行为是轻举妄动，自我欣赏。它没有任何意义，只能被认为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把土地交给农民，租金也归农民使用，这究竟有什么意思？”他说，“要是他真想这样做，他尽可以通过农民银行把土地卖出去。这样还说得过去。总之，这种行为近乎精神失常。”拉戈任斯基说，并且心里已经在考虑聂赫留朵夫需要有个监护人。他要妻子务必同弟弟认真谈谈他这个古怪的意图。

## 三十二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有姐姐的字条，就立刻坐车去找她。这时已是黄昏。拉戈任斯基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娜塔丽雅独自迎接弟弟。她穿一件小腰身黑绸连衣裙，胸前扎着一个红花结，蓬蓬松松的乌黑头发梳成此时时髦的款式。显然她竭力打扮得年轻漂亮，是要讨年龄相同的丈夫的欢心。一看见弟弟，她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向他走去，绸连衣裙的下摆发出沙沙的响声。他们接吻，笑咪咪地对视了一下，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姿态神秘而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感情真挚。接着他们便开始交谈，谈话就不那么真挚了。自从母亲去世以后，还是第一次见面。

“你胖了，显得更年轻了。”弟弟说。

姐姐高兴得嘴唇都皱起来。

“你可瘦了。”

“那么，姐夫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他在休息。他一夜没睡。”

他们有许多知心话要说，却一句也没有说，倒是他们的眼神说出了他们嘴里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去你那里了。”

“是的，我知道。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房子太大，我住在那里觉得寂寞、孤独。如今我什么也不需要了，你把东西统统拿去吧，就是那些家具什么的。”

“是的，阿格拉斐娜对我说了，我到那里去过，那太感谢你了。不过……”

这当儿，旅馆茶房送来一套银茶具。

茶房摆茶具的时候，姐弟俩没有说话。娜塔丽雅坐到茶几后面的圈椅上，默默地斟茶。聂赫留朵夫也默默不语。

“哦，我说，德米特里，我都了解了。”娜塔丽雅瞟了他一眼，断然说。

“是吗？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不过，她经历了那种生活，你还能指望她改过自新吗？”娜塔丽雅说。

他挺直身子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双臂没有什么地方可放，留神地听她说话，竭力好好领会她的意思，好好回答她的话。他最近一次同玛丝洛娃见面，情绪很好，心里仍充满宁静的快乐，看见什么人都很高兴。

“我不要她改过自新，我只要我自己重新做人。”他回答说。

娜塔丽雅叹了一口气。

“不结婚也有别的办法。”

“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说，这个办法可以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我到了那里就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

“我认为，你不可能幸福。”娜塔丽雅说。

“我并不要个人的幸福。”

“那当然，但她要是有心肠的话，也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指望幸福。”

“她本来就没有想。”

“我明白，可是生活……”

“生活如何？”

“生活要求的是别的东西。”

“生活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我们把自己应做的做好。”聂赫留朵夫说，同时瞧着她那张还很好看、只是眼角和嘴边已出现细纹的脸。

“我不懂。”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可怜的亲爱的姐姐！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聂赫留朵夫记起娜塔丽雅出嫁前的样子想。无数童年的回忆交织在心头，唤起了他对她的感情亲切。

这时候，拉戈任斯基象平时那样高高地昂起头，挺起宽阔的胸膛，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他脸上浮着微笑，眼镜、秃头和黑胡子都闪闪发亮。

“您好，您好！”他装腔作势地说。

（虽然拉戈任斯基婚后最初一段时期，他们竭力不拘礼节，相互用“你”称呼，但后来还是恢复用“您”。）

他们握了手。拉戈任斯基轻快地在一把圈椅上坐下。

“我不妨碍你们谈话吗？”

“不，我说话、做事，从来没有见不得人的。”

聂赫留朵夫一看见这张脸，一看见那双毛茸茸的手，一听见那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口气，就对姐夫的情意顿时消失了。

“是啊，我们在谈他的打算。”娜塔丽雅说。“给你倒一杯吗？”她拿起茶壶，添上说。

“好的。那么究竟有什么计划呢？”

“我打算跟一批犯人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我认为我对她犯了罪。”聂赫留朵夫说。

“我听说您不仅仅打算陪送她，还有其它打算。”

“是的，只要她愿意，我还打算同她结婚。”

“原来如此！要是您不嫌烦的话，您给我解释解释您的动机。您的动机我不了解。”

“我的动机就是这个女人……她堕落的第一步……”聂赫留朵夫想不出恰当的措词，开始生自己的气了。“我的动机就是，我犯了罪，她为此要受到惩罚。”

“既然她受到惩罚，那就不会没有罪。”

“她完全没有罪。”

聂赫留朵夫情绪激动地把这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是的，这是审判长疏忽了，使得陪审员在答复时考虑不周。不过，这种情况可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

“上诉已被枢密院驳回了。”

“枢密院驳回了，这就说明上诉理由不足。”拉戈任斯基说，显然认为人云亦云地法庭口头陈述的结果就是真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情的是非曲直。要是法庭审判确实有错误，那就得上告皇上。”

“已经上告了，但毫无成功的希望。他们会向司法部查询，司法部会向枢密院查询，枢密院会重述它的裁定。这样，无罪的人还是照样将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向枢密院查问。”拉戈任斯基倨傲地笑着说，“司法部会直接向法庭吊卷，如果发现错误，就会加以纠正；第二，无罪的人从来不会受到惩罚，即使有，也是极少见的例外。凡是受惩罚的，总是有罪的。”拉戈任斯基不慌不忙，得意洋洋地笑着说。

“可我相信事实正好相反。”聂赫留朵夫对姐夫抱着反感说，“我相信，被法庭判刑的人，大部分是无罪的。”

“这话怎么讲？”

“我说的无罪就是没有任何罪。例如这个被控犯毒害人命罪的女人根本没有罪；还有我最近认识一个农民，被控犯杀人罪，其实他没有杀过人，什么罪也没有；还有母子两人被控犯纵火罪，其实那场火是主人自己放的，他们却差一点被定罪。”

“是的，审判错误一向是有的，将来也还会有，这一点不用说。人类的机关不可能十全十美。”

“再说，还有大量犯人并没有罪，只因为他们在某种环境成长，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犯罪。”

“对不起，您这话可没有道理。做贼的个个都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不应该偷窃，偷窃是不道德的。”拉戈任斯基说，又露出那种若无其事、自命不凡和略带轻蔑的微笑，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不，他们不知道。人家对他们说：别偷东西，可是他们明白，工厂老板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盗窃他们的劳动，而政府官员用税收的方式不断地盗窃他们的财物。”

“这是无政府主义理论。”拉戈任斯基平静地说，对内弟

的话毅然下了断语。

“我不知道什么主义，但我说的都是事实。”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他们知道，政府在盗窃他们的东西；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地主也在盗窃他们的东西，掠夺了应该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后来，他们仅在被盗窃的土地上捡了一些树枝当柴烧，我们就把他们关进牢里，硬说他们是贼。其实他们明白，做贼的不是他们而是从他们手里盗窃土地的人，因此，让被盗窃的东西物归原主，是他们对家庭应尽的责任。”

“您的话我不明白，即使明白，也不能同意。土地必须成为私有财产不可。要是您把土地分给大家。”拉戈任斯基说，心里断定聂赫留朵夫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平分全部土地，而平分土地是很愚蠢的，他可以轻易驳倒这种理论，“要是您今天把土地平分给大家，明天它又会转到勤劳能干的人手里。”

“谁也不打算把土地平分，但土地不应该成为谁的私有财产，不应该成为买卖或者租佃的对象。”

“私有财产权是天赋的人类权利。没有私有财产权，耕种土地就会毫无兴致。一旦消灭私有财产权，我们就会回到蛮荒时代。”拉戈任斯基振振有词地说，重复着维护私有财产权的陈词滥调。他认为这种理论是驳不倒的，即土地的占有欲就是土地必须私有的标志。

“正好相反，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土地才不会象现在这样荒废。现在地主霸占土地，就象狗占马槽一样，自己不会种，又不让会种的人种。”

“您听我说，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这简直是发病！难道

我们今天能消灭土地私有制吗？我知道这是您长期以来念念不忘的一个问题。但恕我直说……”拉戈任斯基说到这里脸色发白，声音发抖，显然这问题打中了他的要害。“我要奉劝您在着手处理这问题以前，先好好考虑一番。”

“您说的是我的个人问题吗？”

“是的。我认为我们这些有一定地位的人，应该承担由这种地位产生的责任，应该维护我们的生活，那是我们从祖先手里继承下来，并且必须传给子孙后代的。”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拉戈任斯基打断他的话，继续说，“我说这话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的孩子们。我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足够我们过了。而且我认为我的孩子们将来也不会过穷日子。因此，老实说，我反对您这种考虑不周的行为，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是从原则出发我不能同意您的见解。我劝您多考虑考虑，读点书……”

“哦，我的事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我自己知道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聂赫留朵夫说着，脸色发白，同时觉得双手发凉，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停下话头，喝起茶来。

## 三十三

“哦，孩子们都不错吧？”聂赫留朵夫稍稍平静下来，问姐姐说。

姐姐讲起她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跟奶奶住在一起。她看到弟弟跟丈夫结束争论，很高兴，就讲起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游戏，就象她弟弟小时候玩两个布娃娃——一个黑人，一个法国女人——那样。

“你还记得？”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说。

“你看，他们的玩法跟你从前一模一样。”

弟弟跟丈夫结束了不愉快的谈话。使娜塔丽雅感到放心，但她不愿当着丈夫的面讲只有弟弟才听得懂的话。为了让大家都参予谈话，她就讲起那件刚传到此地的彼得堡新闻：卡敏斯基决斗身亡，他母亲失去这个独子悲痛极了。

拉戈任斯基表示不赞成把决斗致死排除在普通刑事罪之外。

他这种说法受到聂赫留朵夫的批驳。于是原来的分歧重又引起激烈的争论。两人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但各人都固执己见，谴责对方的想法。

拉戈任斯基觉得，聂赫留朵夫谴责他，并蔑视他的全部

工作。他想对聂赫留朵夫指出，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聂赫留朵夫呢，姑且不谈姐夫干预他土地方面的事而使他恼火（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作为他财产的继承人，是有权干预他的事的），使他感到愤恨的是，那些显然荒谬和罪恶的事，这个目光短浅的人却自认为是正确和合法的。姐夫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激怒了聂赫留朵夫。

“那么，这类事法院会怎么处理呢？”聂赫留朵夫问。

“法院会判处决斗中的一方服苦役，就象普通的杀人犯那样。”

聂赫留朵夫又双手发凉，他情绪激动地讲起来。

“嘿，那又怎么样？”他问。

“那就伸张了正义。”

“这么说，法院活动的目的就是伸张正义罗。”聂赫留朵夫说。

“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维护阶级利益。照我看来，法院只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现存的有利于我们阶级的制度罢了。”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拉戈任斯基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一般认为法院是另有使命的。”

“我看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实际并非如此。法院的唯一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它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第一，说政治犯被判刑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一般人，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是社会渣滓，跟您认为品德低于一般人的犯罪型同样堕落，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可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的品德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不知要高多少倍。那些教派信徒个个都品德高尚，意志坚强……”

拉戈任斯基有个习惯，不许别人在他说话的时候打岔，因此他不听聂赫留朵夫说，只管自己讲下去。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说法院的宗旨在于维持现存制度，这种看法我仍不能同意。法院有法院的宗旨，那就是要么改造……”

“关在监狱里改造是很好的事情。”聂赫留朵夫插嘴说。

“……要么去掉威胁社会生存的道德败坏分子和兽性难驯的家伙。”拉戈任斯基固执地继续说。

“问题就在于现在的社会既不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做到那一点。现在的社会是无能为力的。”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拉戈任斯基勉强才装出笑容说。

“我想说的是，合理的惩罚其实只有两种：那就是古代常用的体罚和死刑，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些刑罚用得越来越少了。”聂赫留朵夫说。

“哦，这话从您嘴里听到真是新鲜得很。”

“是啊，把一个人痛打一顿，使他以后不再做挨打的事，这有一定道理的；砍掉一个对社会有害的危险分子的脑袋，这也完全有道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把一个游

手好闲、不学好而堕落的人关进牢里，使他衣食不愁而又无所事事，并且又同极端堕落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为了一点点事情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解到伊尔库次克省，或者从库尔斯克省押解到别的地方，而国家要在每人头上花费五百多卢布，这又有什么意思？……”

“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公费旅行无疑使他们害怕。要是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可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了。”

“这种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一辈子关在那里，他们会被放出来。结果就正好相反，他们在那种地方会变得更加罪恶和堕落，也就是说变得更加危险。”

“您是说，这种惩治制度必须加以改进。”

“改进是不可能的。改良监狱花费的钱会远远超过国民教育的经费。这样就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不过，即使惩治制度有缺点，也不能因此就废除法院。”拉戈任斯基又听不进去内弟的话，继续讲他自己的观点。

“那些缺点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嗓门说。

“那怎么办？把人杀掉？还是象一位政府要人所提议的那样，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拉戈任斯基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是的，这样做残酷是残酷，但还有点效果。可是现在的办法呢，既残酷，又没有效果，而且极其愚蠢，让人不能理解，头脑健全的人怎么能参与象刑事法庭那样荒谬而残酷的工作。”

“这工作我参加了。”拉戈任斯基脸色发白说。

“那是您的事。但我不能理解。”

“我看您不能理解的事多着呢。”拉戈任斯基声音颤抖地说。

“我曾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是怎样千方百计硬把一个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只会引起一切头脑健全的人的同情。我还知道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竟然认为读福音书是触犯刑法。总之，法院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我要是这样想，就干不了这一行了。”拉戈任斯基说着站起来。

聂赫留朵夫忽然看见姐夫的眼镜底下有一种古怪的亮光。“那会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想。真的，这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口，掏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动手擦擦眼镜，然后又擦擦眼睛。接着回到沙发旁，点着一支雪茄，不再说什么。聂赫留朵夫看到他把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个地步，心里感到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于是他窘态毕露地同他们告了别，回家去了。

“我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至少他没有话能反驳我。但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他说话。我能这样被奇怪的情感所支配，能这样得罪姐夫，弄得可怜的娜塔丽雅这样伤心，可见我这人改变得很少。”他想。



## 三十四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于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聂赫留朵夫想等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跟他们一起到车站，就准备在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在收拾行李和文件时，看到自己的日记，就停下来重新阅读最近写的几段话，“卡秋莎不肯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不敢相信，但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但我觉得她在复活。”接下去还有这样一段话：“遇到一件很痛苦又很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里不规矩。我顿时感到十分痛苦。没想到我会这么痛苦。我跟她说话感到又厌恶又憎恨，但我立刻想到自己，我痛恨她的那种行为我自己做过多少次，直到现在还有做这种事的念头。我顿时讨厌我自己，同时又可怜她。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舒畅了。只要我们能经常及时找到自己的良知，我们就会变得善良些。”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写道：“去娜塔丽雅家。由于自满而变得不善，凶恶，至今心里沉重。可是有什么办法？明天起就要开始过新生活了。别了，过去，永别了。百感交集，但一个头绪也理不出。”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悔不该跟

姐夫吵架。

“就这样走掉可不行。”他想，“应该去向他们赔个不是才对。”

但他看了看表，发觉已经来不及了。他得赶紧动身，才不会错过那批犯人离开监狱的时间。聂赫留朵夫把行李匆匆收拾好，打发看门人和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他随聂赫留朵夫一起出门，——把行李直接送到车站，自己雇了一辆最先遇到的出租马车，直奔监狱。流放犯的那列火车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邮车要早开两小时，因此他已把公寓房钱付清，打算不再回来。

正是炎热的七月天气。街上的石头、房屋和铁皮屋顶经过七月的夜晚还没有凉下来，又把余热散发到闷热的空气里。空中没有风，即使偶尔起一阵风，也只会带来充满灰尘和油漆味的又脏又热的空气。街上行人不多，少数行人也都竭力在房屋的阴影里行走。只有皮肤晒得黑黑的修路农民坐在街道中央，脚上穿着树皮鞋，用铁锤把石子砸到热砂里。还有一些脸色阴沉的警察，身穿本色布制服，挂着橘黄色武装带，没精打采地不停挪动两脚站在街心。还有一些公共马车丁丁当当地在街上川流不息，车厢向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头上戴着白布头罩，两只耳朵从布罩孔里露出来。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监狱，那批犯人还没有出来。在监狱里，从四点钟起就开始移交和验收犯人。这工作很紧张，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批流放犯有六百二十三名男犯和六十四名女犯，都得按名册一一核对，把有病的和体弱的挑出来，统

统移交给押解队。新来的典狱长、两名副典狱长、一个医师、一个医士、一个押解官和一个文书，都坐在院子里靠墙的阴凉处的一张桌子周围，桌上放着公文簿册和办公用具。他们逐一报出犯人名字，一个个进行审查，问话，登记。

现在桌子已有一半晒到阳光了。这里很热，没有风，站在周围的犯人又不断呼出热气，弄得更加闷热难受。

“怎么搞的，简直没完没了！”押解官又高又胖，脸色红润，肩膀耸起，胳膊很短，一面不住地吸烟，从小胡子里吐出一团团烟雾，一面说。“可把人累死了。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人？还有很多吗？”

文书把各册查了查。

“还有二十四个男的和几个女的。”

“喂，怎么不动了，过来！”押解官对那些挤在一起还没有验过身分的犯人吆喝道。

犯人们已站了三个多小时队，头上太阳直射，又没有地方遮蔽。

这项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大门口照例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还有二十辆左右的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流放犯的行李和体弱的犯人。街道拐角处站着一批犯人的亲友，在等待犯人出来再见一面，要是可能的话，再说几句话，递给他们一点东西。聂赫留朵夫就挤在这群人中间。

他在这儿站了将近一小时。门里终于响起了铁镣的哐啷声、杂乱的脚步声、长官的吆喝声、咳嗽声和人群低低的谈话声。这样持续了五分钟光景。在这段时间里，几个看守在小门里进进出出。口令最后传出来。

大门隆隆地打开来，铁镣的哐啷声更响了。一大批穿白军服掮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在大门外整齐地排成一个圆圈，显然这是他们干惯的事情。等他们站好队，又传出了一声口令。男犯人被剃光头发，头上戴着象薄饼一般的囚帽，背上背着袋子，两人一排，艰难地一步步拖着脚镣走出来。他们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袋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苦役犯是先出来的，都穿着灰色的长裤和囚袍，囚袍背上缝着一块苦役犯标志的方布。他们当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瘦的，有胖的，有白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留小胡子的，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俄罗斯人，有鞑靼人，有犹太人，个个都哐啷啷地拖着铁镣，拼命挥动一条胳膊，仿佛急着要走到远处去，但走了十步光景就停住了，听话地四人一排，按顺序站好。随后，大门里又涌出一批剃光头的男犯。他们也穿着囚服，但没有戴脚镣，只是每两人用一副手铐锁在一起。这是农民……他们同样迅速地走出来，站住，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是各村社判处的流放犯，再后面是女犯，也按同样的次序，先是穿灰色囚袍、系灰色头巾的女苦役犯，然后是女流放犯，以及穿城里服装或者乡下服装自愿跟随丈夫一起流放的女人。有几个女犯手里抱着娃娃，用囚袍的前襟包着。

还有一些孩子是跟女犯一起走的，包括男孩和女孩。这些孩子象马群里的小马一样，夹在女犯中间。男犯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只偶尔咳嗽几声，简短地说一两句话。但女犯的队伍里却话声不断。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看见了玛丝洛娃出来，但后来在人群中又找不到她。他只看见一群灰色的生物，

丧失人类的特征，而那些排在男人后面、带着孩子和袋子的女犯，更是丧失了女性的特征。

尽管在监狱的围墙里已对全体人犯进行了清点，押解兵又重新点了一遍人数，核对了一下。这次清点花的时间特别多，因为有些犯人走来走去，影响了清点工作。押解兵破口大骂，把犯人推来推去。犯人听凭摆布，但怒形于色。押解兵重新点了一遍。等到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又发出一声口令，人群顿时骚乱起来。那些身体虚弱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争先恐后地往大车那边跑去，先把袋子放到车里，然后爬上车去。接连爬上车去就座的有抱着啼哭的奶娃娃的女人，兴高采烈地抢着座位的孩子和脸色阴郁、神情沮丧的男犯。

有几个男犯脱下帽子，走到押解官跟前，请求他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求坐车。聂赫留朵夫看见押解官一言不发，也不看请求的人，只顾自己吸烟，后来忽然对那些犯人挥动他的短胳膊，那些犯人怕挨打，慌忙缩起光头，拔脚跑开。

“我要叫你尝尝当贵族老爷的滋味，好让你一辈子记住！走着去！”押解官嚷道。

只有一个戴脚镣的颤巍巍高个子老头得到押解官的准许。聂赫留朵夫看见他脱下薄饼般的囚帽，画了个十字，向大车走去。可是他那衰老的腿拖着锁链，爬了好久都爬不上车。幸亏车上有个女人抓住他的一只手，总算把他拉上去了。

等那几辆大车都装满袋子，被允许乘车的人在袋子上坐好，押解官才摘下军帽，用手绢擦擦前额、秃头和又红又粗的脖子，然后画了个十字。

“全体，开步走！”他喊着口令。

士兵们肩上的枪铿锵作响。犯人们脱下帽子，有几个用左手画着十字。送行的人大声叫嚷着，犯人们也大声叫嚷着回答。女人中间有的号啕大哭。整个队伍就在穿白军服的士兵包围下移动起来，脚上的锁链扬起了阵阵尘土。士兵带着头，接着的是戴脚镣的犯人，四人一排，再后是流放犯，然后是村社农民，每两个人铐在一起，然后是女人。最后是装着行李和身体衰弱的人的大车，其中一辆车上有一个女人，裹紧衣服，不住地尖叫和号哭。

## 三十五

队伍很长，前头的人已经走得看不见了，后面装载行李和老弱病残的大车才刚刚起动。等大车一起动，聂赫留朵夫就坐上马车，让车夫跟上前面的队伍，看看在男犯中间有没有熟人，并在女犯中寻找玛丝洛娃，问问她有没有收到送去的东西。天气更热了，一丝风也没有，上千只脚扬起的灰尘，一直飘浮在街心走着的犯人们头上。犯人们走得很快，由于聂赫留朵夫的马车驾的不是快马，费了好大工夫才赶到队伍前头。一排又一排模样古怪的可怕生物，迈动上千只穿着同样鞋袜的脚，合着步伐摆动空手，似乎在给自己鼓气。他们

人数那么多，模样那么单调，又处在那么古怪的特殊气氛下，以致聂赫留朵夫觉得，他们仿佛不是人，而是一种可怕的特殊生物。直到他在苦役犯中认出凶手费多罗夫，在流放犯中认出滑稽家伙奥霍京和一个求他帮过忙的流浪汉，才改变了这种印象。犯人几乎个个回过头来，斜视着那辆赶上他们的轻便马车和车上那个不断打量他们的老爷。费多罗夫扬了扬头，表示他认识聂赫留朵夫。奥霍京也挤了挤眼。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点头，认为这是犯禁的。聂赫留朵夫也走到女犯旁边，立刻认出了玛丝洛娃。她在女犯的第二排。这一排边上走着一个女犯，红脸庞，黑眼睛，短腿，模样难看，把囚袍前摆掖在腰里，她就是俏娘们；她旁边是个孕妇，勉强拖着两腿走着；第三个就是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肩上扛着袋子，眼睛瞧着前方，脸色镇定而坚毅；第四个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穿一件短袍，象农妇那样扎着头巾，步伐矫健，她就是费多霞。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向女犯队伍走去，想问问玛丝洛娃有没有收到东西，她身体怎样，可是在队伍这边走着的一个押解军士一发现有人接近队伍，立刻赶过来。

“不行，老爷，接近队伍是不允许的。”他走过来，大声说。

军士走到跟前，军士认出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里人人都认识聂赫留朵夫），就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在聂赫留朵夫身边站住说：

“现在不行。到火车站就可以了，这儿是不允许的。”“别掉队，快走！”他又对犯人们吆喝道。接着不顾天气炎热，抖擞精神，迈着穿漂亮新皮靴的脚，快步跑回原来的位子。

聂赫留朵夫回到人行道上，吩咐车夫赶着马车跟在他后面，自己就和队伍并排走去。队伍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人们注意的目标，大家看到它又是同情又是恐惧。乘车路过的人都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目送着犯人们，直到看不见为止。过路的行人都站住，又惊又惧地瞧着这可怕的景象。有些人走上前去，施舍一点钱，押解兵就把钱收下。有些人则象中了催眠术一般，跟着队伍走去，但走了一阵又站住，摇摇头，只用眼睛目送着队伍。人们纷纷从房子里跑出来，互相招呼着，也有人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他们都呆呆地望着这支可怕的队伍，默不作声。在一处十字路口，一辆豪华马车被队伍挡住了。马车驭座上坐着一个满脸油光、屁股肥大的车夫，身穿一件背上有两排钮扣的号衣。马车后座上坐着一对夫妻：妻子消瘦，苍白，戴一顶浅色帽子，打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丈夫戴一顶高礼帽，穿一件讲究的浅色大衣。前座上，两个孩子面对他们坐着：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娇嫩得象朵小花，披着一头浅色头发，也打着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八岁的男孩脖子细长，锁骨突出，戴一顶水手帽，托着两条长飘带。做父亲的怒气冲冲地责备车夫，怪他没有抢在队伍前面及时穿过马路；做母亲的也嫌恶地眯细眼睛，皱起眉头，把绸阳伞放得低低的遮住脸，以挡住阳光和灰尘。大屁股的车夫听着主人不公正的责备，皱起眉头，面带怒色，因为走这条路，正好是主人吩咐的。他费力地勒住那几匹笼头底下的汗光闪闪、一个劲儿往前冲的黑马。

警察一心一意想为豪华马车的主人效劳，要把犯人拦住，放马车过去，但他发觉这支队伍里有一种阴森肃穆的气氛，不



能破坏，即使为了这样一位阔老爷也不能破例。于是只好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表示他对财富的尊重，然后严厉地瞅着犯人，仿佛决心保护车上的贵客，不让犯人们侵犯。因此这辆豪华的马车也不得不等整个队伍走完，直到最后一辆装载行李及坐在行李上的女犯的大车过去，才继续赶路。在那辆大车上，那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刚安静下来，一看到这辆豪华的马车，就又尖叫和号哭起来。直到这时，车夫才轻轻抖动一下缰绳，那几匹黑鬃骏马就在马路上迈开步子，拉动那辆微微晃动的橡皮轮马车，得得地往别墅跑去，把丈夫、妻子、女儿和脖子细长、锁骨突出的男孩一起送到那里去消夏享乐。

做父亲的也好，做母亲的也好，都没有向女孩子或者男孩子解释，他们看见的景象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两个孩子只好自己来解答这问题。

女孩子察看父母的脸色，这样来解答问题：这批人同她的父母和亲友截然不同，他们都是坏人，因此就该这样对待他们。就因为这个缘故，女孩子只觉得害怕，直到那些人看不见了，她才放下心来。

不过，脖子细长的男孩一直盯住犯人的队伍，眼睛一眨也不眨。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与女孩不同。他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坚决相信他们也是人，跟他自己，跟所有的人一样，因此一定有人欺侮他们，对他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他怜悯他们。也害怕这些戴着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同时也害怕那些硬要他们戴上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男孩的嘴唇才撅得越来越高，并好容易忍住眼泪，因为他认

为在这种场合哭是丢脸的。

##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象犯人们一样快步向前走去。他只穿一件薄大衣，但还是热得受不了，主要是因为街上尘烟飞扬，空气炎热，让人闷得难以喘过气来。他走了半里路光景，就坐上马车往前走，可是坐马车走在街心，让他觉得更热。他竭力回想昨天同姐夫的谈话，但这事此刻已不象早晨那样使他不安了。这事已被囚犯们走出监狱和列队出发的景象所冲淡。更主要是天气实在热得厉害。在矮墙旁边的树荫下，有个卖冰淇淋小贩蹲在地上，他的面前站着两个中学学生。其中一个孩子正舔着牛角小匙，吃得津津有味；另一个孩子则等待小贩把黄糊糊的东西盛满玻璃杯。

“这儿什么地方可以喝点东西解解渴？”聂赫留朵夫感到口渴得厉害，很想喝点什么，就问车夫。

“有一家好饭店在这。”车夫说着，赶着马车拐过街角，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家挂有大招牌的饭店门口。

肥头胖耳的掌柜只穿一件衬衫，坐在柜台里。几个堂倌穿着脏得发黑的白工作服，因为没有顾客，都散坐在桌子旁。这当儿看到这位不同寻常的客人，都露出好奇的神色，赶紧

迎上前来伺候。聂赫留朵夫要了一瓶矿泉水，在离窗较远的地方挨着一张铺着肮脏桌布的小桌坐下。

另一张桌旁坐着两个人，桌上放着茶具和一个白色玻璃瓶。他们擦着额上的汗，和颜悦色地算着帐。其中一个皮肤很黑，头顶光秃，后脑壳上留着一圈黑发，跟拉戈任斯基一样。这个景象使聂赫留朵夫又想起昨天跟姐夫的谈话，他很想动身之前跟姐夫和姐姐再见一面。“恐怕来不及了。”他想。“还是写一封信吧。”他问堂倌要来了信纸、信封和邮票，一面喝着泡沫翻滚的清凉矿泉水，一面考虑该写些什么。可是他脑子里千头万绪，信怎么也写不好。

“亲爱的娜塔丽雅！昨天跟姐夫的谈话给我留下了痛苦的印象，我不能一走了事……”他开了个头。“接下去写些什么？要求他原谅我昨天的话吗？可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呀。他会以为我放弃原来的看法了。再说他这是在干涉我的私事……不，我不能这样写。”聂赫留朵夫又感到对这个同他格格不入、自以为是的人的厌恶，把那封没有写成的信放进口袋里，付清帐，来到街上，坐车去追赶那批犯人。

天气更热了。墙壁和石头仿佛都在冒热气。光脚走在滚烫的石子路上一定象火烧火燎。聂赫留朵夫的光手接触到马车上过漆的挡泥板，就象被火烫着似的。

马没精打采地在街上跑着，蹄子在尘土飞扬的坎坷路上发出均匀的得得声。车夫不住地打着盹儿。聂赫留朵夫坐在车上，眼睛冷冷地瞧着前方，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在一条倾斜的街上，一座大厦的门口聚集着一群人，还站着一个持枪的押解兵。聂赫留朵夫吩咐马车停下来。

“什么事啊？”他问扫院子的人。

“有个犯人出了事。”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走到人群跟前。在靠近人行道的坎坷倾斜的路面上，头朝坡下躺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犯。这犯人肩膀宽阔，留着棕红色大胡子，红脸膛，扁鼻子，穿着灰色囚袍和灰色囚裤。他仰面朝天地躺着，伸开两只雀斑累累的手，手心朝下。他睁着两只呆滞的充血眼睛，望着天空，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隔很长一会儿他那高大的胸脯均匀地起伏一下。他的身旁站着一个皱眉头的警察、一个叫卖的小贩，一个邮差、一个店员、一个打阳伞的老太婆、一个手提空篮的男孩。

“他们的身体在牢里关得虚了，虚透了，而今又把他们带到这么毒的日头底下来。”店员对走近来的聂赫留朵夫说，显然在责备什么人。

“恐怕他就要死了。”打阳伞的女人哭丧着脸说。

“得把他的衬衫解开。”邮差说。

警察用哆嗦的粗手指笨拙地解开犯人青筋毕露的红脖子上的带子。他显然又激动又紧张，但仍然认为必须呵斥一番群众。

“你们围着干什么？天气这么热，还要把风挡住吗？”

“应该先请个医生来检查检查。把身体虚弱的都留下。要不然把半死不活的都拉了来。”店员说，有意显示他通情达理，懂得规矩。

警察解开犯人衬衣上的带子，挺直腰板，向四下里扫视了一下。

“对你们说，走开！不关你们的事，有什么好看的？”他说，转过脸来对着聂赫留朵夫，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可是他在聂赫留朵夫眼神里看不到同情，就又瞅了一眼押解兵。

可是押解兵站在一旁，只顾瞧着自己踩歪了的靴后跟，对警察的困难处境不闻不问。

“该管的人都不管。活活把人折磨死，天下有这样的规矩吗？”

“囚犯虽是囚犯，可到底也是人哪！”人群中有人说。

“把他的头枕得高些，给他点水喝。”聂赫留朵夫说。

“已经有人去拿水了。”警察边回答，边把手伸到犯人的胳膊窝下，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身体拖到高一点的地方。

“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忽然传出一个威风凛凛的声音。警官穿一身白得耀眼的制服和一双亮得更加耀眼的高统皮靴，快步向人群走来。“都走开！站在这儿干什么？”他还没有看清楚人群围着干什么，就大声吆喝道。

他走到跟前，看到奄奄一息的囚犯，肯定地点点头，仿佛早就料到是这么一回事。接着对警察说：

“这是怎么搞的？”

警察报告说，有一批犯人押过，其中一个倒在地上，押解兵吩咐把他留下来。

“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他送到局里去。叫一辆马车来。”

“扫院子的去叫了。”警察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说。店员刚说了一句天气太热，警官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这事轮得到你管吗？呃？走你的路！”店员就不作声了。

“得喝点水给他。”聂赫留朵夫说。

警官对聂赫留朵夫也狠狠地瞧了一眼，但没有说什么。扫院子的端来一杯水，警官吩咐警察端给犯人喝。警察把犯人的脑袋托起，想把水灌到他嘴里，可是犯人没有咽下去，水顺着胡子流下来，把上衣前襟和满是尘土的麻布衬衫都弄湿了。

“在他脑袋上泼点水！”警官命令道。警察脱下犯人头上薄饼般的帽子，对准他红棕色的鬈发和秃顶泼了水。

犯人仿佛受惊似的把眼睛睁得更大，不过没有改变姿势。他脸上流着沾有尘土的污水，嘴里仍旧均匀地呻吟着，全身不停地颤抖。

“这不是马车吗？就用这辆车好了。”警官指着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对警察说。“过来！喂，叫你过来！”

“有客人了。”马车夫眼睛没有抬起，阴沉沉地说。

“这是我雇的车。”聂赫留朵夫说，“不过你们用好了。钱我来付。”他对马车夫补了一句。

“喂，你们都站着干什么？”警官嚷道。“快动手！”

警察、扫院子的和押解兵把奄奄一息的犯人抬起来，送上马车，放在座位上。可是那犯人自己坐不住，头老是往后倒，整个身子从座位上滑下来。

“让他躺平！”警官命令道。

“不要紧，长官，我就这样把他送去。”警察说着，稳稳当当地坐在垂死的人旁边，用有力的右胳膊插到他的胳肢窝下，搂住他的身体。

押解兵托起犯人没有裹包脚布而只穿囚鞋的脚，放到驭座底下，让两条腿伸直。

警官环顾了一下，瞧见犯人那顶薄饼般的帽子掉在马路上，就把它捡起来，戴在犯人向后倒的湿淋淋的脑袋上。

“走！”他命令道。

马车夫怒气冲冲地回头看了看，摇摇头，在押解兵的监督下向警察分局慢吞吞地走去。警察跟犯人坐在一起，不断把犯人滑下去的身体拖起来。犯人的脑袋一直前后左右晃动着。押解兵走在马车旁边，不时把犯人的腿放好。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

## 三十七

马车载着犯人，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身旁，驶进警察分局院子，在一个门口停下。

院子里有几个消防队员，卷起袖子，大声说笑，正在冲洗几辆大车。

马车一停下来，就有几个警察把它围住。他们从胳肢窝下抱住没有生气的犯人身子，抬起他的脚，把他从车上抬下来。马车被他们踩得吱嘎作响。

送犯人来的警察跳下马车，甩甩发麻的胳膊，脱下帽子，画了个十字。死人被抬进门，送到楼上。聂赫留朵夫跟着他们上去。他们把死人抬到一个不大的肮脏房间里，里面放着

四张床。两张床上坐着两个穿睡衣的病人：一个歪着嘴，扎着绷带在脖子上；另一个害着痲病。另外两张床空着。他们就把那犯人放在其中一张床上。这时有一个矮小的人，身上只穿衬衣裤和袜子，双目闪亮，不停地动着眉毛，蹑手蹑脚地走到犯人跟前，对他瞧瞧，然后又瞧瞧聂赫留朵夫，放声大笑。这是一个留在候诊室里的疯子。

“他们想吓唬我。”他说。“那不行，办不到！”

警官和一个医士跟着抬死人的警察走进来。

医士走到死人跟前，摸了摸犯人雀斑累累的蜡黄的手，那只手虽然还软，但已现出死灰色。那只手被拿起来，然后又被放开，那只手就软绵绵地落在死人肚子上。

“完了。”医士摇摇头说，但显然是为了照章办事，解开死人身上湿漉漉的粗布衬衫，把自己的髻发撩到耳朵后面，弯下腰，把耳朵贴在犯人蜡黄的一动不动的高胸脯上。大家都不吱声。医士直起腰来，又摇了摇头，用一根手指拨开一只眼皮，又拨开另一只眼皮，那两只淡蓝色眼睛已经木然不动了。

“你们吓不倒我，吓不倒我。”那疯子说，不住地往医士那边吐唾沫。

“怎么样？”警官问。

“怎么样？”医士照样说了一遍。“送太平间。”

“您得留点儿神。是不是真的死了？”警官问。

“到这地步，错不了。”医士说着，不知为什么拉拉死人的衬衫把他的胸脯盖住。“我打发人去找马特维·伊凡内奇，让他来瞧瞧。彼得罗夫，你去一下！”医士说着，从死人旁边



走开。

“把它抬到太平间去。”警官说。“你回头到办公室来一下，签个字。”他对那个一直跟着犯人的押解兵说。

“是。”押解兵回答。

那几个警察抬起死人，又把他抬下楼。聂赫留朵夫想跟他们去，可是疯子拦住了他。

“您该没有参加他们的阴谋吧，那么给我一支烟抽！”他说。

聂赫留朵夫掏出一盒烟，递给他。疯子扬起眉毛，急急地讲起来，他们怎样用种种提审法折磨他。

“他们全都跟我作对，用妖术折磨我，把我搞得好苦……”

“对不起，我还有事。”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听完他的话就走到院子里，想看看死人被他们抬到哪里去。

那几个警察抬着死人穿过院子，刚走进地下室的门。聂赫留朵夫想走到他们那边去，可是警官拦住了他。

“您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聂赫留朵夫回答。

“不干什么，那就走开。”

聂赫留朵夫服从了，向他雇的那辆马车走去。车夫在打盹。聂赫留朵夫把他叫醒，又坐上马车到火车站去。

马车走了不到一百步，聂赫留朵夫看见迎面又来了一辆大车，由持枪的押解兵押送着。车上也躺着一个犯人，明显已经咽气了。那犯人仰天躺在大车上，留着黑色大胡子，剃得光光的脑袋上覆着一顶薄饼般帽子，那顶帽子已经滑到鼻

子上。大车每颠动一下，他的脑袋就摇晃一下，撞在车板上。大车的车夫穿着大皮靴，在大车旁边走着赶车。一个警察在后面跟着。聂赫留朵夫拍拍他的车夫的肩膀。

“看他们弄的！”车夫勒住马说。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跟着那辆大车走去，又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走进警察分局的院子。这时候，院子里的消防队员已把车子洗好了，走开了。只剩下又高又瘦的消防队长。他戴着镶蓝帽圈的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严厉地瞧着一匹由消防队员牵来的颈部膘很厚的浅黄色公马。公马的一条前腿有点瘸，消防队长生气地对站在旁边的兽医说着话。

警官也站在这里。他看见又拉来一个死人，就走到大车旁边。

“从哪儿拉来的？”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问。

“从老戈尔巴朵夫街运来的。”警察回答。

“是犯人吗？”消防队长问。

“是，长官。”

“今天是第二个了。”警官说。

“哼，真不象话！天气也实在太热了。”消防队长说，接着转身对那个牵着浅黄马的消防队员嚷道：“把它牵到拐角那个单马房里去！你这狗崽子我要教训教训，你把这些好马都弄残废了，它们可是比你这混蛋值钱多了。”

这个死人也象刚才那个一样，由几个警察从大车上搬下来，抬到候诊室。聂赫留朵夫象中了催眠术似的跟着他们走去。

“您有什么事？”一个警察问他。

他没有回答，仍旧往他们送死人的地方走去。

疯子坐在床铺上，拼命吸着聂赫留朵夫送给他的纸烟。

“啊，您回来了！”他说着哈哈大笑。他一看见死人，就把眉头皱起来。“又来了。”他说。“我都看腻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是吗？”他带着疑问的微笑，对聂赫留朵夫说。

聂赫留朵夫瞧着现在没有被人遮住的死尸。死尸的脸原先盖着帽子，此刻也暴露无遗。刚才那个犯人长得很丑，可是这个犯人面貌和体型都长得非常好。这个人体格强壮，正当盛年。虽然他被剃了怪模怪样的阴阳头，可那饱满的天庭和那双如今毫无生气的黑眼睛却显得很美，还有那个不大的高鼻子和短短的黑色小胡子，也都生得很好看。他的嘴唇发青，笑意在唇边挂着。他的大胡子只盖住下半截脸，在那剃光头发的半边脑袋上露出一只结实而好看的不大的耳朵。脸上的神情平静、严肃而善良。且不说从这张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在精神上原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如今却被断送了，——单从他双手和套着脚镣的双脚的细小骨骼和匀称四肢的强壮肌肉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优秀、强壮和灵巧的人类动物。作为一种动物来说，他在同类中也远比那匹由于受伤而惹得消防队长生气的浅黄马完美得多。然而他却被活活折磨死了，非但没有人把他当作人来哀悼，而且也没有人把他当作被活活折磨死的会做工的动物来可怜。他的死在所有的人心里引起的唯一情绪，就是厌烦，因为他的尸体眼看就要腐烂，必须尽快收拾掉，这样就给大家添了麻烦。

医师带着医士在警察分局长陪同下来到候诊室。医师是个矮壮结实的人，穿一件茧绸上装和一条裹紧粗壮大腿的茧

绸裤子。警察分局长是个矮胖子，红润的脸庞圆滚滚的，象个球。他有个习惯，喜欢把双颊鼓起，然后再把气慢慢吐出来。这样鼓着双颊，他的脸就显得更圆了。医师挨着死人坐到床上，也象刚才医士那样先摸摸死人的双手，再听听心脏，然后站起来把自己的裤子拉拉。

“完全死了。”他说。

警察分局长的双颊鼓得满满的，又慢慢地把气吐出来。

“他是哪个监狱的？”他问押解兵。

押解兵回答了他，又提到要把死人的脚镣收回。

“我会叫他们取下来的。感谢上帝，我们这里还有铁匠。”警察分局长说，接着又鼓起脸颊向门口走去，再慢慢地把气吐出来。

“怎么会这样？”聂赫留朵夫问医师说。

医师透过眼镜瞧瞧他。

“怎么会这样吗？您是说，他们怎么会中暑死掉吗？您看，整整一个冬天蹲在牢里，没有活动，不见天日，突然给带到今天这样的大太阳底下，那么多人挤在一块儿走路，空气又不流通，不中暑才怪呢！”

“那么，为什么要把他们流放？”

“那您去问他们好了。不过，请问您是谁？”

“我是局外人。”

“噢！……对不起，我可没闲时间。”医师说，又恼火地把裤腿往下拉拉，向病人床铺走去。

“喂，你怎么样？”他问那个脸色苍白、脖子上扎着绷带的歪嘴病人说。

这当儿疯子坐在自己的床铺上，不再吸烟，只是朝医师那边吐唾沫。

聂赫留朵夫下楼走到院子里，从消防队的马匹、几只母鸡和戴铜盔的哨兵旁边走过，出了大门，坐上他的马车（车夫又在打瞌睡），向火车站跑去。

## 三十八

聂赫留朵夫来到火车站，犯人们都已坐到装有铁窗的车厢里。站台上有几个送行的人，但押解兵不准他们接近车厢。押解兵今天特别操心。从监狱到车站的一路上，除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的两名犯人，还有三个中暑死亡：其中一名也象前两名那样被送到就近的警察分局，还有两名都是在车站上倒下的。押解人员操心的，倒不是在他们的押解下死了五个本来可以不死的人。他们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他们操心的只是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把死人和他们的文件、杂物送到该送的地方，把他们的名字从押送的犯人名册中勾销。办这些事很麻烦，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热天。

押解兵此刻正忙于处理这些事，因此在这些事没有办完以前，不准聂赫留朵夫和其他人接近车厢。不过聂赫留朵夫还是获得许可走近车厢，因为他给了押解的军士一点钱。这

个军士就放聂赫留朵夫过去，但要他快点谈，谈完就走开，免得被长官看见。车厢总共十八节，除了长官坐的那一节以外，节节车厢都被犯人挤得满满的。聂赫留朵夫走过那些车厢窗口，留神听听里面在干什么。每节车厢里都是一片镣铐声、忙乱声、说话声，其中还夹着毫无意思的下流话，但出乎聂赫留朵夫的意料，没有一个地方在谈论路上死去的同伴。他们谈的多半是他们的袋子、饮用水和挑座位问题。聂赫留朵夫从一节车厢的窗口往里张望，看见押解兵在过道上给犯人卸手铐。犯人们伸出双手，一个押解兵打开手铐上的锁，脱掉手铐。另一个押解兵把手铐收集在一起。聂赫留朵夫走过所有男犯的车厢，来到女犯车厢旁边。第二节车厢里传出一个女人均匀的呻吟声：“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

聂赫留朵夫走过这节车厢，听从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到第〇三节车厢窗口。聂赫留朵夫的头刚凑近窗口，就有一股充满汗臭的热气扑面袭来，同时清楚地听见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所有长凳上都坐着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身穿囚袍和短袄的女人，她们在大声谈话。聂赫留朵夫的脸凑近铁窗，引起了她们的注意。靠窗几个女人住了口，向他凑过去。玛丝洛娃只穿一件短袄，没有包头巾，坐在对面窗口。皮肤白净、脸带笑容的费多霞坐在她旁边，离这边窗口近一点。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推推玛丝洛娃，给她指指这边窗口。玛丝洛娃慌忙站起来，拿头巾包住乌黑的头发，红润冒汗的脸上现出活泼的微笑，走到窗口，双手抓住铁栅。

“天气真热呀！”她快乐地笑着说。

“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觉得车厢里的热气简直象从蒸汽浴室里冒出来的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最好能弄点水喝喝。”费多霞说。

“是啊，最好弄点水喝喝。”玛丝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喝吗？”

“送来过，都喝光了。”

“我这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去问押解兵要点水来。我们要到下城才能再见面了。”

“您难道也去吗？”玛丝洛娃仿佛不知道这件事，高兴地瞅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坐下一班车走。”

玛丝洛娃一言不发，过了几秒钟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是怎么搞的，老爷，说是有十二个犯人折磨死了，事实吗？”一个表情严厉的上了年纪的女犯人用男人般的粗嗓子说。

她就是柯拉勃列娃。

“十二个，我没听说。我只看见两个。”聂赫留朵夫说。

“听说有十二个。造这样的孽，他们都没事吗？简直都如魔鬼一般！”

“妇女中间没有人害病吧？”聂赫留朵夫问。

“娘儿们体格好着呢。”另一个矮小的女犯笑着说，“只是有一个要生孩子了。听，她在那儿嚷嚷呢。”她指着隔壁的车厢说，那儿不断传来同一种呻吟声。

“您问我们还需要什么。”玛丝洛娃竭力忍住嘴唇上快乐的笑意，说，“那么，能不能把这女人留下来，不然她太受罪了。哎，您最好去跟长官说说。”

“好的，我去说。”

“哎，还有，能不能让她同她丈夫塔拉斯见一次面？”她瞥了一眼笑盈盈的费多霞，示意聂赫留朵夫说。“她丈夫就要跟您一起动身了。”

“老爷，不可以同她们说话。”一个押解的军士说。这不是放聂赫留朵夫过来的那个军士。

聂赫留朵夫就去找长官，想为临产的女人和塔拉斯求情，可是找了好半天都没有找到，也不能从押解兵那里打听到长官在哪里。他们都很忙：有些正把犯人带到什么地方去，有些跑去给自己买食物，或者把自己的行李放到车厢里，有些在伺候跟押解官一起动身的太太。他们都不高兴回答聂赫留朵夫的话。

聂赫留朵夫找到押解官的时候，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押解官用他那只短手擦擦盖住嘴巴的小胡子，耸起肩膀，不知因为什么事在斥责司务长。

“您究竟有什么事？”他问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车上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我想应该……”

“那就让她生好了。等生出来再说。”押解官说，向他自己那节车厢走去，拚命摆动两条短胳膊。

这时候，列车长手里拿着哨子走过。紧接着响起了最后一遍铃声和哨子声，从站台上送行的人群中和女犯的车厢里传出一片号叫声。聂赫留朵夫跟塔拉斯并排站在站台上，眼



看一节节带铁窗的车厢和车窗里一个个剃光头发的男人脑袋从面前掠过。接着是第一节女犯车厢，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里面的女犯，有的露着头发，有的扎着头巾。然后是第二节车厢，从里面传出那个临产女人的呻吟。再后面就是玛丝洛娃的那节车厢。玛丝洛娃同另外几个女犯站在窗口，瞧着聂赫留朵夫，他发出凄苦的微笑。

## 三十九

聂赫留朵夫要搭乘的那班客车离开车还有两小时。聂赫留朵夫本想利用这段时间到姐姐家去一次，可是今天上午看到的那些景象使他感慨万千，精疲力竭，他一坐到头等车候车室的沙发上，更觉极其困倦。他侧过身子，一只手垫在脸颊下，就立即睡着了。

一个身穿礼服，胸戴徽章、肩上搭着餐巾的茶房把他叫醒了。

“老爷，老爷，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吗？有位太太在找您呢。”

聂赫留朵夫霍地跳起来，揉揉眼睛，这才记起他在什么地方，想到今天上午发生的各种事情。

他头脑里留下的景象是：犯人的队伍，几个死人，有铁

窗的车厢和关在里面的女犯，其中一个在临产的阵痛中，无人照料，另一个从铁栅后面向他凄凉地微笑。可是此刻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种相反的景象：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酒瓶、花瓶、大烛台和餐具，几个机灵的茶房在桌子周围侍候客人。候车室深处有个柜台，柜台里面的酒橱前站着一个侍者，柜台上放着各种果盘和酒瓶，在柜台旁旅客都背对外站着。

聂赫留朵夫，头脑刚清醒了些，便发现房间里人人都在好奇地向门口张望。他也往那边望望，看见一伙人抬着一把圈椅，椅上坐着一位头上包着轻纱的太太。前面抬圈椅的那个跟班，聂赫留朵夫觉得很面熟。后面一个戴着镶金绿的制帽，是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一个看门人。圈椅后面跟着一个装束雅致的侍女。她头发髻曲，身上系着围裙，手里提着一个包裹、一个装着圆滚滚东西的皮盒子和两把阳伞。再后面走着的就是柯察金公爵。公爵生着两片厚嘴唇，一个容易中风的肥大脖子，挺起胸脯，头上戴着一顶旅行帽。他后面是米西和她的表哥米沙，还有那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外交官奥斯登。奥斯登脖子细长，喉结突出，神气和情绪总是很快活。他一面走，一面郑重其事地同笑盈盈的米西说话，但带点戏谑的味道。最后是那个怒气冲冲地吸着烟的医生。

柯察金一家人正从他们城郊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姐姐的庄园里去。那个庄园座落在下城的铁路线上。

抬圈椅的仆人、侍女和医生鱼贯进入女客候车室，引起所有在场的人的好奇和尊敬。老公爵在桌旁一坐下来，立刻把茶房唤到跟前，向他要了酒菜。米西跟奥斯登也在餐厅里

停下来，刚要坐下，忽然看见门口有个熟识的女人，就迎着她走去。原来她就是娜塔丽雅。娜塔丽雅在阿格拉斐娜伴同下走进餐厅，不住地向两边张望。她几乎同时看见了米西和弟弟。她对聂赫留朵夫只点点头，先走到米西跟前。不过她同米西互吻以后，就转身对弟弟说话。

“我总算把你找到了。”娜塔丽雅说。

聂赫留朵夫站起来同米西、米沙和奥斯登打了招呼，站住同他们谈话。米西把他们乡下的房子着火、逼得他们搬到姨妈家去的事告诉聂赫留朵夫。奥斯登乘机讲了一个同火灾有关的笑话。

聂赫留朵夫没有听奥斯登说，却转身同姐姐谈话。

“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

“我来很长时间了。”她说。“我是跟阿格拉斐娜一起来的。”她指指阿格拉斐娜说，那个女管家头戴帽子，身穿防雨布大衣，现出亲切而稳重的神态，羞怯地从远处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不愿打扰他。“我们四处找你。”

“可在这儿睡着了。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我刚才给你写信，刚开了个头。”他说。

“真的吗？”她忧虑地问。“有什么事？”

米西和她的男伴发现姐弟两人在交谈，就走开了。聂赫留朵夫同姐姐在靠窗的丝绒长沙发上坐下来，沙发上还放着别人的行李、毛毯和帽盒。

“昨天我从你家出来以后，本想再回去赔罪。但不知道姐夫会如何对待我。”聂赫留朵夫说，“我同他谈得不投机，心里很难过。”

“我知道。”姐姐说，“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

娜塔丽雅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碰碰他的手。她这句话的意思不明确，可是他完全了解她，她的情意感动了他。她原来想表示，除了她对丈夫的满腔热爱以外，她对他，对弟弟的手足之情，在她也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他们之间的任何龃龉在她都是痛苦的。

“谢谢，谢谢你……唉，今天我看见什么了！”聂赫留朵夫突然想起第二个死去的犯人，说。“两个犯人被害死了。”

“怎么被害死了？”

“就这样被害死了。这样的大热天把他们押出来。有两个中暑死了。”

“那不可能！怎么会呢？今天吗？刚才吗？”

“是的，就是刚才。他们的尸体我看见了。”

“可是为什么要害死他们呢？是谁害死他们的？”娜塔丽雅问。

“就是那些硬把他们押出来的人。”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觉得她看待这事用的也是丈夫那种目光。

“啊，我的天！”阿格拉斐娜走到他们跟前，说。

“是的，这些不幸的人遭到什么待遇，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我们应该知道。”聂赫留朵夫瞧着老公爵说。老公爵这时已围好餐巾，坐在放有一瓶混合酒的桌旁，回过头来对聂赫留朵夫看了一眼。

“聂赫留朵夫！”他叫道，“要不要喝一点解解暑气？出门喝一点再好没有了！”

聂赫留朵夫谢绝了，把身子转过来。

“那么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娜塔丽雅又问。

“尽我的力量去做。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觉得总应该做些什么。我一定尽力去做。”

“是的，是的，这我明白。那么，你跟这一家人。”她微笑着瞧瞧柯察金，说，“难道真的就分手了？”

“分手了。我想，这样双方都不会感到遗憾的。”

“可惜。我觉得很可惜。我喜欢她。嗯，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娜塔丽雅胆怯地说。“你何必跟着去呢？”

“那是因为我应该去。”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冷冷说，似乎希望不要再谈这事。

不过，对待姐姐这样冷淡，使他立刻感到羞愧。“我为什么不把心里所想的都告诉她呢？”他想。“让阿格拉斐娜也听听好了。”他瞅了一下老女仆，对自己说。有阿格拉斐娜在场，这就鼓励他把自己的决心再对姐姐说一遍。

“你是说我想跟卡秋莎结婚这件事吗？说句心里话，我决心这样做，可是她一口拒绝了。”他声音哆嗦着说。每次谈到这事，他总是这样的。“她不愿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而就她的处境来说，她牺牲得太多了。我不能接受这种牺牲，我想这只是她出于一时冲动。所以我现在决心跟她去，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还要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来减轻她的痛苦。”

娜塔丽雅一言不发。阿格拉斐娜用疑问的目光瞧瞧娜塔丽雅，摇摇头。这时候，原来那一伙人又从女客候车室里出

来，仍旧由漂亮的跟班菲利浦和看门人抬着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吩咐停下来，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露出一副疲劳不堪的可怜相，伸给他一只戴满戒指的白手，恐惧地等待他有力的握手。“真要人的命！”她望着炎热的天气说。“我可受不了。这样的天气真要我的命。”接着她谈了一阵俄罗斯气候的恶劣，又请聂赫留朵夫到他们家去玩，然后示意抬圈椅的人继续上路。“那么，您务必要来。”她坐在圈椅上，转过她的长脸，又向聂赫留朵夫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走到站台上。公爵夫人的一伙人往右拐了个弯，向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同搬行李的脚夫和背着袋子的塔拉斯一起向左边走去。

“喏，这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着塔拉斯对姐姐说，关于塔拉斯的遭遇他上次已对姐姐讲过了。

“难道你真的坐三等车吗？”娜塔丽雅看见聂赫留朵夫在三等车厢旁边站住，脚夫拿着行李和塔拉斯一起走上那节车厢，就问。

“是的，这样方便些，我和塔拉斯一起走。”他说。“哦，还有一件事要同你说一下。”他说，“我至今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那几个孩子继承好了。”

“德米特里，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

“就算我把那些地都给了农民，我也有一件事要说明，那就是我其余的东西都将传给他们，因为我恐怕不会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

过聂赫留朵夫看出她听了这话觉得很高兴。

前面，在头等车厢旁边，站着一小群人，仍旧瞧着柯察金公爵夫人被抬进去的那节车厢。其余的人都已按座位坐好。几个迟到的乘客匆匆走过，把站台的木板踩得咚咚直响。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请旅客就座，请送客的下车。

聂赫留朵夫刚走进被太阳晒得又热又臭的车厢，立刻又出现在车尾的小平台上。

娜塔丽雅头戴一顶时髦的帽子，披着披肩，跟阿格拉斐娜并排在车厢旁边站着，显然在找话题，但没有找到。她连说一句写信来，都觉得不行，因为她同弟弟早就嘲笑过送人出门那套老规矩了。而谈到财产和继承问题，他们的手足之情就破坏了；他们觉得彼此疏远了。等到火车开动，她只点点头，现出惆怅而亲切的脸色说：“嗯，再见，德米特里，再见！”这时，她心里反而感到高兴。但等这节车厢一离开，她就想到她该如何把同弟弟谈的事告诉丈夫，她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而紧张了。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姐姐一向很有感情，也没有对她隐瞒过任何事情，如今同她待在一起也觉得别扭，难堪，巴不得早点分开。他觉得当年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胡子蓬松、肤色发黑的令人讨厌的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当他谈到她丈夫感兴趣的事，也就是分地给农民和遗产继承等问题时，她的脸色才显得特别兴奋。而这一点却使他感到伤心。

## 四十

三等车的大车厢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又挤满了人，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聂赫留朵夫一直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没有回车厢。但连这里也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直到列车从周围房屋中冲出来，车厢里有了穿堂风，聂赫留朵夫才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的，他们是被害死的。”他暗自重复了一遍对姐姐说过的话。头脑里充满了今天各种印象，特别是生动地浮现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严峻的前额、剃得发青的头盖皮和不大的结实的耳朵。“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那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也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



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活活死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犯罪。”

聂赫留朵夫沉思着，都没有注意到天气变了。太阳已被前方低垂的云朵遮住，从西方地平线涌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雨云。远处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着大雨。湿润的空气被雨云送来。闪电偶尔划破灰云，滚滚的雷鸣同列车越来越急

促的隆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雨点开始打着车尾的小平台，也打着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吸着湿润清凉的空气和久旱待雨的土地发出的气息，望着眼前掠过的果园、树林、开始发黄的黑麦地、依旧碧绿的燕麦地和种着正在开花的深绿色土豆的黑色田畦。大地万物似乎都涂了一层清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了。

“大点儿，大点儿！”聂赫留朵夫望着雨下生意盎然的田野、果园和菜园，不禁快乐地说。

大雨下了没有多久。雨云一部分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飘走了。此刻只剩下暴雨后残留下来的蒙蒙细雨，落到湿漉漉的地面上。太阳又露了出来，大地万物又闪闪发亮。在东方地平线，出现了一道长虹，位置不高，色彩鲜艳，紫色特浓，但一端却模糊不清。

“哦，我刚才在想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是啊，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他想起他讲到监狱里种种情景时马斯连尼科夫那种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酷，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车，也不管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的痛苦哀号。“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象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

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象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是。”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肯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很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连恻隐之心都没有。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之处就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将现有秩序维持，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可以把别人当作物品看待，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是不需要的；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派，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来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象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

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有爱心，但人对待人爱心却不能没有，就象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的确，人不能象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最好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能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象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凉快下来的天气，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答案。

##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戴着几只手镯在裸露的手臂上。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呢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

塔拉斯洋洋自得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衣，肌肉发达。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正打算到外地去工作。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这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离地很远，嘴里不住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把长袍前摆掖起，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

“您请坐！”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她讲到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

“上次谢肉节，托上帝的福，去过一次。这会儿又去了一次。”她说，“到圣诞节，求上帝保佑，还能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瞅着聂赫留朵夫说，“你得经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做蠢事，简直象个大姑娘。挣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咪咪地望着小姑娘说。

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她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瞧瞧老人的脸，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的脸。

“看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加了一句，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厂里的工人。

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住嘴，仰起头，咕咚咕咚喝着酒；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紧紧盯住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谈话的那个女人说，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象他那样的人，老大爷，可以说天下少有。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

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喝了几口。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在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谁也看不见；如今一喝酒，大家都看见了。我干活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没有别的。”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我说的对不对，老爷？我老婆是个比较稳重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你在罗唆什么呀？”她补充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象没上过油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咳，他又瞎扯了……”

“嗯，她就是这样的。好是好，可只是一时的。一旦发起牛脾气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可是实话。老爷，您可得包涵点。我喝了点酒，嗯，可是有什么办法……”工人说着就躺下来睡觉，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子的膝盖上。

聂赫留朵夫又跟老头儿一起坐了一阵。老头儿讲到他的身世，说他是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这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想休息一下，可总是没有工夫。这回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

完老头儿的话，站起来，向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那边走去。

“哦，老爷，您坐。我们把袋子挪到这儿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头来瞅了瞅聂赫留朵夫的脸，亲切地说。

“不怕受挤，就怕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声音说，然后伸出两只强壮的胳膊把两普特重的袋子象鸿毛似地轻轻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也行。这里可是太平无事，没有人吵架！”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时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可是喝了点酒——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只有逢到特殊情况时才喝，——就特别喜欢说话。他一开口，总是讲得很多，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并且非常亲切，他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和殷勤含笑的嘴唇总是洋溢着亲切的情意。

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聂赫留朵夫的到来，使他暂时住了口。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原来那样坐下，把两只经常劳动的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事。他向这位新朋友详细地讲他妻子被判刑的始末，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前后经过，因此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刚讲到下毒的事已发生，家里人都知道那是费多霞干的。

“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和蔼可亲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



讲讲我的事。”

“好哇，好哇。”聂赫留朵夫高兴地说。

“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着那块饼生气地说：‘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没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象蟑螂一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吗，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全都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呗。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用说，她被关进牢里。我爹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我们家的婆娘只我妈一个，她又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官府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

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抵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着长音说，仿佛讲到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抓起公文，一口气跑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被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公文？’我就马上把公文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帐，把马车套上，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嗯，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问：‘嗯，爹也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对我说：‘塔拉斯，我干了傻事，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就说：‘还说这些干什么，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就不再说些什么。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在我妈面前下了跪。我妈说：‘去求上帝宽恕吧！’我爹跟她打过招呼说：‘干吗再提那些旧事。好好过日子吧。眼下也没有工夫说那些，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里，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上帝保佑，长势可好了，镰刀都插不进

去，麦穗同麦穗纠结在一起，都倒在地里。得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起去割吧。’大哥，她就立刻动手干活。她干得可卖力了，简直叫人吃惊。当时我们家租了三亩地，上帝保佑，黑麦也罢，燕麦也罢，都是少见的好收成。我割麦，她打捆，要不我们俩就一起割。我干活利索，干什么都不错不了。她呢，不论干什么活，比我还利索。我老婆年纪轻，手脚灵活，浑身是劲。大哥，她干活简直不要命，我只好劝她停一停。我们干完活回家，手指头都肿了，腰酸背痛，该歇一会儿才是，可是她晚饭也不吃，就跑到仓库里，去打第二天用的草绳。她可真是变了样！”

“那么，她跟你亲热了吗？”花匠问。

“那还用说，她跟我可真是太贴心了。我心里想点什么，她都清楚。我妈对她原是一肚子气，可连她也说：‘我们的费多霞好象让人掉了包，变了个人是的。’有一次我们俩赶两辆车去装麦捆，我跟她一起坐前面那辆车。我就问她：‘费多霞，当初你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她回答说：‘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就是不愿跟你一块儿过。我想，我情愿死，也不愿跟你一起过。’我就说：‘那么现在呢？’她说：‘现在吗，现在你已经变成我的心上人了。’”塔拉斯停了停，现出快乐的笑容，困惑地摇摇头。“我们从地里收割回来，把大麻泡在水里，刚回到家。”他沉默了一下，接下去说，“没想到，传票来了，要开庭审判。可我们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开庭审判。”

“这准是鬼附上身了，不会是别的。”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自己会无缘无故去害死人吗？对了，我们那儿也有过这样一个人……”花匠刚要讲故事，可是火车停了下来。

“准是到站了。”他说。”最好下去喝点什么。”

谈话到此中断。聂赫留朵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板站台上。

## 四十二

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出车厢，就看见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豪华的马车，都套有三、四匹膘肥体壮的骏马，马脖子上挂着丁当作响的小铃铛。他走到被雨淋得潮湿发黑的站台上，一眼就看见头等车厢旁站着一伙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太太，头戴插有珍贵羽毛的帽子，身穿雨衣；还有一个高个子青年，两腿细长，穿一身自行车装，手里牵着一只脖子上套有贵重颈圈的肥壮大狗。他们后面站着几个仆人，手拿雨衣雨伞，还有一个马车夫，都是来接客的。这一伙人，从胖太太起到手提长袍前摆的马车夫止，个个都显得优裕富足，怡然自得。在这伙人四周顿时围了一批好奇成性、拜金成癖的人，其中包括戴红制帽的站长，一个宪兵，一个穿俄罗斯民族服装、颈戴项链、夏天里每逢有火车到站必定赶来迎接的瘦姑娘、电报员和几个男女乘客。

聂赫留朵夫认出那个牵狗的青年就是在念中学的柯察金家的少爷。那位胖太太就是公爵夫人的姐姐——柯察金一家

就是搬到她的庄园来住的。列车长身穿金绦闪亮的制服，脚登擦得锃亮的皮靴，拉开车厢门，并且为了表示敬意，一直拉住那门，好让菲利浦和系白围裙的脚夫把马脸的公爵夫人坐着的圈椅小心地抬下车来。两姐妹相互问好，还听到他们用法语商量，公爵夫人坐轿车还是篷车。于是队伍就以手拿阳伞和帽盒的髻发侍女殿后，向车站出口处走去。

聂赫留朵夫不愿同他们再次见面，再次告别，就站住，等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车站。公爵夫人带着儿子、米西、医生和侍女走在前头，老公爵和他的妻姐跟在后面。聂赫留朵夫没有走到他们跟前去，只能听见他们用法语交谈的片言只语。在公爵所讲的话中，有一句不知怎的——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连同他的腔调和声音都深深印进聂赫留朵夫的脑海里。

“啊！他可真正是个上等人，真正是个上等人。”公爵用洪亮而自信的声音提到什么人，在毕恭毕敬的列车员和脚夫的簇拥下，同妻姐一起走出车站。

就在这时候，车站拐角处出现了一群不知从哪儿来的工人。他们穿着树皮鞋，背着羊皮袄和袋子，向站台走来。工人们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到最近一节车厢旁边，想上去，可是立刻被列车员赶走了。他们没有停下，又匆匆向前走去，彼此拥挤着，来到旁边那节车厢门口登上火车。他们背上的袋子不断地撞在车角和车门上。这当儿另一个列车员在车站出口处看见他们要上车，就恶狠狠地对他们吆喝起来。已经上车的工人连忙下车，又迈着同样矫健的步子，向下一节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就坐在那节车厢里。列车员又把他们拦住。

他们站住，准备继续向前走，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们说，车厢里有空位子，可以上去。他们听从他的话，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上了车。工人们正要各自找位子坐下，可是那个帽子上有帽徽的老爷和两位太太看见他们胆敢坐到他们这节车厢里来，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坚决反对，大声赶他们出去。这批工人有年纪老的，有年纪很轻的，总共二十人光景，个个又黑又瘦，满面风霜。他们受到老爷太太的驱逐，显然觉得自己错了，立刻穿过车厢往前走，他们背上的袋子不住地撞在车座、板壁和车门上。他们的神情表明似乎准备走到天涯海角，坐到人家吩咐他们坐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坐到钉子上也行。

“你们闯到哪儿去，鬼东西！就在这儿找个位子坐下！”另一个列车员迎着他们走来，嚷道。

“这倒是件新鲜事儿！”两位太太中年轻的那一位说，自以为她那口漂亮的法国话会吸引聂赫留朵夫的注意。那位戴手镯的太太只是皱起眉头，嗅个不停，嘴里嘲弄说，跟这批臭庄稼佬坐在一起真是受益非浅。

工人们却象度过重大危险似的，感到如释重负，停住脚步，分头找位子坐下，卸下背上的袋子，把它们塞到座位底下。

同塔拉斯攀谈的花匠坐的不是他自己的位子，这时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这样，塔拉斯旁边和对面就空出三个位子来。有三个工人就坐在这些空位子上，可是聂赫留朵夫一走到他们跟前，他那副老爷的装束便使他们手足无措。他们站起来想走，聂赫留朵夫却叫他们坐着不要动，自己在靠近

过道座位的扶手上坐下来。

那几个工人中，有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头同一个年纪轻的交换了一下眼色，露出疑惑甚至恐惧的神色。聂赫留朵夫不象一般做老爷的那样对他们呼么喝六，把他们赶走，反而给他们让座，这使他们感到惊讶，弄不懂是怎么回事。他们甚至担心到头来会不会出现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不过，他们看到并没有什么阴谋诡计，聂赫留朵夫同塔拉斯谈话也很随便，这才放下心来，吩咐一个小伙子坐在袋子上，请聂赫留朵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那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坐在聂赫留朵夫对面，起初畏畏缩缩，拚命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缩起来，免得碰到老爷的脚，后来他同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谈得很投机，甚至在他想让聂赫留朵夫注意自己的话时，还用手背碰碰聂赫留朵夫的膝盖。他讲到自己的种种情况，讲到泥炭田的工作。原来他们在泥炭田里干了两个半月活，每人大约挣了十个卢布——有一部分工资他们在受雇时已经预支了，——现在就是带着工钱回家去。他讲到，他们干活总是在没膝深的水中，从日出干到日落，中午吃饭休息两小时。

“谁没有干惯，干这活当然很苦。”他说，“但干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就是伙食要象样。起初伙食很糟，大伙儿都挺不满意，后来伙食有了改进，干活也就轻松了。”

接下去他讲到，他在外面做了二十八年工，总是把全部工钱都寄回家，开头交给父亲，后来交给哥哥，现在则交给当家的侄儿。他每年挣五六十卢布，自己只花两三个卢布，买点烟草和火柴，找点乐子。

“有时候累了，也喝一点儿伏特加，罪过。”他露出歉疚

的微笑，补了一句。

他还讲到，男人出门后女人怎样当家；今天回家以前包工头怎样请他们喝了半桶白酒；还讲到他们中间死了一个人，另外有一个生了病，现在由他们送回家去。那个病人就坐在这节车厢的角落里。他还是个孩子，脸色灰白，嘴唇发青。显然在发疟疾，还没有退烧。聂赫留朵夫走到那孩子跟前，但那孩子那么严厉而痛苦地对他瞅了一眼，弄得聂赫留朵夫不敢问什么，只是劝老头儿给他买些奎宁来吃，并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药名交给他。聂赫留朵夫想给些钱，可是老头儿说不需要，他自己会买的。

“哦，我出过多少次门，这样的老爷还没有见过。他不仅不揍你，还让位子给你坐。可见老爷也是各不相同的。”他最后对塔拉斯说。

“是啊，这可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崭新的世界。”聂赫留朵夫瞧着这些筋骨强壮而又干瘦如柴的四肢，粗糙的土布衣服，以及黧黑、疲劳而亲切的脸庞，心里想，同时觉得他周围这些人，过着真正的劳动生活，他们有严肃的兴趣、欢乐和痛苦，他们才是彻头彻尾的新人。

“瞧，他们才是真正的上等人。”聂赫留朵夫想起了柯察金公爵说过的这句话，同时想起了柯察金之流的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猥琐无聊的兴趣。

他好象一个旅行家，发现了一个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为此感到兴高采烈。